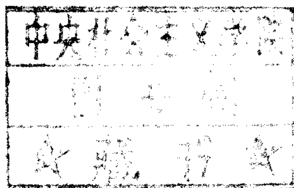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毛泽东
哲学思想概论

杨瑞森　张文儒　冉昌光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84163/27



高 等 学 校 文 科 教 材

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论

杨瑞森 张文儒 冉昌光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學出版社

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论
杨瑞森　张文儒　冉昌光　编著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10.75　插页2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262,000　册数：25,000
统一书号：2011·123　定价：1.85元

编 者 说 明

《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论》一书，是受教育部委托为全国综合性大学哲学专业编写的教材。本书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完整准确地阐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和新发展。

四川大学鲁生同志曾任本书主编，主持了初稿的撰写工作，并起草了第三、四章初稿；崔建峰同志参与了第一章初稿的写作；朱义超同志为撰写初稿作了一些辅助性工作。鲁生同志和崔建峰同志不幸逝世后，书稿几经讨论，作了两次大的修改。参加各章执笔的有：北京大学张文儒同志（第一、四、六章）、南开大学杨瑞森同志（第二、七、九章）和四川大学冉昌光同志（第三、五、八章）。全书由杨瑞森同志负责统稿。中山大学教授刘嵘同志和厦门大学教授邹永贤同志作为本书编写顾问，参加了编写提纲和初稿的讨论，并指导了定稿工作。

石仲泉、孙克信、刘林元、沧南、李成溪、李克、李其驹、林伯野、杨友吾、杨春贵、周亢、陈祖华、秦锡瑜、樊瑞平等许多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同志，参加了提纲或初稿的讨论，为撰写和修改书稿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卢之超同志对初稿提出了书面意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铁恩惠同志自始至终与作者一起参加了书稿的讨论和修改工作，为成书付出了大量劳动。四川大学以及其他一些院校为编写和修定此书给予了很大支持和帮助。我们在编写过程中，也吸取了其他有关论著中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致谢。

编写毛泽东哲学思想教材，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研究不够，缺点乃至错误在所难免，恳望同志们惠予批评指正。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经验的最一般理论概括……………………………………………1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继续 ……………………………………2

二、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最一般理论概括 ……………………7

三、对中国优秀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 ……………………………15

四、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21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哲学……………………………25

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化为指导实际工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25

二、让哲学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28

三、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南 ………………………33

第二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38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38

一、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和我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发展 …………39

二、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43

第二节 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转变…………………………48

一、毛泽东青年时期的世界观转变 ………………………………48

二、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过程的基本特点 ……………………54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57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58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形成和成熟 ……………………62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和展开 ……………67
第四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70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继续和发展 ………70
二、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 ………75
第三章　实事求是 ……………………………………80
第一节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80
一、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 ………………………………80
二、贯串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各个方面的根本点 ………………84
第二节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86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 ………………………………………86
二、有的放矢 ………………………………………………91
第三节　发挥自觉能动性，按客观规律办事………………96
一、自觉能动性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 ………………………96
二、尊重客观条件，充分发扬正确的自觉能动性……………100
三、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107
第四节　没有正确的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10
一、调查研究是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110
二、调查研究的正确态度和方法……………………………115
第四章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122
第一节　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 ……………………122
一、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做或行动………………………123
二、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126
三、实践是认识的基础………………………………………129
第二节　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 …………………134
一、从感性认识能动地上升到理性认识………………………134
二、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意义更加伟大………………………138
三、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141
第三节　坚持真理，发展真理 …………………………145

一、真理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145
二、真理是不可穷尽的………………………………………………149
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52
第五章 宇宙的根本规律 ……………………………157
第一节 矛盾问题是辩证法的中心问题 ………………157
一、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158
二、量变质变是对立的统一…………………………………………162
三、肯定否定也是对立的统一………………………………………166
第二节 矛盾双方又同一又斗争构成事物的
矛盾运动 ……………………………………171
一、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171
二、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和斗争形式的相对性………………………174
三、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推动事物的发展………………180
第三节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相互联结的 …………182
一、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贯串于一切过程
的始终…………………………………………………………182
二、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都各有其特点…………………184
三、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与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188
四、共性个性、相对绝对的关系是矛盾问题的精髓………………195
第四节 矛盾分析方法是分析问题的根本方法 …………198
一、辩证分析方法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199
二、对一切事物都要具体分析………………………………………201
三、在两点中把握重点………………………………………………203
第六章 军事辩证法思想 ……………………………207
第一节 研究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必须着眼其特
点和着眼其发展 ……………………………207
一、战争的情况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
规律……………………………………………………………208
二、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和指导规律是变化和发展的……………212
三、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216

第二节　战争的客观规律和人的自觉能动性 ……………219
一、战争的客观规律是可以认识的……………………………………220
二、战争中人的自觉能动性…………………………………………222
三、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高度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227
四、兵民是胜利之本…………………………………………………229
第三节　战略学和战术学中的唯物辩证法诸范畴 ………233
一、全局与局部………………………………………………………234
二、进攻与防御………………………………………………………237
三、主动与被动………………………………………………………241
四、直线与曲线……………………………………………………… .46
第七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252
第一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 ……………252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
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253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256
三、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
不断地得到解决……………………………………………………261
第二节　正确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264
一、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一项长期的根本任务………………264
二、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268
三、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73
第八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 …………………278
第一节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
社会矛盾 ……………………………………………278
一、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是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史上的新课题……………………………………………279
二、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性质完全不同的
两类矛盾……………………………………………………………282
三、民主与专政的方法是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基本方法………286

第二节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291
一、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内部矛盾处于突出的地位…………291
二、人民内部矛盾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293
三、健全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296
第三节　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301
一、私有制改造完成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302
二、剥削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304
三、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阶级斗争……………………………………………………307
第九章　群众路线　……………………………………309
第一节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309
一、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310
二、为群众谋利益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314
三、领袖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319
第二节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326
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无产阶级政党实行正确领导的基本方法……………………………………………326
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331

第一章　绪　论

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同属于一个哲学思想体系。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经验的最一般理论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哲学。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学习和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经验的最一般理论概括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经验的最一般理论概括。它在实现这一结合时，对于中国的优秀哲学遗产进行了批判总结，因而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与中国民族形式的有机统一。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继续

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首先应该弄清它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弄清这一问题，对于认清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内容，它的阶级属性和历史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中国的土壤上和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是，它并不是纯粹中国民族的东西。从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形成和发展的实际历史过程，以及它的根本的理论内容来看，它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而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继续，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任何哲学学说都是适应一定时代的斗争实践需要而产生的，是这种斗争实践在理论上的表现。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于二十世纪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决非偶然。现代中国的革命斗争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它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的革命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它理应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尤其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而在中国革命的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但已经完整地形成，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而且它的科学性已为俄国十月革命所证实。正因如此，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的中国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乃是题中应有之义。

毛泽东哲学思想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继续，既是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它给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提供了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一成不变的经院式的宗教教条，而是实践的哲学，是蓬勃的现实生活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在理论上的结晶。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先后进到了帝国主义历史阶段。与此相联系，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了大规模的和持续不断的性质，先后兴起了两种类型的革命高潮。第一种类型的革命发生在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俄国的十月革命正是这一类型的代表；第二种类型的革命发生在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首先发生在东方的各个落后国家，其中，中国的革命正是它的突出的典型。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毫无疑问，它将随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革命斗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得到发展。列宁曾密切地关注亚洲的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出现的革命斗争，并给以极高的评价。他不但认为亚洲革命风暴的盛行开始了"'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而且还预言：如同在过去的革命时代里马克思主义学说获得了胜利一样，在"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①历史的发展证实了列宁的预言，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思想不论在俄国还是在中国，都得到很大的发展。列宁哲学思想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继续，毛泽东哲学思想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继续。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产生于本世纪的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期，成熟于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中期。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实际历史进程也清楚地表明，它是从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运用中得来的。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440页。

如人们所知，中国的革命经历过艰难的历程。近代中国人民经过多次浴血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只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当着先进的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学会了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中国人才从思想到生活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革命的面目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党的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其青少年时期都程度不同地受过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资产阶级“新学”的教育与洗礼。他们只是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论，并抛弃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思想理论禁锢之后，才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根本历史任务，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斗争实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特别是在同党内所存在的主观主义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我国三十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哲学著作，如《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哲学的贫困》、《自然辩证法》（摘译）、《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已陆续翻译出版。同一时期苏联哲学界撰写的一些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论著，如西洛柯夫等主编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主编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也翻译过来。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如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等也相继问世。国内外这些著作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深入的传播，对于促进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形成和成熟，都发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毛泽东同志在1937年间曾经指出：由于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是合乎历史

实际的，其中所说的“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潮”，自然也应包括当时正处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内。因此，把毛泽东哲学思想说成是纯粹中国民族的东西，甚至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完全错误的和没有根据的。

毛泽东哲学思想既然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运用而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继续，那末，毫无疑问，它的根本理论内容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是一脉相承，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属于同一个哲学体系，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特征、乃至基本的原理和基本范畴，都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一致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在中国的土壤上和群众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哲学思想，当然不可能在所有一切方面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一样，它必然会具有自身的某些特点。然而，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所有新颖之处，又都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们或者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采取了民族化的表述方式，以易于为中国人民所接受，或者是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使某些哲学概念和范畴的含义有了新的发挥并具有了综合性的特征，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但就其根本的理论内容来说，却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换句话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既不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单纯地由批判和改造中国旧哲学而来的独辟蹊径的一种新的哲学，也不是凌驾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上的哲学，恰恰相反，它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现代中国条件下的直接继续。

应该指出，我们说毛泽东哲学思想就其根本内容来说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一致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继续，这决不是说它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重复。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贡献了许多新鲜内

容，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中的璀灿瑰宝。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使之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马克思指出，哲学的任务不只是解释世界，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毛泽东同志也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形成了诸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和一整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从而提高了我们党的领导艺术和斗争水平，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则运用于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使之具体化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内容得到充分展开和具体体现，并在中国这块广阔的土地上变为现实。应该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使之进一步具体化，成为活生生的实践的哲学，并使这一科学理论转化为现实，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的主要贡献。

第二，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若干原理作了进一步深刻的和系统的论述，从而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同志撰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的哲学思想，是这一贡献的集中体现。比如，毛泽东同志着重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提出和论证了认识过程两个飞跃的重要思想，对于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作了系统地阐述和发挥，等等，这些，都使马克思主义认识

论和辩证法更加充实、丰富和完善。毛泽东同志对社会基本矛盾所作的概括，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具体分析，对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态势的剖析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所作的阐发，也都丰富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第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作指导，探索和研究实践中提出的新课题，提出了某些新的理论和结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增添了崭新的内容。比如，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完整学说，其中特别是关于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以及关于研究战争问题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军事辩证法等等，就是贡献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中的十分新颖的内容。

二、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最一般理论概括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①，"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②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时代。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的伟大国家。现代中国的革命是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最伟大的革命，它对人类历史进程发生着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哲学思想诞生在伟大时代、伟大国家和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它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哲学总结，正是集中了中国现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最精致、最珍贵"的精髓，体现了我们"时代精神的精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

② 同上，第120页。

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包含着两重任务，即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两种性质的革命是相互衔接的，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则是前者的必然趋势。中国的革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进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然而，这个结合是不容易的。从认识论上说，它经历了两个相互联结的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从一般到特殊，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仔细而缜密地研究中国特殊的国情，探索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和特殊道路，用以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第二个过程是从特殊到一般，就是把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上升为理论，作出符合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新的理论概括。这两个过程的有机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①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革命的理论表现，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经验的最一般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中国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就必须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必须研究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所遇到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1919年，列宁在对东方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的代表的讲话中曾经指出："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8页。

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①中国革命的情况也正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斗争中，曾经遇到过以下三个最为尖锐和紧迫的重大理论课题与实践课题，这些课题是在任何一本共产主义著作中和任何一国党的决议里都找不到现成答案的，而我们党在认识和解决这些课题上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其一，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我们党的二大和三大虽然初步地认识到中国现代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由于党在幼年时期马列主义素养不高，也缺乏对中国社会历史状况的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因而这种认识还比较肤浅。党的六大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仍未给予足够的理论说明。与此相关，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对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缺乏正确的认识，教条式地搬用俄国十月革命时期对待资产阶级的经验，从而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其二，关于中国武装革命的具体道路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提高了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坚决地和迅速地开展了武装斗争。但是在斗争初期，对于武装革命的具体道路问题还缺乏认识，照搬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武装起义为中心的经验，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频繁地举行起义，结果被优势的敌人打得惨败；其三，关于革命的依靠力量问题。在以农民为主要群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革命如何确定革命的依靠力量，这是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这一问题，在我们党建党以后、乃至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得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04页。

到很好解决。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无论是主张“二次革命论”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还是主张“不断革命论”即“超阶段论”的“左”倾冒险主义者，都不能找到真正的依靠力量，他们或者想依靠资产阶级，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或者单纯依靠工人阶级，让无产阶级去孤军奋战，因此都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危害。

毛泽东同志是实现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杰出代表。他笃信马列，但又从不迷信马列的“本本”和外国的现成经验，而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潜心于中国社会状况的实地调查和研究，因此，他能够正确地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提出的种种问题，作出新的理论创造。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他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与作用，从而正确地确定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杰出理论篇章。大革命失败后，他集中精力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在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新概念，探索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为特征的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等文献的产生，标志着这一问题的解决。为了找到革命的真正依靠力量，也为了使年轻的中国工农红军能够站得住脚，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首先是对中国农村，作了反复的和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根本力量是工农，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在此基础上，联合其他小资产阶级和进步的资产阶级。他还确定了“依靠群众，团结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这样，就使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和争取了中国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形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他撰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论政策》、《新民主主义

论》和《论联合政府》等重要文献，正是对这一问题在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

任何革命运动总是在一定的哲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我们党在诞生以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对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的许多重大问题未能给予正确回答和解决，是同全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平不高直接相关的。因此，对于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但需要从一般理论上而且尤其需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加以概括和总结。尤其是鉴于“左”倾教条主义者使用的主观主义思想方法造成的严重危害，更增加了从哲学上阐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才在紧张的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把极大的精力倾注于哲学的探索和研究，从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中寻找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当然，也应顺便指出，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各门科学中一种最高的和最抽象的科学形态。它是以约赅博、以简驭繁，在精确的概念和洗练的语言中包含了极丰富的内容，故能适用于人们对一切事物的观察。正因如此，它同现实客观事物间的联系就不那么直接，而是要经过许多中间环节，要通过许多具体的科学研究和对一系列具体实践经验的总结。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简单综合，而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经验的一种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科学结论。

我们党领导的长期革命斗争实践所提供的经验是十分丰富的。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命题，正是对这一基本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他撰写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也正是对这一基本经验所展开的哲学论证。他指出，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相一致，这是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一个根本原则，同时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和关键，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得出的根本结论；而以往的一切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正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为了深入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为了廓清机会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在思想理论上所造成的混乱和影响，从根本上实现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高度统一，毛泽东同志全面地考察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着重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他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他指出真理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在斗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真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到检验，等等。不消说，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这些论述，既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也是对机会主义、特别是对教条主义割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凝固化、绝对化错误倾向的清算和批判。

客观事物的辩证法创造出观念的辩证法。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必然会创造出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有极大灵活性的主观辩证法。毛泽东同志为了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指导全党正确地认识和解决我国革命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复杂矛盾，深入地探索和研究了唯物辩证法，着重阐明和发挥了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即对立统一规律。他强调指出，研究事物的矛盾不但需要研究它的普遍性，尤其需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因为只有对事物的特殊矛盾进行深入的和具体的分析，才能采用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哲学思想，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他提出的关于“共性个

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思想，关于研究事物矛盾状况时要着力于研究矛盾的不平衡性和差别性，要着力于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思想，关于事物矛盾双方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运动变化的思想，以及关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和事物发展的波浪式等等思想，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展开。由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毛泽东同志曾特别着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战争理论和军事辩证法的研究；又由于中国革命的异常艰难，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斗争中，必须极其谨慎，讲究策略，讲究斗争艺术，因而，他又十分注重对政策、策略和工作方法的研究。所有这些，也都是中国革命中的活生生的辩证法在理论上的表现。

我国的革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东方大国里进行的，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和残暴，而革命力量却比较弱小。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先锋队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则需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紧紧地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中，我们党获得了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和倡导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则是对这一斗争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我们党也正是依靠这条群众路线，才使自己的力量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从而克服一切困难，战胜国内外的敌人，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来，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的历史课题。毛泽东同志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经验，他提出和阐明的关于社

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和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是对这些经验所作的初步的哲学概括和总结。

总之，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运用和发展，都是围绕着科学地说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它的每一个哲学概念都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溶为一体、水乳交融。

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全面地总结了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并深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从而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马克思说："哲学是通过人脑和世界相联系，然后才用双脚站到地上。"①恩格斯也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在全部理论思维中，哲学是最高和最具有概括性的思维形式。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只有以科学的哲学理论为依据，并对它的实践经验及时地从哲学上加以概括和总结，这一运动才可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才有可能取得胜利。毛泽东哲学思想之所以成为全部毛泽东思想的基石，成为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因为它忠实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又深深地扎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它的生命力和全部价值就在于，它依据中国革命和建设所提供的丰富经验，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③并反转过来指导和推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7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

三、对中国优秀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

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但需要研究它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而且还需要研究它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

前面说过，毛泽东哲学思想，就其根本的理论内容和世界观体系来说，不是从继承与改造中国自身的哲学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它的直接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继续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经验的最一般的理论概括。但是，这并不是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存在和发展可以离开中国自身固有的哲学传统。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要使在中国已经发展着的辩证法唯物论思潮得以继续深入与发展下去，并确定地指导中国革命向着彻底胜利之途，便必须同各种现存的反动哲学作斗争，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树立批判的旗帜，并因而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才能达到目的。毛泽东同志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① 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在中国土壤上产生和形成的科学的哲学学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续和发展，它不可能离开中国固有的哲学传统，不能不带有中国的民族特色。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民族化。这里所指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有范畴和原理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中国，也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原理或原则都用中国的民族语言重新加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在内容上，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页。

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①；在形式上，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民族的思维方法、语言形式等特点相结合，使之具有中国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这就是说，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使之具体化，并赋予它以中国的民族形式。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它的哲学传统源远流长。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周时期，即在欧洲最早的古希腊哲学出现前近半个世纪，就产生了哲学思想的萌芽，在《易经》、《尚书》和《诗经》等典籍中，就包含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哲学约与古希腊哲学同时进入它的繁荣时期，哲学各领域中的主要命题和基本概念已大部分提出，产生了许多光辉的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学思想，这在世界哲学史上也是少见的。我国古代丰富的哲学思想不仅见诸于哲学家们的大量的哲学专著，而且还生动地具体地反映在历代兵书、药典、文艺作品等文化典籍，乃至民间的成语、谚语中。与欧洲哲学进入中世纪后即停滞不前、甚至产生倒退相反，中国的传统哲学在进入封建社会后，又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至明清之际发展到它的高峰。中国是一个具有优秀哲学传统的国家。中国的哲学以其丰富而深刻的内容，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份珍贵遗产，也为世界文化思想的宝库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惜的是，近几百年来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较之欧洲远远地落后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通过对中国自身传统哲学的改造实现哲学的根本变革，就是说，不可能在中国的国土上产生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科学的哲学学说。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0页。

对于中国古代丰富的哲学遗产，应当加以批判地继承。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内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并卓有成效地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前进的重要条件。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中一切合理的和进步的思想，同时对于其中的某些消极的、落后的、甚至腐朽的东西加以彻底的清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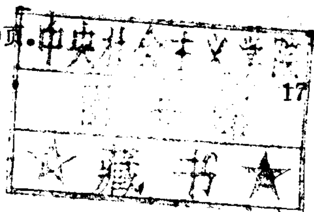
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表现于思想内容、历史资料和表达方式等诸多方面。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对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某些重大哲学问题进行科学的总结。

认识论上的知行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的哲学家们都把知和行联系起来，提出关于知行关系的学说。自宋代以后，知行关系问题的争论便以更明确、更自觉的形式提了出来，先后讨论过知行先后、知行难易、知行分合、知行轻重等几个方面的问题。我国历代哲学家们在认识知行关系问题上虽然也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思想，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不可能对“行”作出科学的解释，因而也就不可能在总体上对知和行的关系问题，给予正确的回答和解决。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页。



对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的各种学说作了系统的清算和科学的总结，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同志科学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特别强调了“人类的生产活动是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①，这就从根本上批判了一切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对实践的种种片面的和错误的认识，把知行问题从抽象的纯观念活动和个人的道德修养、道德实践的狭隘圈子里解放了出来。毛泽东同志把认识论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全面地论述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以及认识对实践的巨大能动作用，这就有力地驳斥了“知先行后”、“理在事先”之类的唯心主义先验论错误，也批判了关于知行分合和知行孰轻孰重之类的形而上学错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一认识运动的总公式或总规律，以及他作出的关于“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一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结论，是对我国传统哲学中知行关系问题所作的辩证唯物论的科学结论，也是我国几千年来知行学说的发展所得出的最高结论。

同样，毛泽东同志在其论著中，对于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两种发展观的对立和斗争，关于历史观上的道德与功利、动机与效果的争论，也都作了科学的批判总结。

第二，对中国文化典籍中的某些言简意赅的词句和丰富的思想资料，加以引伸、发挥或改造，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重要的原理、原则，充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

在毛泽东哲学思想里，有不少概念和范畴援引了我国古代的思想资料。引古语见新意，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比如，毛泽东同志用“实事求是”一词来表述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路线与工作方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带上了鲜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9页。

明的中国特色。毛泽东同志借用“有的放矢”一词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借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来说明党内整风和人民内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宗旨，等等。所有这些，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已逐步形成为用以表述特定内容的专门术语。

毛泽东同志在其著述和讲话中，善于引证中国古代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警句、名言，以及散见于文艺、历史等著作中的成语、典故，流传于民间的谚语、寓言、故事等等，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道理，令人感到亲切易懂、饶有风趣。比如，他引用《易经》里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说明中国古代的两点论；引用老子《道德经》中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名句，说明“物极必反”的道理；引用《孙子兵法》中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说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引用《庄子》的“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说明事物的无限可分性；引用班固《前汉书》中的“相反相成”，说明矛盾的同一性；引用魏征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说明认识的全面性；引用朱熹的“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明要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引用岳飞与宗泽在论兵时说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说明战争指挥中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同志还善于把历史经验提到哲学高度来加以阐发。例如，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引用“曹刿论战”的故事说明战争的发展不是一字形而是之字形；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引用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列举的历史上许多名人因遭受挫折而发愤的事实，来教育那些犯了错误或受了委屈的干部不应使自己消沉，而应接受教训，矢志不移，发愤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这样，就使人们从历史事实中学到了哲理，收到了效益。

第三，结合现实斗争的需要，清算和批判中国传统哲学中的

封建糟粕，从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的批判精神。

在毛泽东同志看来，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矛盾和斗争，都是同一定的哲学思想相联系的，并在一定的哲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它们程度不同地反映着两条对立的哲学路线。因此，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揭露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想的本质，就需要把现实的思想斗争同对中国哲学史上某些错误观点的批判和清算结合起来。比如，毛泽东同志在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批判党内的主观主义错误倾向时，曾经集中地批判和清算了中外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宇宙观，揭示了形而上学的思想特征和阶级本质。毛泽东同志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曾经批判过党内那种把整风和生产分割开来，忽视生产，轻视经济工作的错误倾向。他指出，引起这种错误倾向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是“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而我们现在还“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在毛泽东同志的著述中，还有许多类似的批判。比如，在宣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时，批判过中国哲学史上的“唯理论”和认为只有人的内省体验是真实的那种唯心主义经验论；在宣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时，批判过孔孟哲学中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也批判唯心主义天才论，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同各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前进、发展的。毛泽东同志在批评错误思想时也是同批判传统哲学中的某些形而上学唯心论结合起来，从而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和战斗风格，有力地推动了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

四、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还应该弄清毛泽东同志的个人智慧和全党集体智慧的关系。

以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毫无疑问，主要是通过毛泽东同志个人的理论思维和辛勤劳作形成的。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实现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最早的和最杰出的代表。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同我们党领导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斗争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的名字是中国革命胜利和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象征。毛泽东同志作为我们党的主要领导者，在他生活和斗争的大部分时期内，总是比别人站得高些，看得远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得更深入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能力也更强些。他的高度的理论修养和巨大的理论勇气，他的渊博的知识，以及他的可贵的求实精神，都促成他能对中国革命的经验作出更高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够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一门科学，它的主要原理是由毛泽东同志加以概括和阐发的。毛泽东哲学思想集中地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和他的其他科学著作中，因此，以毛泽东同志的名字来命名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当之无愧的和符合客观实际的。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经验的最一般的理论概括，从根本上说，它又不单单是毛泽东同志个人智慧的产物，而是全党集体智

慧的结晶。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和其他科学著作中，而且也表现在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著作、党的历史文献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我们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首先，反映在毛泽东同志哲学著作中的最一般的理论原则，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深刻阐发的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丰富内容，从根本上说，是从党所领导的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中获得的。没有这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就不可能产生毛泽东哲学思想。黑格尔说过，个人是他的民族、他的世界的产儿①。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正是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它是现代中国革命的产儿。大家知道，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中国便已经是一个革命形势很成熟的国家。由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革命形势所决定，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所有党的领导者，在建党以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只能将全部精力集中到解决革命实践中的紧迫问题上，无暇作长期的和系统的理论研究工作。中国革命的经验只能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在全党的集体奋斗中去获得。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和包含了丰富哲学内容的其他科学著作，固然是由毛泽东同志通过对实际情况的详细的调查研究和总结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同时也是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不懈的英勇斗争分不开的。离开了后者，他的哲学思想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毛泽东同志历来认为，作为一个革命的领导者，必须时刻注意总结群众的经验和创造，必须先当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当群众的先生。他也始终认为，他只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代表，而毛泽东思想则是全党集体智慧的产物。他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的报告中明确表示：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1948年8月，毛

---

① 参看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48页。

泽东同志在致吴玉章同志的信中曾经批评过关于“毛泽东主义”的提法，他说：“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①他还说过，《毛选》里写的东西是群众教给我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次，在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中，有些篇章和个别哲学论断是由党的其他领导同志提出，后来被毛泽东同志吸收、采纳，作了新的理论发挥，因而是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集体创作的产物。比如，毛泽东同志于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原名《关于调查工作》）一文中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哲学论断，它的先声就可追溯到《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这封指示信是周恩来同志听取了陈毅同志关于红四军两年来斗争情况的汇报之后，作了许多口头指示，并委托陈毅同志代中央起草（经周恩来同志审定）的。指示信特别强调，“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这个工作做得好，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②毛泽东同志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正是中央九月来信基本精神的进一步体现和贯彻。又如，毛泽东同志于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的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理论，其基本观点可以追溯到1956年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03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页。

是根据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文中在分析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时，坚持把唯物辩证法贯彻到底，批评了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有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首次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并涉及到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有些重要观点和命题是由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首先提出，尔后由毛泽东同志加工、提炼、概括和总结的。例如，“群众路线”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就是一个典型例证。“群众路线”作为一个有比较明确含义的概念加以使用，最早见于1929年9月周恩来同志主持起草的《九月来信》。信中专节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并就筹款工作，指出“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而要“经过群众路线”；还说没收地主豪绅财产，也“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①。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围剿”的艰苦环境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瞿秋白、张闻天等同志，对群众路线问题都有重要论述。毛泽东同志把这些论述加以提炼和概括，使之系统化和理论化，逐步形成了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又如，1958年初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是由毛泽东同志和中央与地方的一部分领导同志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共同汇集，尔后由毛泽东同志加工整理而成的。毛泽东同志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说：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记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条文(关于规章制度)是由刘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

---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39页。

还有，在毛泽东同志在世时或逝世以后，有些重要的哲学思想、哲学论断或命题，虽然并没有经过毛泽东同志本人的加工、提炼和概括，但就其内容说，却符合于整个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经验的最一般理论概括，也应看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总之，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是这一集体智慧的最杰出的代表。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化为指导实际工作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推动了哲学解放的伟大事业，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哲学。它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理论指南。

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化为指导实际工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它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

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也是一个东西。

坚持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强调哲学理论的实践性和方法论意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以往一切旧哲学相区别的一个基本特点。马克思曾经指出，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是脱离实践，不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并指出，以往的一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为了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的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②，并反复声明他们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③列宁也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的认识工具"④。他认为，如果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基本特点，把理论与实践、世界观与方法论割裂开来，"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⑤，就会陷入唯心论和机会主义的泥潭。

当然，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这决不意味着两者的绝对等同。世界观和方法论既是同一的，相互联系的，但又是相互区别的。世界观是关于宇宙自身最普遍、最一般规律的学问，方法论则是人们如何应用世界观的学问，是世界观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正因为如此，人们完全可以依照研究问题的不同范围，对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个一致体的不同侧面进行单独的或侧重的研究。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4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⑤ 同上，第398页。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为了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始终十分重视对方法论问题的研究，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际斗争中的运用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深刻地阐发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相一致的原理，并反复强调了方法问题对于保证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作为革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不但要善于提出革命的任务，而且还要善于解决完成革命任务的正确的方法问题。方法犹如过河的桥或船，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革命任务的完成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同志经常注意从方法论上总结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指导党在各个时期、特别是革命转折时期的工作，从而使我们党的领导艺术和斗争水平不断提高，使我们党领导的各项事业成效卓著。他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以及《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等专门论述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问题的著作，也正是我国革命斗争经验在方法论上的科学概括和总结，是具体地论述哲学方法论的杰出篇章。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造性地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全部工作的指导，在斗争实践中逐步提出和形成了一整套具体的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间环节”（即中介）问题，提供了革命理论达于革命实践的不可缺少的桥梁。

毛泽东同志关于工作方法的理论，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科学体系。其中，既包括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

众路线、独立自主、个别与一般相结合等这样一些相互联系的高层次的和最基本的工作方法，也包括由这些基本方法所派生的诸如蹲点、解剖麻雀、以点带面、胸中有数、分清主流和支流、两条腿走路、抓两头带中间、学会弹钢琴、冷热结合、留有余地、互通情报、注意一种倾向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等等这样一些较低层次的具体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毛泽东同志提出和倡导的这些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在实际工作中简单的逻辑推导，而是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实践中，特别是在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逐步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我国革命斗争丰富经验的结晶。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正确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鲜明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本特点，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革命斗争实践的日益紧密结合。毛泽东同志提出和倡导的关于工作方法的理论，不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而且构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鲜明特色。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许多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同志关于方法论的思想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地得到发展。

二、让哲学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和以往一切旧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少数人手里的书斋哲学，而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实现彻底解放的哲学。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①列宁也曾经指出，马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

思主义哲学是全人类的、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伟大认识工具，它给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历史功绩，也正在于他们用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武装广大群众的头脑，使他们“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②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解放哲学，然而，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起来，真正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思想武器，却并非易事。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其他任何哲学一样，毕竟是高度抽象的东西，要使广大群众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但需要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提高人民群众获得自身解放的程度，而且还需要解决马克思主义自身的通俗化和群众化的问题。哲学的解放是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精神条件，也是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哲学的解放总是同革命事业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革命斗争实践的发展需要哲学的解放，而哲学的解放反过来也必然会有力地促进革命斗争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都十分重视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道理去武装人民群众的头脑，并撰写了不少较为通俗的哲学著作，成为每个觉悟人民必读的教材。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总是身体力行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他反复强调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指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意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说，我劝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6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87页。

同志们要学哲学。又说：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毛泽东同志又最善于运用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优秀成果去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一般原理，用生动朴实的语言去通俗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道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成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东西。他指出，人民群众之所以感到学哲学很困难，并不是因为哲学就那么难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善于讲解哲学的书；所谓善于讲解的书，就在于用通俗的语言，讲亲切的经验。毛泽东同志撰写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正是以简洁、生动、鲜明的笔调讲亲切经验的书，因而这些著作通俗易懂，成了广大群众的极好教材。毛泽东同志还发出了“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①的伟大号召，这对于破除关于哲学神秘的传统观念，推动群众性学哲学、用哲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密切结合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日益为中国人民所掌握和运用的历史。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特别是在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革即革命发展处于重大转折的前后，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常常作为首要的突出问题被提了出来，为人们所关注，由此产生哲学战线不同形式的激烈斗争，并伴随着出现哲学解放的高潮。五四前后，在我国出现的思想理论战线上的论战是如此，后来我们党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也是如此。全国解放后，由于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由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居于主导地位，就为广大群众学哲学、用哲学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条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群众的结合延伸到更广阔的范围，达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建国初期，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以树立劳动观点、阶级斗争观点

①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1963年）。

和群众观点为主要内容的马列主义哲学的教育运动，有力地促进了广大人民群众思想觉悟的提高，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后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日益觉悟到理论的力量，迫切要求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武装头脑，指导工作，于是，群众性学哲学、用哲学的活动就普遍地开展起来。当然，哲学解放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和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盛行起来，从而给哲学解放带来严重危害，扩大了哲学同群众的距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我们党和邓小平同志领导的对“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批判和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广泛讨论，是对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次更加普遍和深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哲学解放运动。通过这场批判和讨论，极大地提高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使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了重新恢复和确立，并推动了我国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毛泽东同志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①我国革命的历史也正深刻地表明，广大人民群众一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会唤发出无穷无尽的力量。

坚持哲学的群众化，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普及与提高是对立的统一，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既需要提高，也需要普及，两者不可偏废。正确的方针应该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哲学工作者

①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人民出版社版，第1页。

不能忽视或贬低普及工作。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指出，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在目前条件下，若以普及与提高相比较，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曾多次谈到哲学普及工作，号召全党要花大气力去建立无产阶级的理论队伍，要加强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教育。应当说，密切结合群众的生活、思想与感情，用群众所熟悉的事例和语言，写出短小精练、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引人入胜、雅俗共赏的哲学普及读物，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需要做出艰苦的努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科学性和群众性本来是一致的。因此，把哲学群众化、通俗化，决不是使它简单化和庸俗化，更不是抛弃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我们既要注意防止和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同时也应注意防止和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加以简单化、庸俗化以及形式主义、实用主义的倾向。

马克思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①他还曾经预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随着哲学的大范围的普及，“世界将成为哲学的世界”。现在，我们离马克思所预言的那个时代还十分遥远；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哲学，已逐步成为我国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各项斗争实践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可以预断，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也必然会对群众性的学哲学用哲学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我们哲学工作者，应当把哲学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

继续解放作为自己的崇高职责。

三、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南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现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项根本任务。

在新的历史时期内，在今后长远的征途上，我们必须象过去一样，依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去夺取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胡耀邦同志说：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从来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可动摇的一项基本原则。

作为毛泽东思想哲学基础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与社会生活隔绝、停滞不前的。它是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而向前发展的。必须以新鲜的革命经验丰富它，才能使它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说，今天的情况已与以往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就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某些具体内容来说，比如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等，其适应的范围也随着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现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掌握，也远比过去准确和深刻。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中所包含的基本的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由于它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的根本历史特点和我国革命发展的一般规律，因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不仅适用于我国的过去，而且还适用于我国的现在和将来。特别是鉴于在过去的若干年内，由于十年动乱和林彪、“四人帮”篡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毛泽东哲学思想，使千千万万青年一代未能系统地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内容，使中年和老年人的理论学习也受到干扰，甚至被迫中断。所以，要战胜横亘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各

种困难，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就必须牢牢地学习和坚持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指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应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不但已经系统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和关于正确认识与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学说，而且还以这些正确的理论和学说为指导，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提出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要思想。这对于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发展，有现实的意义；其二，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基本的理论内容和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着普遍的和深远的指导意义。我们之所以强调要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哲学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指导作用，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短短几年内，在实现我国伟大的历史转折和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伟大斗争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大家知道，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在一系列工作的指导上曾经犯过主观主义的错误，致使我们的国家出现了动乱和危难的局面。然而，历史的事实却又深刻地表明，对上述错误、其中包括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加以纠正和解决的，并不是依靠别的什么理论，恰恰正是依靠毛泽东哲学思想，

依靠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武装和哺育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中特别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党正是由于坚持和依靠了以实事求是为精髓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开展了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清算和批判，从而才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才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才开拓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胡耀邦同志在谈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各个方面取得伟大胜利的原因时指出："党所以能取得上述许多方面的胜利，归根到底，是由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科学原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创造历史的科学原理。事实不正是这样的吗？党坚决相信人民，依靠人民，顺应了人民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潮流。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人民对党寄以很高的希望。人民要求拨乱反正，要求安定团结，要求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高。党正是集中了人民的意志，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把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重新引上康庄大道。人民对党的信任和支持，是我们的事业能够不断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①胡耀邦同志的这段论述深刻地表明，我们党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所取得的胜利，正是坚持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的结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于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引下进行的。比如，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为了克服"左"的错误，使经济工作摆脱贪大求多的积弊，真正做到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讲求实效，就倡导认真分析和研究我国

① 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人民出版社版，第7页。

的国情，想问题、出主意，办各项事业，都从我国人口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耕地少，底子薄这样的基本国情出发。而认识国情，正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运用和体现。邓小平同志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坚持毛泽东哲学思想、并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杰出代表。他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即实事求是的思想运用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明确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根本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他把党的八大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的原理运用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实现经济现代化、政治上高度民主和思想文化上高度文明的三个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他从我国具体情况出发，围绕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思想，还提出了其他一系列科学论述和重要的战略决策与指导方针，等等。所有这些论述和决策，归根到底，也都是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提出来的，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进一步运用、展开和深化。如同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① 胡耀邦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说：“我们要善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又说：“如果说我们共产党人也有传家宝，那么马列主义、毛泽

① 《邓小平文选》，第264页。

东思想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传家宝。”

搞好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和复杂艰巨的事业。我们党在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解决了一批问题，其中包括深入地分析和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的国情，在此基础上制定和实施了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发展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开展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从而开拓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但是，这并不是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均已获得解决。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刚刚步入正轨，我们的建设经验毕竟还不够丰富，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尚未进入自由王国阶段。要胜利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必须进一步坚持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导。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但对于我国的物质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在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学习和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有助于提高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水平，也有助于改进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高全民族的思维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思维科学化。邓小平同志提出，“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①而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②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论述，高度地评价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指导作用，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我们哲学工作者提出了战斗任务。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努力学习和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143、267页。

第二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历史过程，是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实践中实现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在总结中国革命斗争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土壤上逐步形成、又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这既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及其在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任何哲学都是适应一定时代斗争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一种科学的哲学学说，它是近代中国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的理论表现，是中国人民长期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这块土壤上产生，有

其深刻的历史的、现实的和理论的根源。

一、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和我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具有悠久而光荣历史的国家，由于长期的封建社会制度的落后，社会发展十分缓慢。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种独立发展的进程终因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而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用炮舰冲开了中国的封建大门，使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第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入，逐渐破坏了中国固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给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前提，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它又和中国封建势力一起，严重地阻碍着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中国就逐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第二，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投资、开办企业和我国民族工业的缓慢发展，在中国的历史上就产生了一个新兴的革命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到1919年，中国的产业工人队伍已发展到二百多万人。第三，外国资本列强和中国封建势力相互勾结，沆瀣一气，更加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遂使中国的社会矛盾变得更加尖锐激烈。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争夺愈演愈烈，中国成了世界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中心。帝国主义为了自身的利益，各自支持中国的一个封建军阀，挑起军阀战争，以致战争连年不断，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可爱的祖国濒临危亡的境地。不难看出，在近代的中国，帝国主义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内部固有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近代中国成了世

界东方各种矛盾的焦点。中国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重，反抗愈烈。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必然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八十年中，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反抗阶级压迫，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和波澜壮阔的英勇斗争，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义和团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所有这些斗争，都充分地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这对于动摇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阻碍帝国主义列强直接瓜分中国，以及促进人民的觉醒和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需要有革命的思想理论作武器，尤其需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相适应，曾经产生了许多反映这一斗争并为之服务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理论。其中有地主阶级开明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的改良主义思想，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提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也有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由于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的落后，也由于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十分软弱，因而中国自身不可能产生出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于是，“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① 这样，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一个时期内，学习“新学”即西学遂成热潮，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被大量地介绍到中国来。“洪秀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3页。

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①

作为“新学”的哲学基础，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中国“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②，它们以此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武器。“新学”的拥护者们力图用进化论的观点同当时统治中国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主义形而上学传统观念作斗争，并为变法维新和革新社会作论证。比如，康有为就曾经说过：“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③因此，他认为，“为治之道，在审理势，势本无强弱大小，对较而后分。理难定是非美恶，随时而易义。”④他从“新则壮”这个“物之理”出发，得出“为治之道”必须“随时而易义”，这就为变法提供了哲学根据。“新学”的拥护者们在理欲、名实、人性、知行等认识论的关系问题上，也力图用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去反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以便为资产阶级谋取功利、寻求个性解放作论证。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对于促进我国人民的觉醒、推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我国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不论在当时的西方还是后来传入中国，都有其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其本身则是一种非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自然观上，它虽然承认发展变化，却否认事物的根本质变；在认识论上，不了解实践的真正含义及其在认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常常割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

③ 《上清帝第六书》。

④ 《上清帝第四书》。

裂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在历史观上，则否认阶级斗争，否定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因此，这种哲学思想不可能揭示近代中国社会的矛盾本质，不可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指明出路。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反抗阶级压迫，进行了长期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但是结果都失败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近代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固然，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缺乏先进阶级和先进阶级思想的指导，则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①近代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实践表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因而它们提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和旧民主主义思想是注定要失败的，它们向西方资产阶级学习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乃是一种陈腐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也不可能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要彻底解决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必须有先进的革命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必须有彻底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思想武器。这样，近代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7页。

中国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的存在以及中国人民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准备了社会条件。

二、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谋求解放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历史上最科学、最完备和最革命的哲学。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正当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也恰巧在欧洲产生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广泛传播了。由于历史条件限制，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如前所述，他们首先接触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他们甚至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之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在热衷于向西方资产阶级学习。中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有一个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被中国人接受，需要有国际和国内的历史条件，其中最根本的还是中国革命自身的需要。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①

中国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和被一部分先进分子所接受的重要思想条件。辛亥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鼓吹的那套“新学”消声匿迹了。然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其中包括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并未因此停息。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以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4页。

科学与民主为旗帜，开始了以批孔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比较彻底的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对近代中国的革命产生过重要影响。当然，新文化运动也并未超出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它主张实现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在哲学上也并未完全摆脱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影响，而且还广泛地传播近代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新康德主义等。因此，新文化运动也不可能为中国人民指明解放的道路。在鸦片战争后至二十世纪初这一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先进的中国人一直认为，要救国图强就只有维新，而要维新就只有向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中国人民的这一认识在经过长期的斗争实践之后，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①，这就使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及其思想理论产生了怀疑和否定。第二，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世界所固有的各种社会矛盾已经尖锐地暴露出来，从而加深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主义各国加紧了对中国的掠夺和压榨，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的情况非但没有丝毫改善，反而一天天地坏起来，这就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这样，通过长期的斗争实践使中国人民终于认识到，中国欲图民族之复兴，人民欲求彻底的解放，必须探求新的真正科学的思想理论。很显然，中国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思想上的条件。

十月革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桥梁。二十世纪初期，随着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有过零星的流传，但未形成独立的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9页。

独立的社会思潮或学说系统传入中国，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也开辟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新时代。斯大林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中的根本转变，是世界资本主义历史命运中的根本转变，是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根本转变，是全世界被剥削群众的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和思想上的根本转变。"①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突破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个体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不能不对近代中国的革命产生巨大和深远的影响。正当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在重新探求革命真理、寻找新的解放道路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指明了出路，于是，"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②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陆续地翻译过来，俄国革命的经验和胜利后的情况被介绍到中国，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和刊物纷纷出现，在一些高等学校甚至还开设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课程，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当说，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起了重要作用。中国的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③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使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圈子里分化出来，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和宣传者。

---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61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9页。

③ 同上，第1360页。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极大恐惧。为了抵制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阻止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他们除通过北洋军阀政府采取逮捕进步人士、查封进步报刊等暴力手段外，还收买了一批诸如胡适、张东荪、梁启超等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来对抗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在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了关于"问题与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三次著名论战。"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由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起的。这场论战的实质，在政治思想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斗争，在哲学上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反对胡适派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论和阶级调和论的斗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是由研究系政客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挑起的。他们盗用社会主义之名，借用罗素创立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即社会改良主义学说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们否认中国有无产阶级的存在和无产阶级的觉悟，断言中国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运动，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无政府主义是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态，而中国又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因此，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有其滋长和传播的广泛的社会基础。在五四运动前夕，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即已在中国广为流传，它甚至在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还占据着优势。无政府主义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又以极左的姿态出现，因而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着混淆视听、以假乱真的作用。无政府主义鼓吹个人绝对自由，主张产品分配的绝对平均，反对建立任何专政的国家，这实际上是反对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上述种种都说明，五四运动前后在我国思想战线上出现的这三次论战，实质上是近代中国的革命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

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命运前途的根本问题。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向马克思主义发动的这几次猖狂的进攻，理所当然地受到我国最早出现的一批共产主义者如李大钊、李达、蔡和森、何孟雄等人的坚决反击。他们运用自己初步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指明中国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有出路。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与反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三次论战，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告终。三次论战的结果，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广泛深入的传播，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一切劳苦大众、特别是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思想武器，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以现代化工业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为物质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能否在各国传播、能否被各国革命人民所接受，取决于这些国家是否存在着新的经济、新的阶级和新的政治力量。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十月革命之后能够广泛地传入中国，被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其深刻的原因在于近代的中国已经产生了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的土壤上扎根的经济根源和阶级基础。中国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新兴的革命阶级，是近代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有坚强的革命性、团结性和组织纪律性。它从诞生时起，就勇敢地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它曾举行过多次罢工和起义，并参加了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不过在当时，由于无产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因此，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它只是作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斗争的，尚处于自发的经济斗争阶段。后来，随着无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壮大，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在近代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是在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发生的。这一运动起初是在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进行的，只是在无产阶级

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参加了斗争之后，才使这一运动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全国性的革命运动，并取得了胜利。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特别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充分地显示出自己的战斗力量。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中国的无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却是一个最先进、最革命、最具有战斗力的阶级，它完全有能力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兴起，进一步提高了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使他们在斗争实践中看到了新的希望，认识到同工农结合的必要性。这就是说，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结合奠定了阶级基础。

第二节　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转变

我国五四运动前后，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转变成共产主义者。这一批共产主义者的出现，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是一种社会潮流，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毛泽东同志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和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并在哲学思想上经历了一个从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

一、毛泽东青年时期的世界观转变

毛泽东的青年时期，正处在近代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时期，进步与保守、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势力进行着殊死的搏斗，各种政治学说和哲学思想竞相出现，斗争异常激烈。中国革命所经历的由

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过程，从思想理论上说，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逐步战胜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程。毛泽东青年时期的世界观转变过程，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缩影。

毛泽东的青年时期，在政治思想上经历了一个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进而到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就萌发了强烈的爱国意识。他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满旧中国的封建腐朽制度，立志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910年，他开始阅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书刊，认为中国只有向日本和英国那样，实行君主立宪，才能走富国强兵的道路。1911年春至1918年夏在长沙读书期间，正值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前夕，社会上新旧两种势力和新文化运动内部革新与改良两种社会思潮的斗争十分激烈。这一期间，特别是在湖南第一师范五年半的学习期间，对于青年毛泽东政治思想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后来回忆说，我在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①。在长沙读书的七年中，为了进一步探索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道路，他孜孜不倦地学习。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未能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读物，当时阅读的都是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东西，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都对青年毛泽东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是，他在一师的许多进步教师的影响下，特别是得力于杨昌济老师的帮助，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研究，很快就抛弃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确立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观念。他在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写道：“吾尝虑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造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

① 转引自斯诺：《西行漫记》，第121页。

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为了改造中国社会，他和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等人于1918年4月共同发起成立新民学会。

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关头，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实现了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毛泽东于1918年夏在一师毕业后，一方面以新民学会为核心，积极开展爱国民主斗争，以便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又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影响，重新思考和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并不断清算自己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1918年8月，毛泽东为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去北京，曾在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过一个时期。这时，他对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和学派进行了比较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认识。在此之后，他回湖南又积极开展湖南自治和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的斗争。1919年7月他创办《湘江评论》，大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在该刊物上他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虽然还不是一篇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但它却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在政治思想上已向马克思主义前进了一大步。1919年12月毛泽东为解决驱张事第二次去北京，又阅读了许多关于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使他在政治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与上述政治思想上的转变过程相适应，毛泽东青年时期在世界观上也经历了一个从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他在探索人生和革命发展道路问题时，是不能不研究哲学的。他从青年时代起

就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阅读了古今中外的大量哲学名著，其中特别是对先秦诸子和明清之际哲学家以及康德派著作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而他所接触到的各种哲学思想，从孔孟儒家、宋明理学的唯心论到王船山、颜习斋的唯物论，从赫胥黎、斯宾塞尔的进化论、康德的二元论到胡适的实用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推崇的唯心史观，到陈独秀、李大钊后来宣传的唯物史观等等，都对它的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发生过重要的影响。因此，在他完成世界观转变以前的一个时期内，他在哲学世界观上就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情况，如同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成了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奇怪的混合物”。这一情况的产生，是青年毛泽东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中的必然过程。青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是围绕着如何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这一根本性问题进行的，不言而喻，他在青年时期的世界观转变过程，集中地表现在社会历史观的转变上。

五四运动以前，我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们，在社会改造问题上都倡导精神革命，主张实行国民的精神改造，以达到富国强兵、再造中华的目的。这种历史观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虽然发挥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本质上却是历史的唯心论，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改造中国社会的任务。青年毛泽东在求学期间，并未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由于受当时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也从精神创造社会文明、推动社会发展这一唯心史观的基本观念出发，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是群众没有掌握“大本大源”即宇宙真理，而群众之所以未能掌握“大本大源”，乃在于中国社会尚未产生出掌握这种“大本大源”的伟大历史人物。1917年8月23日他在给友人黎锦熙的信中说：“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须在显见之形迹，动其心者，当是有大本大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主体，即宇宙之真

理，各具于人之心中……，今若以大本大源为召号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在他看来，“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闻，则沛乎不可御矣。”青年毛泽东提出的正人心、抓学术的主张对于当时救亡图存的全局来说虽有积极意义，但是他把社会的发展归结为思想的力量，把社会的改造寄托在少数英雄人物或一部分知识分子身上，这种历史观显然是唯心主义的。

自1918年夏从湖南一师毕业至1920年底和1921年初这两年多时间内，青年毛泽东认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积极地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并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清算自己的唯心观念，逐步地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具体说来，促使青年毛泽东实现世界观转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从而找到了改造社会的“大本大源”。他认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实现了“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强权者要多”，因而“唯有民众的力量最大。”他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经验中领悟到，我国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正在于没有实现民众的大联合，而中国的革命如能象俄国那样实现民众的大联合，那就可以打破“九重监狱，重见青天”。

第二，通过对《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的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找到了分析复杂社会问题的根本观点和科学方法。1941年毛泽东同志曾经回忆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

认识问题的方法论。”①此时，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使他振聋发聩，开始找到了观察复杂社会现象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他用阶级分析方法观察中国社会的矛盾，进一步认清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根本对立及其根源，从而加深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动本质的认识；他把阶级观点运用于对人民群众的分析，看到了工农劳动群众是人民群众的主体，使他的“民众大联合”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运用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清算自己以往的关于宇宙真理的唯心观念，建立起对唯物史观的信仰。

第三，社会上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战，特别是新民学会内部开展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讨论和斗争，促使他进一步思考和清算自己的政治观点，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认清了十月革命的道路。青年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曾以极大的热情从事“新村”试验，并积极策动和参加了驱张和湖南自治运动，但是结果都失败了，这使他逐步认识到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要改造中国必须另辟出路。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政治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在一个时期内他还尚未彻底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对社会改良还存有幻想。后来，他通过对各种社会学说的反复比较和研究，特别是在新民学会内部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讨论的推动下，认真地总结了以往斗争的教训，使他终于认识到，政治改良是绝没有希望的，只有俄国的道路才是唯一出路。他在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的发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也做

---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

不到。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他还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

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转变，是在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之后实现的。1920年底毛泽东给蔡和森的信和1921年元旦他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的发言，是他最终完成世界观转变的显著标志。他在世界观上的这一根本变化，如同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①。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这一过程，乃是近代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思想表现。

二、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过程的基本特点

二十世纪初，我国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客观的历史潮流推动的结果，是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而产生的，同时，也是与他们的主观努力分不开的。青年毛泽东在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十分注意把理论的探索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他所具有的这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根本思想特征，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他青年时期世界观的转变，而且对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带来重要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期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注重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调查研究，强调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中国。如前所述，毛泽东在求学时期曾以极大的精力和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页。

满腔的热情阅读了古今中外的大量书籍。他读书的目的十分明确，非常重视对“近世”的了解。他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了时时留心社会生活和经常读报的习惯，注意从报纸上了解国内外的形势。为了探求救亡图存的真理，他主张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而且要读无字之书，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因此，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十分注重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在毛泽东同志看来，要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最急迫的首要问题是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而他自己却深感对中国社会的情况了解不够。他深刻地认识到，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那就脱不开中国这块地盘，而对这块地盘的了解，又不可不加以实地调查和研究。显然，毛泽东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注重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实际的这一思想特点，是促使他从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要动因。

第二，勤奋好学，独立思考，善于从所学的各种知识中吸取有益的思想。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十分勤奋好学，从历史、地理、文学到政治学、伦理学和哲学，他都有浓厚的兴趣。他学习非常认真，读书时经常写笔记，作眉批；他读到一些好文章时，经常将其中的一些最精辟的地方整段地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或日记本里；他甚至在读到不易找到的好书时竟一字不漏地整本地抄下来；对于一些重要课程的听课笔记还要进行认真的整理。他从小就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对所学的知识总要经过自己反复思考，问个究竟。后来，在杨昌济老师倡导的“贯通今古，融合中西”治学方法的熏陶下，使他对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逐步培育了批判吸收的精神。他在新文化运动中不主张全盘否定中国的封建文化，而是主张“弃其糟粕，取其精华”。顾炎武倡导的求实精神，颜习斋强调的学以致用、全在实行的思想，王船山提出的“自践其身心”和改造环境的主张，等等，不仅为青年毛泽东所推崇，而且对于尔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直接影

响。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所注重的是领会和把握其中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停留在字句的表面和枝节问题上。正如他后来所说：他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时，对他启发很大，“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①毛泽东的这种勤奋好学、深入钻研和探求真理的精神，是实现其世界观转变的重要条件。

第三，善于把学习和实践同自己的思想改造自觉地结合起来，不断提高觉悟水平。毛泽东并非天生的“圣哲”，他在青少年时期曾经接受过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想的影响，他的世界观转变正是在不断同旧思想斗争的过程实现的。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确立了改造社会的远大志向和抱负。在他看来，社会的改造须以人（包括自己在内）的改造为前提，而人的改造既包括个人远大的理想、高尚的情操、顽强的意志和健康的体魄的锻炼和培养，也包括思想认识和觉悟的提高。青年毛泽东十分注意自身的思想改造。他经常与老师和同学交流思想，并把自己的日记在同学中传阅，以求得大家的帮助。他还善于在和老师、同学的通信中吸取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他对各种学说，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从不盲从，总要彻底研究清楚。青年毛泽东还善于从斗争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一师毕业后，他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曾想在岳麓山下找一块地方搞“新村试验”，试图用办教育的方法来改造社会；后来，他受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又主张用“呼声革命”、“忠告运动”的办法劝说统治者“回心向善”。然而，他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特别是通过对切身斗争经验的总结，使他认识到靠

---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2页。

教育的方法来改造社会是行不通的，因为办“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而这些却“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因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①这样，他通过长期的艰苦的学习和斗争实践，终于清除了自己头脑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认清了只有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

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期所具有的勇于探求真理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特色，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他的世界观的转变，而且对以后的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在党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密切结合的历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围绕着中国革命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马克思主义要不要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曾经进行过长期的、尖锐激烈的斗争。正是在这一斗争过程中，才逐步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一经形成便对中国革命发生巨大影响，其自身也在斗争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页。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以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来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以及由此决定的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革命能否胜利的根本的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和解决这一课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历史进程实际上已经开始。建党初期，我们党就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下，不但在实践上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进行北伐战争，而且在思想理论上也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际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建党初期的几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这一时期的著述中，对于诸如中国革命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民主革命中的统一战线，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以及中国民主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等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都有过许多正确的论述。其中，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中，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问题，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任务问题，以及农民问题在整个中国革命的地位和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等问题的分析，更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我们党在诞生之后的一个时期里，毕竟还处在幼年时期。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党在当时，不论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理解上，还是在

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上，都还十分幼稚。这自然是和我们党在建党以前就缺乏一个较长时期的思想理论方面的准备，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思想理论体系知之不多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三次论战的结果，只是从基本的政治原则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是否合乎中国国情，即中国革命要不要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至于中国国情究竟是什么，在中国革命中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尚未作出科学的回答。建党以后，我们党又立即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之中，把全部精力倾注在中国革命最紧迫的斗争实践问题上，而对于中国的国情即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也尚未进行过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因而也就不可能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以及由此决定的中国革命具体道路，产生一个明晰的认识，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相结合这一历史课题。这是我们党处在幼年时期的一个难以避免的缺陷，而这个缺陷正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原因时指出，“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分，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中，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而使革命遭到失败。”① 历史表明，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党的所有的卓越领导人，在当时都还没有，也不可能自觉地提出和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更没有自觉地向全党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任务。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只能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地形成和解决。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3页。

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时，又出现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使革命力量又遭到严重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解决中国武装革命的具体道路问题，成了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毛泽东同志在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如果不答复这个问题，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当时，我们党的许多同志都在思考和探索这个问题，并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而毛泽东同志则是最先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找到正确道路的光荣代表。在我国革命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同志不但在实践上成功地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我国的民主革命树立了光辉的典范，而且还从思想理论上逐步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城市的中国式武装革命的具体道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所写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三篇文章，则是他提出的解决中国武装革命具体道路问题的理论说明和总结。毛泽东同志在这三篇文章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具体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和国内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深刻地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发展不平衡的历史特点，从而科学地阐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他指出，近代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列强共同争夺的国家，在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上极不平衡，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势力主要集中在城市，其内部相互间勾心斗角、矛盾重重，而广大农村则是其统治的最薄弱环节。这样，中国的革命就有可能首先在反动统治力量最薄弱的农村，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武装斗争，实行武装割据，从而不断积蓄力量和扩大革命影响，最后夺取全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一理论，有力地促进了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全党对中国社会历史状况和中国革命特点的认识。当时，党中央根据井冈山斗争

的经验就及时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①毛泽东同志这一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进程中，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毛泽东同志撰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反对本本主义》（原名《关于调查工作》）两篇文章，是对大革命失败前后我国革命历史经验初步的哲学概括和总结。他指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之所以遭到失败，其深刻的认识论根源正在于我们党的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形式主义的态度"，用神秘主义的观念看待马克思主义，而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却一无了解，这就必然"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也就必然会给中国的革命带来严重危害。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②中国的革命需要借鉴别国的经验，需要有别国的帮助，但是从根本上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③要靠我们自己在斗争实践中开创新的局面。他还指出，为了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了避免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就必须认真开展调查研究，使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可以看出，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已经作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步概括和总结，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已经

---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页。

②③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7页。

明确地和自觉地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自力更生这样一些特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思想已具雏形，因此，我们可以说，毛泽东同志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已经初步地形成。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形成和成熟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虽然提出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毛泽东同志在当时还不可能对这条路线作出全面的和严格的哲学论证，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也未被全党所接受。

三十年代初，我们党继瞿秋白"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之后，又连续出现过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与此同时，党内也存在过某些经验主义的倾向。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教条主义是当时的主要危险。教条主义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手持第三国际的"尚方宝剑"，以"左"的面目出现，因此，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在三次"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中，王明的教条主义从1931—1934年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而对我国革命事业的危害也最重，使党的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遭到极大损失，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为了挽救革命，必须首先结束机会主义者对全党的统治，并对其机会主义在政治、军事和思想方面逐步地进行清算。1935年1月在长征路上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机会主义对全党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从而使革命转危为安。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同志于1935年12月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从政治路线上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1936年12月，他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从军事路线上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

想。机会主义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错误倾向，是以其错误的思想路线为基础的。为了从思想理论上进一步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党危害严重的教条主义的错误，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毛泽东同志于1937年7、8月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两篇著名的哲学论文。

“两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宝库中的极其重要的著作，它的产生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两论”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思想路线，作了全面的和深刻的哲学论证。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认识和实践相互关系的原理以及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理运用于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关系，明确指出，中国革命要获得胜利，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下，花大气力去深入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观察和分析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的矛盾的特殊性，从中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办法，而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结论。

第二，“两论”对党内出现过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进行了系统的哲学上的分析和批判。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党内出现的以教条主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主观主义，同哲学史上的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一样，其共通的思想特征是割裂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绝对化、凝固化和公式化，把千差万别的事物看成毫无区别的绝对同一的东西，用一种固定不变的公式去解决矛盾和处理问题，这就必然会给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带来严重危害。

第三，“两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许多重要概念和原理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和发挥，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两论”的产生十分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十六年艰难曲折的斗争历程之后，它已不再是建党初期那样幼稚的党，而是一个在政治上和思想理论上都比较成熟的党了，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都有完整和深入了解的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其集体奋斗中，不但对建党以来丰富的历史经验作出了系统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在同主观主义、特别是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确立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而且在这些概括和总结中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赋予它以鲜明的中国民族的形式和特色。也就是说，“两论”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程中已经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党战胜各种困难、完成革命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强大威力，不但在于它开始形成或提出的时候，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它被全党所接受、并运用于指导革命斗争实践的时候。正如周恩来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毛主席使普遍的真理具体化，实现在中国土壤上的时候，并不是说，定出办法来就算了，不管大家懂不懂，接受不接受，说做就由几个人孤立地去做”，而是“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使这个真理为大家接受，变成了力量。”① 自从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来，我国的革命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抗日战争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同样，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也使我们全党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然而，还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6—337页。

应看到，在我们党内，思想作风不纯的情况还严重地存在着，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现的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思想影响不但远未彻底清算，而且还继续阻碍着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统一和巩固，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的进一步贯彻，也阻碍着我国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为了彻底清算各种错误倾向的思想影响，实现全党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统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至1943年领导全党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是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和宣传运动。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有关决定和毛泽东同志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著述，是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历史文献。整风运动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整风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为中心内容，从哲学高度上对党内"左"右倾错误倾向的表现、它产生的阶级基础和认识论根源，作了进一步的清算和批判，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全党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毛泽东同志指出，党内错误倾向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有其产生的深远的社会基础或历史根源，它是我国社会上大量存在着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政治上的表现或反映。他说："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①毛泽东同志痛感有在全党范围内反对主观主义的必要。他说："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0页。

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①同时，他又指出，为了纠正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必须使这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使只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使有工作经验的人向理论方面发展，以便使理论与实践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第二，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有关整风运动的文献和论著中，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许多主要内容作了更加明确的和深入的论述。比如，毛泽东同志把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用“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式的表述方式概括了出来，并进一步深刻地论述了调查研究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指出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②毛泽东同志还进一步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的观点，并把这一观点应用于实际工作，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等等。

第三，整风运动为解决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创造了新的形式和提供了新的经验。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经常地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这是正常的现象。党内的矛盾和斗争虽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的或阶级的根源，但是，一般说来，这种矛盾和斗争还是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党内的矛盾和斗争，不一定都同党的路线相联系，不一定都发展成为党内的路线斗争；而这种矛盾和斗争即使同党的路线相联系，甚至发展为路线斗争，一般说来，也还是党内同志间的非对抗性的矛盾。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③延安的整风运动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哲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全党的自我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8页。

② 同上，第76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6页。

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它本质上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克服或消除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的运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方针和行之有效的方法，从而使党的思想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总之，延安整风运动是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一次伟大教育运动，它不仅为解决党内矛盾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形式或范例，而且也为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创造了新鲜的经验。

我们党经过整风运动，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业已在全党牢固地确立，他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已形成为全党的统一作风。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期，我们党又在高级干部中开展了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并于1945年 4 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历史上各次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作了正式的结论。尔后，党的七大的党章明确地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这一切都深刻地表明，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毛泽东哲学思想已被全党所接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大的变化。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和展开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一经形成，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就必然要被广泛地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各个领域，指导各个斗争领域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解决；同时，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在应用过程中受到检验，从而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突出地运用于或体现在军事斗争领域，反映在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中。毛泽东同志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既是卓越的军事著作，在一定意义上说又是卓越的哲学著作，是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范例。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法则分析中国革命实际，科学地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提出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的理论，从而解决了中国武装革命的具体道路问题；他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运用于对战争问题的全面观察和分析，系统地阐明了从建军到作战的一系列对立统一关系，其中特别是深刻地揭示了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自觉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并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原则；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运用于对战争的指导，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和理论。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我们党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论运用于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武装斗争的胜利发展，而且在斗争实践中还形成了极为丰富的和独具特色的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理论，为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中增添了最辉煌的内容。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广泛地运用于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等领域，科学地分析和解决了这些领域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同中国社会的具体历史特点结合起来，通过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世界革命时代特点的分析，进一步系统地阐明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领导力量、动力、前途和步骤，为我党正确制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运用于制定对敌斗争的策略，提出了战略

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集中主要力量打击主要敌人，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等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他把辩证法关于同一性和斗争性相互关系的原理运用于统一战线内部，提出了独立自主、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他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原理运用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提出了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批判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文艺要深入生活、为工农服务等许多重要的思想和指导方针，等等。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并形成指导实际工作的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这既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项伟大贡献，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成果。群众路线作为我们党的基本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它经历了一个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毛泽东同志于1943年6月为党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则是群众路线具备成熟的理论形态的重要标志。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斗争实际，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化为实际工作中的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鲜明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灿烂的哲学之花，必然结出丰硕的物质之果。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我国革命各项具体斗争实践中的广泛应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各项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从而显示了它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伟大历史作用和强大的生命力；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在同我国各项革命斗争实践紧密结合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第四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过程仍在继续。建国以来，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也走过了一段曲折发展的道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十分丰富。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邓小平同志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三十多年来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深入地探索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道路，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坚持和发展。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继续和发展

从新中国诞生到1956年，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国经过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以后，又胜利地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短短的几年中，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消灭了几千年来的私有制，引导几亿人口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使我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三大改造的胜利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胜利，是我们党和毛泽

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具体实际的结果。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去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诸多复杂问题。例如，对我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问题所作的科学分析和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一项伟大的创举。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论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崭新课题。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不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不可能明确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及时的和认真的探索与研究，从而大大地推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党的八大文献和毛泽东同志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正是这一时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的成果的理论表现。

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初一些年代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途径。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同其他任何社会一样，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然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相比，却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第二，提出了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完整学说，并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同志把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复杂矛盾科学地区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

部矛盾，并对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方法等问题，作了全面的和系统的论述。他提出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结论。党的八大和毛泽东同志还依据我国在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基本矛盾发生变化的情况，指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现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的重要思想。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思想。

第三，把毛泽东哲学思想运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开始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某些重要的思想和指导方针。比如，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按照农、轻、重序列安排国家建设的重要思想，以及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劳动者个人三者利益的指导方针；刘少奇同志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同志提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的观点；陈云同志提出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的观点；邓小平同志提出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的观点；朱德同志提出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子恢同志提出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等等。

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我国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基本完成之后不久就及时提出的这些重要的理论和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继续和发展。这些理论和思想的提出，对于批判当时国内外流行的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把社会主义凝固化的形而上学错误观点，对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深远

的意义。

当然，也应该指出，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刚刚开始，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尚未充分暴露出来，我们既缺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和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更缺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经验。因此，当时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思想，也就不可能十分完备和具体。

从1957年到1976年这二十年时间里，毛泽东哲学思想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新事物，因而在工作中难免发生失误；更由于毛泽东同志在胜利面前逐渐地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在一些问题上背离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从而在工作指导上犯了严重错误，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严重危害。另一方面，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对唯物论辩证法的某些基本原理又有所阐发，这又丰富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内容。

对于1958年及以后一个时期内出现的在经济建设的指导上所犯的错误，当时毛泽东同志曾多次发表讲话并写了文章，从认识论的高度作了概括和总结。如1959年3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6月的《十年总结》讲话，1961年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1963年5月写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著名文章，等等。在这些讲话和文章中，毛泽东同志重申了唯物辩证法的一些基本原理，提出了许多深刻的哲学思想。

第一，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向全党明确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的历史任务。他指出，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只有经过长期斗争实践才能逐步解决。我们党对民主革命规律的认识经过了二十四年的斗争实践，到了七大才使全党完全统一起

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个崭新而伟大的事业，我们还缺乏经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对我们说来在许多方面还是一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因而在工作中就难免出现很大的盲目性。为了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够顺利发展，根本的问题是要继续保持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就是说，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

第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形成的重要思想，在全党范围内重新提出了调查研究问题。他指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要经过反复的实践，才能从不认识或不完全认识逐步发展为完全的或比较完全的认识。因此，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就难免犯错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五十年代中期工作指导失误的历史经验，指出我们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要决心大，三要方法对。为了达到情况明，他提倡要在全党范围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此，党中央于1961年3月还专门发出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重申必须把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作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等思想，作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准则。为了实现正确的工作指导，毛泽东同志还深刻地论述了坚持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重要意义。

第三，为了总结经验，少犯错误，做好工作，毛泽东同志还多次强调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应进行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教育，并发出了哲学解放的伟大号召。他认为，人民群众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精神条件，因此，他多次号召要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毛泽东同志提出和倡导的关于加强唯物论认识论的教育和哲

学解放的思想，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可惜的是，上述这些正确思想在实践中未能认真贯彻，“左”倾错误非但未能彻底纠正，反而有所发展，并且愈演愈烈，以至造成了十年的“文革”内乱和危机，使党的工作重点长期未能真正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十分沉痛的教训。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曲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思想的严重影响。历史表明，只有从思想理论上彻底清算和批判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毛泽东哲学思想才能得到坚持和发展。

二、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里，我们党和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入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实现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过程中，以及在探索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历史文献，其中特别是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十二大有关文献，以及《邓小平文选》和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等等，正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记录。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运用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批判和清算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形而上学观点，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党内曾经出现过“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两个凡是”是林彪、“四人帮”大力鼓吹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是以往“左”的错误思想路线的继续，是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和我国历史性转变的主要的和直接的思想障碍，因此，它一出现就理所当然地受到党和人民的有力批判。在这场斗争中，邓小平同志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地阐明了实事求是在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实事求是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①；他对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工作指导上的失误作了哲学上的总结，指出我党之所以犯错误归根到底是因为离开了实事求是这一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夸大了人的能动作用；他深刻地批判了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指出其思想理论上的错误在于从根本上颠倒了认识与实践、杰出个人与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神化了无产阶级领袖；他尖锐地揭露了宣扬“两个凡是”的政治目的“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②，提出把能否坚持实事求是作为识别真假“高举”的根本标准；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解放；他全面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个人崇拜的主客观根源，为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指明了方向，等等。邓小平同志对“两个凡是”所作的深刻揭露和批判，以及他领导和支持的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广泛讨论，是我们党的历

---

① 《邓小平文选》，第54页。

② 同上，第262页。

史上又一次更加普遍和更加深入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在毛泽东哲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极大地提高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帮助人们从长期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重新恢复和确立了被中断多年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二，概括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阐明了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前的一个很长时期里，由于种种原因，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概念、主要内容以及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论述等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解决。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时期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根源。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我们党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首先必须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身有一个科学的概括和明确的阐发。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邓小平文选》等文献中提出和阐发的关于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理论体系的论点，关于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和毛泽东同志是这一集体智慧杰出代表的论点，以及关于毛泽东思想经历一个形成和发展过程的论点，等等，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概念，对于克服理论界长期流行的那种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仅仅是毛泽东同志个人思想的片面观点，有着重要的意义。《决议》概括和阐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和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我们党的全部工作的生动体现，这就从根本上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

的精神实质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决议》和《文选》所阐发的关于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论点，以及关于对待毛泽东思想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即既要反对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又要反对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的论点，都从哲学高度为我们指明了对待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论述的正确态度和方法。

第三，把毛泽东哲学思想运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初步地探索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实践的哲学。理论同实践的紧密结合，既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特点，也是它的根本要求。毛泽东哲学思想对我国革命斗争实践的伟大指导作用，主要是通过运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制定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实现的。当前，我们党和国家的最大实践任务是搞好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也正在于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正确提出和科学论证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关于实现经济上的现代化、政治上的高度民主和思想文化上的高度文明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关于把经济建设确立为各项战略任务的核心，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等项方针政策，关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建立有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保障的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关于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于全面地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经济体制，以及党和国家其他各方面的制度，关于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把党建设成为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核心，以及关于改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等，都是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下提出和制定的，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

广泛运用和体现。这些重大指导方针和战略决策的明确提出和逐步实行，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发展，而且也使毛泽东哲学思想更加丰富，更加具体。

第四，提出了许多新的论点和思想，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鲜内容。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哲学思想进一步得到了丰富和发展。过去被歪曲或否定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正确原理和结论，重新得到肯定和阐发；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体系本身也加进了许多新的内容。我们党明确提出的关于私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被消灭，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不再是整个社会主要矛盾的论点，关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必要条件的论点，关于对精神文明科学概念和两个文明辩证关系所作的阐发，以及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同时并举的战略思想，等等，所有这些重要的论点和思想，都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内容，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和提高。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哲学思想得到了多方面的丰富和发展，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期。可以预料，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必将展现出新的面貌，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也必将有力地促进党的十二大所提出的宏伟的战略任务和战略目标的早日实现。

第三章　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必须进行调查研究，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按客观规律办事。

第一节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是贯串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中的活的灵魂。

一、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

实事求是，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总结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所得出的哲学结论，它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唯物论思想的集中概括。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

义。”①

实事求是原本是反映学风问题的一句中国古语。毛泽东同志吸取它朴素的合理的内含，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新的解释，赋予它新的含义，用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②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就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须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探索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它体现了彻底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同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唯物主义的解决是一致的。恩格斯曾经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包括思维和存在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以及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世界本原问题上对哲学基本问题作了科学的解决，建立了彻底唯物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哲学要求对具体事物的了解，必须按照事物本来的面目作如实的反映，必须从研究事物本身得出结论，而不是相反。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实事求是，正是坚持了这一唯物主义原则。他指出：承认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是以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客观存在为前提的。客观存在的事物及其运动发展的规律性，是人们认识的对象和出发点，人的认识是对这种客观存在的反映。实事求是不仅肯定了客观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且肯定了客观事物

① 《邓小平文选》，第133、10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

及其规律是可以认识的。毛泽东同志从思维和存在同一性原理出发指出：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单承认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是不够的，还必须承认意识对于物质的可知性。他认为思维能够反映客观事物的性质和运动，并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转化成客观事物。所以人们能够从客观事物内部引出其固有的规律性作为行动的向导，指导人们改造客观世界。

总之，实事求是，是把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无产阶级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际工作联系起来说明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实事求是里，客观存在不是一般的物质，而是国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是工作的对象，工作的条件，群众的实践、需要等等；思维也不是一般的意识，而是对客观事物内部规律的认识，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计划、方案、办法等等。这样，实事求是就不是一般的哲学命题。它是总结我们党几十年的斗争经验，把人们在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加以概括，揭示了哲学原理同人们日常工作的内在联系，既加深了人们对问题的本质的认识，同时又使一般哲学原理成为人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思想武器。所以，实事求是体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鲜明特色。

实事求是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它是中国共产党正确思想路线的核心。党的思想路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它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按照客观事物本来的面目及其内在规律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邓小平同志把党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党的思想路线的这几个基本点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既各有侧重，又密切联系，互相补充，互相贯通。其中一切从实际出发是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的前提。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才能做到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如果不从实际出发，而

从主观愿望出发，或从本本出发，实事求是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我们工作中的各种错误，究其原因，都是由于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提出任务和决定工作方针造成的。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从实际出发，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性，需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就可能成为从片面的、孤立的、表面的现象出发，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但是，如果理论不联系实际，不把理论当作行动的指南，而当作可以不问时间、地点、条件随意搬用的教条，那也就谈不上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事求是的根本保证。人们探求客观事物内部的规律性，由于受到历史条件和认识能力的限制，所获得的认识难免有局限性，而且常常会发生错误。这种错误和局限性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发现，并在不断的实践中加以纠正和克服。所以，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通过实践的检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必然陷入主观主义。由于实事求是集中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要求，概括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精神，思想路线的几个基本点都可以在实事求是中得到体现，所以说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有时我们又把党的思想路线简称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说明，凡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国革命和建设就胜利就发展；凡是背离这条思想路线，革命和建设就遭受挫折。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邓小平同志指出："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①

---

① 《邓小平文选》，第133页。

二、贯串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各个方面的根本点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实事求是贯串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各方面内容之中，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统一。

实事求是反映和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认识论的主要内容、基本特点和要求。毛泽东同志着重阐发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它指出，人的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从物质到精神和从精神到物质的辩证发展过程，人们将实践中获得的，并为实践所检验的对于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转过来为实践服务，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人们要想获得正确的认识，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预期目的，就必须发扬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反对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的主观主义，坚持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际、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毛泽东同志所阐述的能动反映论的整个内容都贯串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坚持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坚持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离开实事求是，在认识论上就会导致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主观唯心论或者机械反映论的错误倾向。

实事求是贯串在毛泽东同志辩证法思想中，是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他指出，辩证法就是要按照客观事物矛盾本身的具体性质和情况，去具体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能带上任何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要正确地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一是必须分析客观事物所处的具体条件，二是必须分析事物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一切都是以时间、地

点、条件为转移的，不同条件下的事物有着不同的特点，而每一事物又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不懂得事物矛盾的共性，就不知道事物的普遍的本质，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不了解事物矛盾的个性就不知道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和它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只有从实际出发，分析具体事物所处的条件及其特点，才能把共性和个性统一起来，弄清楚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才能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分析态度，所以弄得一无是处。“我们必须以教条主义的失败为鉴戒，学会这种研究态度，舍此没有第二种研究法。”①这说明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就不可能对事物的矛盾作出正确的分析，也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

实事求是也是坚持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同志指出，坚持群众路线，就是要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形成正确的意见，实行正确的领导，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脱离实际，也就没有党的群众路线。

实事求是的思想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坚持这一思想，在民主革命时期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4页。

的理论，创立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强调实事求是是正确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总的方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进行现代化建设，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了和平统一祖国，进行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我国政府和英国政府通过谈判解决了香港问题，为全世界树立了解决国家之间历史遗留问题的榜样。这一切都贯串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实事求是，就不可能有对现实问题的正确处理。

总之，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它渗透和体现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各个方面，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内容的统一性。

第二节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的基本内容。从实际出发，就是从运动变化着的客观情况出发，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达到主客观统一的基础；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有的放矢，它是实现理论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检验和发展理论的重要途径。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来说，就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指导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的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要求：“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

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① 列宁也指出：“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正在于：它的**出发点**是科学的客观性，是承认科学所反映的客观实在；而唯心主义则**需要**‘弯路’，以便这样或那样地从精神、意识中，从‘心理的东西’中‘引出’客观性。”② 从原则出发，还是从客观事物出发，这是哲学中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这两条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的斗争，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表现为实事求是同主观主义的斗争。主观主义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教条主义者不是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而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从主观想象出发，去指导中国革命，其结果必然会把本来可以办得好的事情弄得很糟。

毛泽东同志在从事和领导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历来反对主观主义的工作指导，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什么是“实际”，他曾经作过科学的界说和规定。他说：“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③ 就是说，“实际”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具体地说来，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实际”，通常包括两种含义：一种是指客观存在着的事物，真实的情况。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又说，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就“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④；另一种是指人的实践活动，特别是指群众的实践活动。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领导工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9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30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5、757页。

作要从群众斗争的实际出发。他说：“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马克思主义是按情况办事的，情况就包括客观效果。……正确的领导按情况办事，符合实际，群众欢迎；不正确的领导，不按情况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① 总起来说，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实际”，就是研究主体以外的一切客观的事物、现象。

应该指出，毛泽东同志所科学解释和使用的“实际”这一概念，同列宁所科学规定的“物质”概念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又有所区别。列宁的“物质”概念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毛泽东同志所使用的“实际”概念，则是“物质”概念在工作中的运用。列宁是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上，从世界本原的角度，来规定“物质”的客观实在性的；而毛泽东同志则着重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矛盾中，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上，来规定“实际”的客观性。列宁的物质概念，是指独立于意识之外，不依赖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实际”概念，既包括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也包括研究主体之外的意识现象（比如，对领导者说来，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觉悟和情绪等等，这些意识现象都是领导者的工作“实际”）；既包括这些现象的客观存在，也包括这些现象的变化发展。

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被认识和被改造的客观事物、客观情况出发，以便从中引出固有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② 从实际出发，对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来说，就是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毛泽东同志指出：“认清中国的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8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0页。

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旧中国是一个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都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我们党领导我国民主革命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都是根据这一具体国情确定的。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我们党的战略和策略思想的产生同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关系问题时曾经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我党当前的重要任务。”②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邓小平同志对于我国的国情又多次作了具体分析，围绕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的战略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战略决策，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全部工作的立脚点都建立在客观实际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对客观情况的科学估量，才能提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来，才能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否则，离开了客观实际的工作指导，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滑到唯心论、形而上学方面去，就必然会使革命事业遭受挫折或失败。

从实际出发，并不是从孤立和片面的情况出发，而是从全面的情况和事物的总体出发。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是由多方面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0页。

的因素构成的，而每一事物又总是同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着的，因此，看问题不能从单方面去看，必须从多方面去看。列宁指出：我们“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①毛泽东同志也反复指出，为了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必须坚持全面性，反对片面性。对于革命的领导者来说，就应当从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从每一矛盾的各方面，去研究矛盾，把握矛盾的具体情况和特点，而不能只见局部不见全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在大革命时期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性质和情况所作的分析，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中日战争的性质和中日矛盾双方各自的特点所作的分析，等等，为我们树立了从全面的实际出发分析问题的光辉典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也是从中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各方面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战略措施，制定了一整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在新的形势下，树立了从全面的实际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光辉典范。

一切事物、现象和人民群众的实践都是变化发展的，因此，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变动着的实际出发。毛泽东同志指出，客观世界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在不同历史时期或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发展阶段，都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无产阶级政党作为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应当从既定的客观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指导革命，而且还应当善于洞察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并根据这一变化及时地修订和调整党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同志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必须善于在“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①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总是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适时地提出相应的方针政策，从而有力地促进了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了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的最大实际。我们党根据这一新的变化了的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和政策，从而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二、有的放矢

人类要实现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有效地改造世界的目的，需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斯大林说得好，不以实践为基础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同样，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则是盲目的实践。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要取得胜利，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而要真正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指导，就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②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述，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事业的关系，为我们指明了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态度。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7页。

坚持有的放矢，理论联系实际，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是实现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保证。一方面，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才能正确地对待和分析实际，才能从纷繁复杂的客观事物中揭示和把握其固有的规律性，才能避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也只有坚持有的放矢，理论联系实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探索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才能充分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实现改造世界的目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根箭，一定要对准中国革命这个靶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它的伟大生命力，就在于它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当“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① 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把马克思主义这根箭拿来乱放一通，这种无的放矢的作法非但不能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革命实践的伟大指导作用，而且必然会把革命事业引向失败。

毛泽东同志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经验。对于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我们党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理论联系实际、实现马克思主义与本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首要前提。对于那些缺少马克思主义训练和素养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显得更加重要和突出。然而，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只背诵马克思主义书本里的某些词句或现成结论，而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掌握它的基本立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5页。

场、观点和方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①离开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掌握，或者生搬硬套马列的某些词句和现成结论，必然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中国的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对于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对于坚持我国的社会主义方向，对于保证我国四化建设的胜利实现，是绝对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个别观点和结论，将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过时，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说由这些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却是普遍的真理，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是我们必须永远坚持的。那种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企图用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观点来“补充”、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倾向是错误的，必须加以批判。

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到中国的土壤上，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②精通和应用，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的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或两个阶段。精通是应用的前提，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知半解，是根本谈不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的；应用是精通的目的，如果只把马克思主义拿在手里而不去运用，那就失去了马克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3页。

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革命意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周恩来同志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曾经指出：“把普遍真理具体化，运用到中国的土壤上”，①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特点。他认为，毛泽东同志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但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坚持方向，二是实现方向。这里所说的坚持方向，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或原则；实现方向，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或原则加以具体化，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应该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实现这一结合较之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要复杂得多，艰巨得多。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就必须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的具体国情作深入的和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逐步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具体化为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化为指导实际工作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群众和武装群众，使之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尖锐武器。总起来说，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们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紧密地具体地结合起来。

要善于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得出新结论，在斗争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实践中产生，并随斗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而不能停滞不前；如果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力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6页。

了。只有在斗争实践中不断用新经验和新结论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代替那些过时的旧经验和旧结论，才能保证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也特别强调只有认真研究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得出新结论，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叫做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那种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凝固化的错误，也是必须加以批判的。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要求理论和理论工作者必须为现实服务。毛泽东同志一直强调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必须研究现状。邓小平同志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我这里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②我国当前的现实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最大的、最重要的实际，我们必须从这一实际出发，深入研究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既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也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应当肩负的历史责任。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165页。

第三节 发挥自觉能动性，按客观规律办事

自觉能动性原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提出了自觉能动性的概念，论述了自觉能动性和客观条件的关系，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努力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从而建立了系统的自觉能动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主观能动性的学说。

一、自觉能动性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

毛泽东同志在指导中国革命，特别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发挥人的能动性问题。这是由中国革命所处的特殊的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中国革命长期处在敌强我弱、矛盾极其尖锐复杂和缺少外援的斗争环境中。在这种情况下，要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特别是在战争中，为了要战胜强大的敌人，要求全体指战员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努力作战，才能夺取胜利。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证明，在反"围剿"的战争中，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挥，粉碎了敌人的几次"围剿"，但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实行军事拚命主义，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长征到达延安以后，毛泽东同志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从理论上全面清算了"左"倾错误，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形成了自觉能动性的思想；到抗日战争

时期，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总结抗日游击战的经验，在《论持久战》中全面地论述了自觉能动性的问题，形成了关于自觉能动性的系统理论。

什么是自觉能动性？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事情都是要人去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①这里，毛泽东同志说明了能动性和自觉能动性的区别，所谓能动性是相对于被动性而说的，是指某物在同他物的相互作用中，不仅能够对于他物的作用做出直接的相应的反应，而且还能够主动地作用于他物，改变这一作用，独立地做出间接的复杂的反映。这种能动性是人和一般的动物都具有的。但是，人的能动性不同于这种能动性，它是一种自觉的能动性。所谓自觉能动性（通常又叫做主观能动性）是区别于动物的能动性，是人的自觉的活动和努力，是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这种能动性，一是指人的思维能力、思想。人和动物不同，他有高度发达的大脑，具有思维能力。他不是一般地作用于客观事物，而是能够从客观事物中引出思想、道理，提出计划、办法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二是指人的实践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这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最重要的标志。人的实践活动不同于动物的活动。它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人在做事情之前总是先有一定的思想、目的，在思想中对自己行动的结果作出预见，并能在实行过程中随时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调整自己的计划和行动；三是指人的意志和干劲。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努力"。这种努力是人们活动的一种精神状态。它贯串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

在人的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之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有接触客观事物和努力实践才能获得认识；在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同志提出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拚命精神，去争取战争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同志提倡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这些都是讲的人的意志和干劲，这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重要内容。发挥自觉能动性的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发挥人的干劲，积极性和主动性。

毛泽东同志关于自觉能动性的概念说明了人的能动性同动物能动性的根本区别，指出自觉能动性是人类特有的属性，每一个正常的人都有自觉能动性。但是，这不是说任何人的自觉能动性在一切方面都是相同的。事实上，在社会中，不同时代、不同阶级和不同社会集团的人们，其发挥自觉能动性的方向、性质、途径和结果是很不相同的。有的促进事物发展，有的阻碍事物发展；有的好，有的坏；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收效显著，有的收效甚微；有的彼此协调，有的互相冲突；等等。这说明人的自觉能动性不仅在作用上有大小的量的差别，而且还有正确与错误的质的不同。毛泽东同志在论述自觉能动性时，针对各种不同的自觉能动性，特别是针对战争中"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的鲁莽行动，进一步又提出了发挥正确的自觉能动性的思想。他说："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① 这说明正确的自觉能动性是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正确思想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正确的行动。

正确的自觉能动性首先是建立在主观符合客观、思想符合实际的基础上的能动性，它要求人们办一切事情要从客观实际出发，正确反映客观实际，从中引出正确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

动，才能取得成功。办一切事情，如果思想不符合客观实际，“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①，在实践中就会犯错误。1959年初，毛泽东同志在总结1958年的经验教训时指出，主观能动性有两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就是主观主义，一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是符合实际的主观能动性，凡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就要受挫折。因此，我们必须反对脱离实际的能动性，发挥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实际的能动性。

其次，正确的自觉能动性是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改造世界的能动性。毛泽东同志认为，自觉的能动性主要表现于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实践是实现正确的自觉能动性的基础，没有实践就不可能产生关于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有了正确的思想，不去实践，就不能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那只是空想。同时，只有实践才能检验自觉能动性正确性的程度，也只有实践才能不断发展人的自觉能动性。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抗日战争的时候说：“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②我们革命和建设的一切工作都如同抗日战争一样，都是要人去做才能达到目的。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不认真付诸实践，流于形式，是不能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也就谈不上正确的自觉能动。

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的自觉能动性的思想，对于在能动性问题上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对坚持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它表明自觉的能动性同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

不根据客观事实的主观妄为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能动性是根本对立的，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的建筑在假道理基础上的盲目的能动性也是根本对立的。必须批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能动性，才能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事实的正确的自觉能动性，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二、尊重客观条件，充分发扬正确的自觉能动性

人们在改造世界中怎样才能充分发扬正确的自觉能动性呢？毛泽东同志围绕着人们改造世界过程中主观和客观这一根本矛盾，论述了自觉能动性和客观条件、客观规律的关系，揭示了发挥正确的自觉能动性的辩证法。他在谈到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和客观条件的关系时，形象地把客观条件比做发挥自觉能动性的“舞台”，把自觉能动性的正确发挥比做演出“威武雄壮的戏剧”。他强调要发挥自觉能动性，首先必须尊重客观条件，尊重客观规律。

客观条件是指同人们的活动相联系的一切客观的、物质的因素。它们是人活动的基础。人们办一切事情都必须从客观条件出发，这是正确发挥自觉能动性的前提。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说：“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没有客观条件这个“舞台”，人们就无法演出“威武雄壮的戏剧”。客观条件这个“舞台”包括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整个物质世界是人类活动的无限广阔的舞台。我们国家的自然的、经济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以及国际形势的等等因素是我们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客观条件，是我们活动的大舞台，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每一个地区、部门、单位的一切客观的因素又构成了一个一个的小舞台。这些大小舞台是

我们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又是我们活动的基础。我们活动的全部内容、方式和手段以及活动目的的实现的程度都是同客观条件相联系的，受到它的制约。离开客观条件谈发挥主观能动性，只能陷入主观主义。

尊重客观条件，归根到底就是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毛泽东同志指出，规律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①，也就是客观条件的内部联系。它具有客观必然性，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管你赞成不赞成，它总要表现出来。人们只能按规律进行活动，不能违背规律。毛泽东同志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② 1959年他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指出，规律是个学校，可以教育人们，使人们逐渐聪明起来。他以价值规律为例，告诫全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客观规律，客观法则，违背它，要碰得头破血流。他说，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说明，凡是尊重客观条件，按客观规律办事，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就胜利，凡是不顾客观条件，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就失败，就受损失。违背了客观规律去发挥主观能动性，就愈会犯主观主义错误。1958年我们在大跃进中所犯的错误，就是由对经济发展规律和对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所造成的。总结这一历史的经验教训，党中央强调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量力而行，按客观规律办事。就是说必须从我国现有的条件出发来规定我们建设的速度和规模。在这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页。

一正确思想指导下，几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制约着人的自觉能动性，但是在具备客观条件的基础上正确发挥自觉能动性对于改造客观世界又有极大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自觉的能动性能够分析客观条件，认识客观规律。人们在改造世界的活动中，由于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必然会遇到各种条件。有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主要条件和次要条件，直接条件和间接条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等等，这些条件都是相互作用着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自觉能动性能够分析事物的联系，确定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从而根据需要去选择有利条件，限制或排除不利条件的影响，并指导人们按照确定的目的反复实践，反复认识，在实践基础上将感性认识经过分析综合加工成为理性认识，从而把握客观事物内部的规律性。

第二，正确的自觉能动性能够利用条件、创造条件，改造世界。条件对于人们实践和认识的制约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各种条件在不同的联系中，它们的相互作用及其结果是不相同的。人们在认识和实践中利用条件，就是发挥正确的自觉能动性去改变条件的联系，恰当地组合条件，充分发挥各种条件的作用，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最佳效果。毛泽东同志在谈到能动性在战争中的运用的时候提出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就是讲的通过这些自觉能动性去恰当地组合利用各种条件。他说：灵活性“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就能转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我对于敌的主动权”①，达到以弱军战胜强敌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2页。

目的。这说明战争中同是一样的客观条件，如若加以不同的组合利用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毛泽东同志正是充分地发挥了自觉能动性的这种作用，运用有限的条件去达到胜利的目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也必须发挥自觉能动性的这种作用，在一定的人力、物力条件下加强科学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该充分利用条件，以最少的条件去争取最好的效果。

正确的自觉能动性的作用不仅在于利用条件，而且能创造某些必要的条件。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土地改革问题时提出，积极造成条件，凡条件不成熟者，无论何时何地不要勉强去做。这里说明了尊重条件，利用条件和创造条件的辩证关系。我们办一切事情总是要从一定条件出发，没有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就不要勉强去做。但是因为条件不够，不积极创造条件，只强调“不勉强”去做，就会变成机械论，结果会一事无成；另一方面，如果创造条件不从现有条件出发，而是勉强去做那些为现有条件所不许可做的事情，就会变成主观蛮干，达不到创造条件的目的。我们干一切工作都必须发挥正确的自觉能动性，把尊重条件、分析条件、利用条件和创造条件结合起来，才能作好。

第三，正确的自觉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对客观过程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们在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只是有了实现某种客观发展过程，达到某种目的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能否变成现实性，就取决于主观的努力。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曾经指出，一个被削弱了的贫困和落后的国家，为了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在这个紧急关头决定一切的是政治因素，是工人阶级的觉悟和坚定性。他说：“如果工人阶级决心作自我牺牲，如果工人阶级表明它善于用出自己的全部力量，那就可以解决任务。……工人阶级的决心，它实现自己‘宁死不屈’口号的坚决意志，不但是历史的因素，而且是决定一切、战

胜一切的因素。”①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战争的胜负的时候也多次指出，战争中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等诸条件，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要实现战争胜利的可能性，“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②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懂得和运用了抗日战争的规律，充分发挥全国人民的自觉能动性，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样地，由于我们掌握和运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充分发挥正确的自觉能动性，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蒋介石用飞机和大炮武装起来的几百万军队，解放了全中国，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不仅战争如此，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切活动中都存在这样的情况。毛泽东同志指出，当着具备一定条件，“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③今天，我们已经具备了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定的物质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正确领导，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于客观经济规律的正确认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全国人民充分的干劲和决心，就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性因素。我们要充分发挥这种因素的作用，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发挥正确的自觉能动性，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提高认识能力。人的认识能力是发挥正确的自觉能动性的重要的主观条件。在复杂的客观条件面前，没有很强的认识能力，没有科学的思维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66—16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4—45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0页。

方法是不可能实现对客观世界的有效改造的。毛泽东同志强调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特别注意人的认识能力的改造。他说："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①改造认识能力，主要是锻炼和培养正确的思维方法，避免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要养成分析的习惯，学会客观的、全面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善于理论联系实际。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一方面需要参加革命实践活动，在改造客观世界中使自己的认识能力得到锻炼；另一方面需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加强科学技术教育，提高思维能力，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

充分发挥正确的自觉能动性，还需要有革命的精神状态。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艰巨的斗争过程，需要有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革命的干劲和革命的献身精神。毛泽东同志特别重视主观精神在改造世界中的作用，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的革命献身精神，对于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有着极其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困难的斗争环境中，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对于扭转不利局面，常常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同志以战争为例指出："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②又说："在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动作，是在正确的作战计划下绝对必要的东西"。③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又强调要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和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搞好。他说："关键在于一个很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273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1、475页。

大的干劲。拖拖沓沓，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懒汉的世界观。”① 革命者的无私无畏、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等革命精神和行为，在我国人民解放的斗争历史上，曾经谱写了壮丽的篇章。邓小平同志指出：“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拚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②

发挥正确的自觉能动性，要把领导者的自觉能动性同人民群众的自觉能动性结合起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它既是实践的主体，又是认识的主体，它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革命事业是人民的事业，只有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革命首创精神，才能克服一切困难，最终完成革命的任务。然而，人民群众的认识能力和思想觉悟的提高又需要有少数先进分子去进行宣传和教育，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需要有领导骨干加以组织和引导。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要把领导者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既反对脱离群众的少数人空忙和关门主义的倾向，又反对放弃领导的尾巴主义倾向。他指出：“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③

正确的自觉能动性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挥的程度是不相

① 转引自1975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

② 《邓小平文选》，第32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页。

同的。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特别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自觉能动性的内容和形式及其作用将发生相应的变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人们发挥自觉能动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现代化建设要求充分发挥人们的自觉能动性。每一个革命者都应该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扬正确的自觉能动性。

三、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人们发挥自觉能动性达到实事求是，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认识和改造自然和社会，改善自己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从自然和社会中获得自由。正确的自觉能动性的发挥和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从必然到自由的过程。

自由和必然的问题，在哲学史上，一直是许多哲学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恩格斯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总结了哲学史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提出："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①毛泽东同志依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发挥恩格斯的思想，进一步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1941年他在批判第三次"左"倾错误的时候指出："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4页。

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① “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懂得必然和自由的这种关系，所以，他们只能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根本不可能有指导中国革命的自由。后来，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我们党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认识时又进一步论述了自由与必然的辩证统一。他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②这说明自由是人们发挥正确的自觉能动性所达到的结果。人们的认识从必然到自由的过程，就是正确的自觉能动性日益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客观必然性和自觉能动性的矛盾。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是客观存在和起作用的，这是客观的必然性。它制约着人的自觉能动性，人的自觉能动性只有同这种客观规律性相符合，才是正确的，并且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当人们还不了解必然性，不能发挥自己的自觉能动性而受必然性支配的时候，人们总是处在被动的、不自觉的、盲目的境地，这叫做“必然王国”。当人们正确地认识了客观必然性，并按照这种必然性的要求去发挥自觉能动性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在改造客观事物的活动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达到自觉能动性和客观必然性的统一。这时，人们在客观必然性面前处在自觉的、主动的境地，这叫做“自由王国”。

毛泽东同志总结我们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认识经验时

---

① 毛泽东：《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1983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

②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版，第27页。

指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是一个反复的实践过程。他说：“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① 我们党对于民主革命的认识就经历了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的两次比较，才真正认识了民主革命的规律。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② 我们一定要下一番苦功，切切实实地调查研究，努力学习，积累经验，在实践中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它的规律，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建设好社会主义。

人们要获得自由，除了努力实践外，还要努力学习科学。毛泽东同志说：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界里得到自由。”③ 从必然到自由是人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推动发展的。我们只有努力学习，努力实践，正确发挥自觉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

毛泽东同志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④ 自由和必

---

①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版，第27页。

② 同上，第22页。

③ 毛泽东：《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40年3月15日延安《新中华报》。

④ 转引自《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64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

然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由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今天已经有了较大的自由了。但是这并没有结束真理，对于尚未认识和支配的必然性来说，人类已经取得的自由是微不足道的；客观世界是无限的，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人类要获得和保持自由，就必须充分发挥正确的自觉能动性，“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①不断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第四节 没有正确的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调查研究是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途径和根本方法。了解“实事”，需要调查；从“实事”中“求是”，需要研究。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历来十分重视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他不但亲自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为制定中国革命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奠定了基础，而且还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调查研究是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

调查研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调查研究乃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种基本的科学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人类只有通过社会实践和调查研究，才能揭示和掌握客观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性，进而才能指导人们有效地进行改造世界的活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强调，应

① 转引自《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64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

当运用调查研究这一科学的认识方法去研究和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所面临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他把调查研究提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并同群众路线结合起来，论证了调查研究是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他指出，调查研究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了解情况，掌握材料，经过分析总结，从中找出规律性，引出正确的结论，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他说："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①

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在向主观主义作斗争、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是我们党对中国的社会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开创者和杰出代表。他一生中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写了不少关于调查研究的文章、报告和材料。他明确提出要"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②他把调查研究提到肃清唯心观念、决定策略和工作方法以实现对革命的正确指导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在他看来，调查研究是反对教条主义、了解实际情况的根本方法，因而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并系统地论述了调查研究的态度和方法。特别是在同王明的教条主义作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把调查研究同坚持实事求是结合起来，提出调查研究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

① 《毛泽东农村社会调查文集》，第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0页。

根本方法。

调查研究作为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在于它是达到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桥梁。要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首先就要根据客观实际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调查研究则是无产阶级政党了解情况、制定政策的基本方法，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步骤。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①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就是向社会作调查。他指出，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作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②只有通过正确的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陈云同志指出：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实际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有的同志反过来，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要使我们的同志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离开实际情况的了解，就不可能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真正的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

要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还必须理论联系实际，而调查研究则是实现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环节。恩格斯指出：要找到革命的策略，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③毛泽东同志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特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60页、74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0页。

别强调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掌握情况，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说“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①也就不能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左”右倾机会主义之所以不能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对中国的国情不作调查研究，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拿陈独秀来说，他虽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他担任党的主要领导人期间，既没有深入工农群众对中国的现实情况进行调查，也没有对各阶级的关系进行周密的分析和研究，因此，他指导中国革命的许多理论和观点就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者王明，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更是缺乏调查研究。他从苏联回国以后，既不愿到革命根据地去，也不愿到基层去工作。他在担任党中央重要职务期间很少呆在国内，他根本不作调查研究，不了解中国的实际，因而他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就完全是主观主义的。毛泽东同志指出，主观主义是一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是同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根本不相容的。“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②纠正这种主观主义的根本方法，就是“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只有“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49页。

② 同上，第758页。

唯心精神。”①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一直运用调查研究来同主观主义作斗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为了纠正党内对农民运动的错误态度，他作了许多调查，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的思想，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对农民的领导权的思想，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问题的正确理论和政策的基础。在土地革命中，“左”倾教条主义提出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织成的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有，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毛泽东同志对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开始也并不十分明确，但是他通过大量的调查、特别是作了“寻邬调查”和“兴国调查”这两个重要的调查，纠正了“左”的错误，制定了基本上适合我国情况的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通过延安整风集中地清算了主观主义。毛泽东同志总结我们党两次大的转折的历史经验，提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②只有全体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都懂得并且认真实行通过调查研究来制定和执行政策，确定工作方法，才能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保证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忽视调查研究，党的指导工作上就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在1958年出现的浮夸风、瞎指挥等错误，原因之一就在于放松了调查研究工作。对此，毛泽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4、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60页。

东同志在六十年代初曾作自我批评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很少，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这说明调查研究不是一劳永逸的，要保持工作中的正确指导，就必须始终坚持调查研究。

鉴于上述教训，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① 只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正确政策，保证工作的胜利。

二、调查研究的正确态度和方法

要通过调查研究获得正确的认识，达到实事求是的目的，必须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如果调查方法是错误的，是不能达到目的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② 这两个口号并提，更加突出地强调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做正确的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正确的态度是搞好调查研究的首要条件。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调查研究的态度问题，并作了许多方面的论述。

调查研究要有客观的态度。调查研究，不是为了证明某种结论，而是为了从客观实际中找出其固有的规律性。因此，必须按照世界本来的面目去了解。恩格斯曾经指出："在理解现实世界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82页。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3页。

（自然界和历史）时，决意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①，“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②。又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结果，这是对于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列宁也讲观察的客观性，是存在之物本身。毛泽东同志把这些思想应用于调查研究，提出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的重要结论。③他指出，调查研究要从客观事实本身出发，在客观事实面前，要老老实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必须从客观事实中引出结论，而不是用先入为主的框框去套客观事实，证明自己某种固有的观点、理论；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调查应该发现事物的真象，不要为各种假象所蒙蔽，应该对材料作全面的综合分析，不要满足于孤立的、片面的观察。调查时，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自己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等等。这些就是调查研究的客观态度的基本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同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的本质区别。

调查研究要尊重群众，甘当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调查的内容主要是群众的实践，调查的对象主要是人民群众，因此，必须要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毛泽东同志指出，要调查研究而“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④只有和群众做朋友，虚心向群众学习，让群众了解你，“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⑤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9页。

③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页。

④ 同上，第16—17页。

⑤ 同上，第27页。

搞好调查研究，还必须要有正确的方法。毛泽东同志总结自己作调查研究的经验，论述了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

第一，“走马观花”作面上的调查。

毛泽东同志指出，作领导工作，要了解和掌握一般的情况，必须作面上的调查研究。“走马观花”，正是一种作面上粗略调查以了解一般情况的调查方法。这种方法包括领导者亲自到群众中去到处走一走、看一看的直接调查，也包括在很短的时间里研究各地送来的书面报告和统计数字的间接调查。

“走马观花”的好处在于，可以在较短时间内了解全局的轮廓，及时掌握总的情况，做到“胸中有数”。毛泽东同志说：“胸中有‘数’。就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要“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① “走马观花”式的面上调查，可以了解事物的总的梗概情况，对于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讲，随时进行面上的调查，是很必要的。

第二，“下马看花”，深入实际作典型调查。

“走马观花”式的调查，只是一种粗略的调查，尚不能达到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还必须用第二种方法，就是“下马看花”。所谓“下马看花”，就是领导者亲自深入实际作典型调查。典型调查是从许多事物中找出有代表性的一点或若干点，进行深入具体的调查，从中获得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然后加以综合，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得出一般的规律性的认识。毛泽东同志把这种“下马看花”进行调查的方法，又叫做“解剖麻雀”。他说要了解麻雀，不需要解剖每个麻雀，只解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2—1333页。

剖一两个就够了。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从总书记到支部书记，都要亲自调查一两个点，解剖一两个“麻雀”。这叫做“下马看花”，过细看花，分析“一朵花”。通过“解剖麻雀”，然后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科学研究中的抽样分析，生产中的抽样鉴定，以及领导工作中的“蹲点”、“种试验田”等方法，都是典型调查研究的不同形式，通过典型调查就可以得到可靠的材料和正确认识。

搞好典型调查，必须根据调查目的，正确选择有代表性的典型。客观事物是纷繁复杂、千差万别的。有的个别事物能够比较充分地体现事物的本质或共性，有的个别事物则不能。如果任意选取其中的一两个个别实例，便不能达到典型调查的目的。只有从全局出发，选好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才能从个别中得出一般的结论。这里，应该指出，所谓典型，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所以，为了搞好典型调查，还要注意选择好各种不同的典型。毛泽东同志说：“怎样找调查的典型？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①这就是说，只有根据事物发展不平衡的情况选择各种不同的典型，通过对各种典型的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反映事物发展的全貌并从中总结出事物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

第三，开调查会，广泛收集材料。

面上调查和典型调查都可以采用许多具体不同的方法。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开调查会可以直接同时听到群众中的各种意见，能够得到各种材料。

开好调查会要有调查纲目，要选好到会的人员，要讨论式地开会，即按照调查纲目提出问题和大家一起讨论，把问题引向深

---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7页。

入，集中大家的正确意见，作出正确的结论，那种开调查会“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①

广泛收集材料除了开调查会，还可以把调查纲目制成问卷发给被调查者，让他们自己填写各种问题，然后收集各种问卷，整理材料。除了必要的调查会和问卷调查外，还必须结合个别访问才能收到真实具体的材料。

第四，重点调查，深入研究。

无论是面上的调查、典型调查，还是开调查会，都必须抓住重点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指出，进行调查研究，不能“东张西望、道听途说”，而必须要了解事物的历史和现状的各个方面，又要把握它的本质。他说：“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就有同志要问：‘十样事物，我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有没有发言权？’我以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②这就是说，调查研究必须抓住主要矛盾。他以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为例，说明主要矛盾是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③所以，调查既要掌握事物的全貌，又要用力抓住反映事物本质的重点材料，这样，才能为作出正确的结论奠定可靠的基础。

通过调查，掌握材料，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很重要的一环。但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9页。

②③ 同上，第25、26页。

是，如果只掌握材料，不整理，不认真研究，结果就象挂了“一篇狗肉帐”，难以从材料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因此，还必须进行深入的研究。调查研究的过程,既是一个搜集材料的过程,又是一个分析和综合整理材料的过程，既是一个发现问题和分析矛盾的过程，又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说，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解决矛盾就是要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① 所谓周密系统的分析，一般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观察事物的大概轮廓，形成笼统的认识；第二步，用分析的方法把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行细致地研究；第三步，再用综合的方法，对各部分材料加以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综合，得出正确的结论。当然这种分析与综合不是截然分开的，“应该是分析而又综合，就是在第二步骤的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② 同样综合也不能离开分析，只有同时进行分析才能从事物各种联系中,找出本质的联系,这样得出的结论才是科学的结论，是事物内部的规律性，才能成为行动的向导。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6页。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4页。

调查研究的方法是同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相联系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必将产生更新的、更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现代化生产中运用的统计调查、优选法、卫星探测，等等，都是一种广泛的、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必将使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更加深入，更加正确。

第四章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同志对认识论问题也十分重视。他说过：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三者是一个东西。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它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意识和存在的关系，从而使认识论真正成为科学。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他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检验真理的标准等问题；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

第一节　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同志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①

毛泽东同志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他对实践的涵义作了明确的科学规定，对实践的形式及其相互关系，对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透辟的和系统的理论说明。

一、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做或行动

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同一切旧哲学认识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为了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了解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贡献，首先应该对实践的科学内涵作概括的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当然这并不是说以往的其他一切哲学家都没有提出过实践的概念，都没有把实践同认识联系起来。事实上，在中外哲学史上，不论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有不少人使用过实践的概念，或对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加以探讨，甚至强调实践在求知过程中有重要作用。比如，十九世纪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就曾经说过：“理论不能决定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的”，“比渊博的引证更有用到无数倍的，却是实践，却是生活。”② 对此，列宁曾加以肯定，他说：“费尔巴哈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③ 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哲学家们，都未能对实践的概念作出科学的解释，没有抓住实践的本质特征，因而都是非科学的实践观。大家知道，唯心主义者所讲的“实践”，要么把它说成是根本没有超出主观认识范围的纯粹观念的活动，要么把它说成是为了实现某种先验的理性原则或道德原则的活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页。

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554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动；而旧唯物主义者所讲的“实践”，则是指人们之间生活上的交往或抽象的个人活动，例如费尔巴哈就把实践偏狭地了解为纯粹个人的自私行为。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唯一正确的科学的实践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时，对于什么是实践虽然没有下过明确的定义，但却从许多方面揭示了实践的本质和特征。马克思指出，实践是“人的感性活动”、“客观的活动”，而这种感性活动并不仅仅是指人的感官同外部世界的接触，它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它体现了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能动的方面”。列宁也认为，实践是人们有目的的改造世界的活动，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的“交错点＝人的和人类历史的实践”。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一切旧哲学的实践观根本不同，它不是纯主观范围内的观念的活动，而是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它不是互相孤立的单个人的活动，而是相互联系的社会活动；它不是某种静止的活动，而是在历史中发展着的、并受一定的历史条件所制约的活动。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实践具有客观性、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等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把科学的实践观点引入认识论，并作为认识的基础，从而正确地解决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以及认识论的其他一系列问题，彻底驳倒了一切唯心论和不可知论，同时也克服了旧唯物论认识论的根本缺陷，使认识论真正成为科学。

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深入，实践的重要性愈益明显地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进一步的发展。列宁在1918年初曾经指出，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要变为实践，理论要由实践来鼓舞，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要实现改造中国的历史任务，就不能不重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尤其是鉴于教条主义对我国革命事业所造成的

严重危害，就更加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问题作进一步深入的探讨。毛泽东同志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过程中，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的合理思想，对实践的本质特征和科学内涵作了进一步的界说和规定，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毛泽东同志强调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更加鲜明地揭示了实践的能动性特征。在他看来，“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作为主观对客观反映的认识，表现了人类这种自觉能动性；而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则更是强烈地表现了人类的这种自觉能动性。自觉的能动性，不仅表现于通过实践能动地认识世界，更重要的乃是通过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这两个方面都是人类与其他物的根本区别。很明显，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做或行动，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一种科学的界说和规定。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更加明确地结合起来，进一步指明了实践主要是人民群众的实践。他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践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而这种社会性活动的主体则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既是实践的主体，又是认识的主体，因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讲的认识从实践中来，也就是认识从群众中来，认识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也就是认识要经过群众的检验。他说过：“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① 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① 转引自《邓小平文选》，第112页。

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正是建立在实践是人民群众的实践这一科学的实践观点基础上的。

毛泽东同志对实践概念所作的界说和规定，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着巨大的实践意义。它为我们党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批判各种错误的思潮，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二、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

实践的形式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科学体系时，对这一问题曾经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思想，但是没有作出明确的和系统的概括。毛泽东同志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实践的形式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和明确的规定，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毛泽东同志从实践领域和范围的广阔性出发，提出了实践形式多样性的思想。他指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①这就是说，在毛泽东同志看来，人类实践的领域和范围是十分广阔的，凡是社会的人们所参加的一切活动，凡是人们有目的地运用一定的物质手段作用于外部世界，并引起外部世界变化的活动，都可称之为实践活动。当然，人类实践活动的形式也就必然是多种多样的。否认实践形式的多样式，把人类的广阔丰富的实践活动仅仅归结为某种单一形式的观点，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0页。

毛泽东同志又明确指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三项基本的实践活动，其中生产活动则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他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曾说过，自古以来的人类之所以能够活下去，而且活得同野兽不同的原因，无非就是他们有两只手，并且将手接长起来——拿着工具，进行生产劳动。就是说，生产实践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的其他一切活动都是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在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但又不太发展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将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而被消灭；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科学实验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实践形式，最初是适应生产斗争的需要、从生产斗争实践中分化出来的，科学实验的课题从生产实践中提出，其手段由生产所提供，其成果由生产实践来检验。尔后，科学实验的方法又被推广到社会斗争领域里。总之，从生产实践同其他两项社会实践的关系可以看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

阶级斗争实践是阶级社会里的一种基本的实践形式。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关系表现为阶级关系，人们的生产活动是在一定的阶级关系中进行的。阶级斗争对生产斗争和其他实践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它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毛泽东同志说过，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从一定意义上说，阶级社会发展的历史也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当然，阶级斗争作为在人类社会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产生和存在的基本实践形式，它并不象生产实践那样具有同人类社会共始终的普遍意义，它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重大变化。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因此，阶

级斗争作为一种实践形式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仍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不再是主要矛盾，因此，阶级斗争实践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实践形式。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实践形式将不复存在。

科学实验是从生产实践，尔后又从阶级斗争实践中逐渐分化出来的一种实践形式。它是人们为缩短认识世界的过程，有意识地选定某种实验对象，确定某种实验的环境和条件而进行的一种对客观世界的探索性活动，也是为正确地改造世界所进行的一种准备活动。在科学实验中，人们把认识和实践自觉地结合起来，反复实践，反复认识，从而使人的自觉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和集中的体现。由于科学实验具有特定的活动范围和特殊的活动方式，所以，被列为一种新的实践形式。毛泽东同志把科学实验确定为人类的一项基本的实践形式，有着重要的和深远的意义。现在的科学实验，已经不限于自然科学，也扩展到了社会科学。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科学实验同人类社会生活的联系将愈益密切，科学实验的方法必定会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科学实验的重要性将愈益明显地表现出来。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实践的形式及其相互关系的思想，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含着相互联系的多种实践形式，而每一种实践形式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起着独特的作用，因此，都不能加以忽视。然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一切实践活动都要围绕着经济建设来进行，为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服务。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关键，而科学实验则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哲学工作者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理论

问题，为我国四化建设作出贡献。

三、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条基本的原理。毛泽东同志从认识的源泉、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认识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等方面，进一步全面地和系统地阐明和论证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原理。

首先，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毛泽东同志指出，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首先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人们通过自己的眼、耳、鼻、舌、身等各种感觉器官接触外部世界，使事物的现象反映在人的头脑中，经过人脑的周密思考，同时又反复地接触外部现象，才形成了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①对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人来说，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只能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来。离开了实践，人的认识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正确认识实践和才能的关系问题，是认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同志从认识来源于实践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曾经尖锐地批判了所谓"生而知之"的天才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天才"问题的基本观点。他指出，天才即才能问题，是属于知识

①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人民出版社版，第1页。

的范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不要说天才。所谓天才，无非是比较地聪明一点，但决无天生之才或天赋之才。天才即才能是后天获得的，是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如果不参加社会实践，即使面壁九年，呕血十石，也不会获得任何知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杰出的领袖人物来说，也可以称天才，但是，这种天才并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而是一个集体，领袖人物的智慧和才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毛泽东同志关于天才问题的科学论述，是批判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天才论唯心史观的重要思想武器。

坚持认识来源于实践的观点，需要正确认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关系。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这是就人类认识的总体而言的。但就每一个历史时代的单个人来说，由于历史发展的延续性，也由于个人所受的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也就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事事都去直接经验，这就需要大量地吸收前人的和外域的知识，即需要吸收间接经验。应当说，科学技术越发展，认识工具越进步，间接经验在人类全部知识中的比重会越提高，它的地位也越突出。例如，从本世纪的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开始，由于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和计算机技术等新科学、新技术破土而出，就使人类吸取知识的方式和效能发生了很大变化。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人们对事物的运动状态（直接信息，如观察到的事实、现象）和关于事物运动状态的陈述（间接信息，如经过加工整理的数据、资料、理论、观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信息可以被观察者所感知，更可以被析测、提取、识别、存储、传递、显示、分析、处理和应用。其中特别是信息库、信息网络的发展，不只是有助于知识的产生和传播，而且也促进知识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已经证明：电脑的制造和使用，可以代替人类的部分脑力劳动，从而为人类认识范围的扩大

和认识能力的提高显示了可喜的前景。然而，也必须指出，不论人们吸收知识的方式发生何种变化，它所吸收的间接经验总是以直接经验为基础和媒介，否则，间接经验便不能真正被吸收。从最终的来源看，一切对自己说来是间接经验的东西，对产生这些经验的人来说，仍然是直接经验。是否承认吸收间接经验的必要，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狭隘经验论的界限。

其次，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人类的认识是在实践的推动下，不断地加以深化和发展的。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向人们提出新的问题和新的要求，推动着人们去进行新的研究和探索；社会实践的发展，也不断地为人们积累愈益丰富的经验材料，从而为认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同志指出，人们的社会实践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自然界方面，还是对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人们的社会实践决不会停止在某一点上，人们的认识也就不会始终停留在某一既定的水平上。

实践作为认识发展的动力，还表现在社会实践能够不断地为人们创造和提供新的认识手段和认识工具，从而使人们的认识能力得到不断地提高。毛泽东同志说过，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镢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这些东西既是人们改造世界的工具，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工具。新的认识工具的发明和创造，是人的认识发展的结果；同时，人们使用新的认识工具，也反过来大大地促进了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在现代的科学技术条件下，要认识范围广阔而又异常复杂的外部事物，单靠人们自己的感官去接触事物，靠人的大脑思维，已远远不够了。人类已经和正在通过实践创造出许多辅助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感觉和思维的工具，这些工具反映外界的功能（包括速度、范围、准确性等）在许多方面还超过了人的器官

本身。其中，特别是前面说过的电子计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认识能力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再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已作了明确回答。马克思早在1845年就明确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①列宁也指出："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②列宁还对实践标准作了辩证分析，提出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问题。毛泽东同志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上述思想，进一步强调了实践标准的唯一性，阐明了实践检验真理的复杂性。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③，"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④。1963年11月18日，毛泽东同志在一个文件中更加明确地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实践检验真理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需要经历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社会斗争中，不能简单地根据某个阶级或某种社会势力在一个时期内的胜利与失败判断其有无真理。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在斗争实践中受到挫折或失败，这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不代表真理，而是由于在力量对比上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强大，虽然暂时失败，但以后总有一天要胜利的。这就是说，不能把"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页。

④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人民出版社版，第2页。

一标准”这句话作机械的、绝对的理解。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并不否定先进的科学理论和逻辑证明在认识中的作用。但是，科学理论和逻辑证明毕竟属于理性认识的范围，它本身并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经过逻辑证明的东西，最终还须由实践加以验证。建国以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由于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思想影响，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被弄得混乱不堪。在一些同志看来，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书本、文件和领袖的语录，不是理论应当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而是实践必须接受书本、文件和语录的裁剪。正因为如此，谁若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谁就是“丢刀子”、“砍旗”，谁就犯了弥天大罪。这些观点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背道而驰的。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不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重新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着重要的意义。

最后，实践又是认识的目的。实践之所以为认识的基础，不仅仅表现在它是人的认识产生的源泉，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认识真理的标准，而且还表现在人的一切认识还要再回到实践，以实践为归宿，为实践服务。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①“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②就是说，离开了对客观外界的改造，人的认识便失去了任何价值。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8页。

②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人民出版社版，第2—3页。

人们对世界的改造，包括改造客观世界，也包括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这里说的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就是要不断地探索新的更进步的认识方法，更好地解决思想和实际、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从而更好地使思想符合实际，使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也就是使人类在自然界和社会面前，从总体上获得更大的自由。不难看出，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是把人的自觉能动性提到极重要的位置，使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做或行动完全放在了积极的、进取的和不断变化发展的基础上。

第二节　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

列宁说过，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他以简洁明确的语言概括出了人类认识的完整过程。毛泽东同志依据列宁的思想，科学地阐明了这个完整认识过程中的两个阶段的具体内容，并把这个过程又概括为从物质到精神和从精神到物质。

毛泽东同志说，一个正确认识的形成要经过认识过程中的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从物质到精神，即由实践到认识；第二次飞跃是从精神到物质，即由认识再回到实践。这后一次飞跃比前一次飞跃意义更加伟大。

一、从感性认识能动地上升到理性认识

认识的第一次飞跃，是从感性认识能动地上升到理性认识。

感性认识与经验，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里属于同等程度的范畴，它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按照马克思主义

的观点，“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①，“为了要理解，必须从经验上开始理解、研究，从经验升到一般”②，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③，“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④否认认识起源于感觉经验，就不是唯物论者。

感性认识是人们在变革客观事物的过程中，客观事物作用于人们的感觉器官，通过感觉、知觉、表象等形式，在脑子里产生许多印象，由这些印象相组合，构成了关于事物的大概的外部联系的认识。换句话说，它是由客观事物直接作用于人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所产生，因而它具有丰富多样和直接现实性的特点。任何知识都来源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我们要认识事物，必须首先获得对事物的感性认识。感性认识虽然是对客观事物的真实的、直接的反映，但它却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只是对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部分和事物外部联系的认识，尚未达到对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和事物内部联系的认识。因此，认识不能停留在感性阶段，而必须继续向前发展。

认识运动的第二阶段是理性认识。所谓理性认识是能够反映事物全体的、本质的和内部联系的认识，它是认识的一个必经的重要阶段，也是认识的目的。毛泽东同志说：“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⑤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要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即在实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1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1页。

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4、267页。

⑤ 同上，第262—263页。

践的基础上，经过人脑对于感觉材料的加工制作工夫。人的认识经过这次飞跃，就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从认识手段上来看，感性认识是运用人的感觉器官，在同客观事物的直接接触中，通过感觉、知觉、表象等形式而产生的认识；理性认识则是人们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而产生的认识。从特点上来看，感性认识由于是从亲身的实践中获得的，因而具有直接的、现实的特点；理性认识由于是以感性认识获得的材料为基础而产生的认识，它具有间接的、抽象的、概括的特点。从结果上来看，感性认识只是对事物现象的认识，理性认识则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作为认识的不同阶段是相互区别的，但作为同一个认识过程则又是有机地联系的。两者相互制约、相互渗透，并且在认识的发展中又相互促进。

首先，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相互联系的，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又依赖于感性认识。人们认识外部事物，只有经过实践获得了丰富的感性材料，再经过人的抽象思维，才有可能转化为理性认识。然而，要实现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转化，必须是感觉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乎实际（不是错觉），否则便不能转化，或者只是一种畸形的转化。这表现了理性认识对感性认识的依赖性。同样地，感性认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它只有求助于理性的加工，才能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也就是说，需要对感性材料加以筛选、鉴别、联系和深入考察。只有通过这后一过程，才使得人的感性材料带上了条理性、顺序性，才不丧失认识的价值，这又表现了感性认识对于理性认识的依赖性。很明显，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是同一个认识过程的两个相互联结的认识阶段，两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人的认识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不断地向理性认识输送材料，而又由理性认识对感性材料进行不断加工而形成的。

其次，感性认识同理性认识在人的认识的现实过程中并不是

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渗透的。人类的实践和认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有其历史的继承性。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感性认识，总是在一定的理性认识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人的感性认识不会是在纯粹的状态下进行，其中必然会渗透着理性的认识。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或者是为了证明某种理性认识，或者是为了探索某些现象，都是有明确目的的自觉的活动，是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实践也是如此。比如我们党对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固然是经历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然而，在感性认识阶段又有着马列主义思想理论的指导。这就是说，在人类的现实的认识过程中，纯粹的感性认识是没有的。

理性认识中也渗透着感性认识。理性认识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但不是一下子产生，而是由于感性的印象在头脑里反复多次逐步地呈现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尔后被人们的理性所把握，这本身说明了感性与理性不能截然分开。反过来，在理性认识对感性材料加工过程中，还要有不同感性材料在头脑中再现，又要经过人脑这个思维器官的认真的和反复的比较。离开了感觉材料的纯抽象的思维，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学科领域（如数学）内存在。然而，即使象数学、哲学等这样一些被视为抽象科学的理论，也都是以大量的感性认识作基础的，在它们的抽象的原理和公式中，也无不蕴含着感性的认识和经验。

最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还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感性认识阶段所获得的感性材料越丰富、越充实、越完备，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升华就越容易、越迅速，理性认识也就越正确、越深刻。另一方面，理性认识又可指导和加深感性认识，人们越是掌握了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规律性，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感觉也就越敏锐、越深刻。毛泽东同志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

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医生诊病，画家看画，科学家观察实验，音乐家听乐曲，等等，他们对认识对象的感觉较之一些外行来说要深刻得多；学得了马列主义理论的人对于社会现象的观察，也较之没有学过马列主义理论的人要深刻得多。总之，事物的现象不论多么纷繁复杂，千变万化，只要通晓了它的规律和本质，就变得容易理解和把握。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在认识和对待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上，曾经出现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错误倾向。教条主义者不了解理性认识对于感性认识的依赖关系，把革命理论加以绝对化和凝固化，反对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教条主义颠倒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犯了类似哲学史上“唯理论”的错误。经验主义者不懂得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必要性，不了解革命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伟大指导作用，犯了类似哲学史上“经验论”的错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损失，其中教条主义所造成的危害最为严重。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把认识和实践统一起来，才能求得认识的完善和发展，才能推动革命事业胜利前进。否则，把两者割裂开来，加以绝对化，就会造成认识上的错误和实践上的危害。

二、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意义更加伟大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不能只停留在理性认识阶段，理性认识还必须再回到实践。毛泽东同志指出，认识运动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只是说到了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还只是说到了并非十分重要的一半。从理性认识回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3页。

到实践的飞跃较之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其意义更加伟大。

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是认识过程的新的继续。如前所述，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的高级阶段，得到了这种认识，对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极为有利。然而，理性认识只是概括了实际经验中最主要的和最基本的东西，它对实际事物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并不能收揽无余。人们只有把理性认识再投入到实践中去，才能使理性认识变得有血有肉。同时，当着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时，原先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会相应地发生新的变化：这时的感性认识，不再是处于认识开始阶段的那种感性认识，而是在理性认识指导之下的对事物的深刻感觉；这时的理性认识，也不再是从感性认识抽象出来、暂时地超脱于实践之外的理性认识，而是同丰富的感觉经验结合在一起，从而显示出事物的条理性和全部丰富性的理性认识。由于使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改变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暂时分离状态，而使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重新结合，造成彼此间相互一致、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新格局，这就必然使人的认识升华到更高阶段。

只有从理性回到实践，才能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当人的认识从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时，认识正确与否，并没有得到证明。只有把在实践的基础上获得的理性认识再拿到社会实践中去，看它是否能达到预想的目的，才能证明原来的认识是否正确。一般说来，凡是达到了预想目的的，就是正确的；被实践所推翻了的，就是错误的。当然，当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时，原先的认识完全被实践所证实的情况是极少的。通过实践，有时要通过多次实践，证明原来的思想、理论、计划、办法等等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这就需要通过实践补充、修改或纠正原来的认识，使不完善的认识变成完善的认识，使错误的认识变成正确的认识。这个证实真理和

发展真理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发现错误和剔除错误的过程。又由于实际情况是变化发展的，将彼时彼地得来的关于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认识用之于此时此地，则必定不能完全符合，这就要对原有的理论作相应的修改或补充，以期适合于新的客观事物的需要。毛泽东同志指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①

从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的和根本的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理论的重要性，因为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实践。我们党之所以高度评价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也正是因为它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在中国变为现实，并且将继续指引中国人民取得更大的胜利。与此相反，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用处的。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的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其意义更加伟大，主要的道理也正在于此。

中国革命中出现的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认识过程中的两次飞跃，尤其不懂得理性认识需要向实践飞跃。在他们看来，理性认识不需要经受实践的检验，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加以凝固化和公式化，或者拿在手中并不实行，或者无的放矢、生搬硬套。这样，就必定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0页。

三、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是作为过程向前发展的，因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也是作为过程向前发展的。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科学地概括和阐明了人类认识发展的全过程或总规律，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结论是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他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又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同志的这两段论述，前者阐明认识发展的全过程，后者则阐明某一个正确认识形成的具体过程，两者都表明了认识过程的反复循环和无限发展。

人类认识的无限性，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决定的。从客观上说，是由社会发展的无限性决定的。由于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限的，因此，无论是每一个人还是每一代人的认识都只具有相对的和暂时的性质。也就是说，"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从主观上说，它又是由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程度的不同决定的。人们的认识虽然是客观世界的真实的反映，但这种反映只是"近似的真确的模写"而不是等同。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主观与客观相符合时说过，这种符合是就"比较"而言的，就是说，是比较地符合、或大体上符合，而不是绝对地完全地符合。

由此可见，人的认识不论如何地发展，总不能一下子完全彻底地暴露客观世界的矛盾和本质，它只能在当时实践条件的许可

下，不断地、多方面地、逐次深入地揭示客观过程中的矛盾。人类认识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认识过程的反复性和无限性说明，它既不是封闭式的圆圈，也不是直线前进，而是螺旋式的上升运动。人的每一次认识的循环都使认识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人的认识和实践的矛盾运动，是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途径具体地表现出来的。而这个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也就是人们的认识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形式上的循环和内容上的扩大与加深。毛泽东同志说过："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①毛泽东同志关于人的认识运动程序的完整表述，把人类认识的无限性及其具体内容生动地呈现到了人们面前。

认识的运动过程，就是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矛盾发展过程，就是主观和客观这一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反复过程。客观的实践是在一定的时间、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285页。

地点、条件下进行的，就是说实践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主观认识要同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客观实践相符合，因此，主观认识亦应是具体的和历史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体现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认识的任务也正在于不断克服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之间的矛盾，求得它们之间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认识同实践如果离开了这种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或者客观实践已经向前推移，而人的主观认识仍然停留在原来的阶段，或者当着事物发展的具体过程尚未结束、而人们硬要把这一过程推移到新的过程，这就要犯保守主义或冒险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①这段论述，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即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基本结论，也是对中国革命根本经验的高度的哲学概括和总结。

为了实现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应该深入分析和研究认识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因素的影响或限制。对人的认识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因素：

首先，人的认识受客观对象的发展及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对象的发展总是有一个过程。当着客观过程的诸方面及其本质尚未充分暴露时，人们要完全把握它的发展规律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之所以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时期，是因为中国革命的实践发展已经把它的本质和规律充分暴露在人们面前。毛泽东同志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①同样地，要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也必须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其次，人的认识也受着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人们认识外部世界，要借助于科学技术和实验手段。当这些手段尚不齐备或尚未被人们掌握时，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有一定限度的。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尤为明显，如人们对宏观世界中天体运动的认识，对微观世界中基本粒子的运动和结构的认识，虽已经历过长期而反复的观察与实验，获得了较丰富和较完备的感性认识材料，也已作出许多科学的和接近于科学的判断，但由于实验手段的不足，在若干问题上至今还限于假想和推测，还有待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为它创造条件，才能进一步探索到大自然的秘密。

最后，人的认识也受着主观精神条件，其中包括人们的科学文化程度、思想意识和思想方法的状况等多种因素的限制。人们的科学文化的程度、思想觉悟的水平和思想方法的状况，对于人们的正确认识的获得和认识能力的发挥关系极大。人们的科学文化和思想觉悟程度越高，思想方法越正确，则人们就越能获得正确认识，在实践中也就越自由；反之亦然。人们的上述主观精神条件是由实践发展的客观条件决定和制约的，因而人们的认识受这种主观精神因素的影响和限制，也是不可避免的。

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关于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理论，是为了使我们能以辩证的观点看待人的认识过程，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能够始终保持一致。这种一致，不是静止的和凝

①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版，第17页。

固的一致，而是活生生的、具体的、运动中的一致。

第三节　坚持真理，发展真理

真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认识过程也就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过程。认识的任务和目的，就在于获得真理，并在真理的指导下去改造世界。

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更加明确地揭示了真理发展的规律性。他指出，真理和谬误是对立的统一，真理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真理是不可穷尽的。

一、真理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

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谬误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歪曲反映。真理和谬误是对立的，是相互排斥和相互否定的，对两者之间的原则界限和区别不能有任何混淆和颠倒。然而，真理和谬误又不是毫不相关的，它们是既对立又统一的。

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例如，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思想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也是在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要发展唯物主义，就要批判唯心主义；要发展辩证法，就要批判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和唯心主义天才论，奴隶们创造历史的

唯物史观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从实际出发和从本本出发，等等，都是截然相反的东西，不清除和批判其中的错误的东西，正确的东西便不能确立。这叫做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真理与谬误的对立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认识根源，在阶级社会里又有阶级的根源。历史上一切反动阶级和剥削阶级，一切受剥削阶级思想严重影响的人们，在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时常常不可避免地要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这是由于其特殊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决定的。唯有无产阶级能较好地避免这种局限性。毛泽东同志说："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资产阶级所以不欢迎这一条真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被人们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①谬误的发生也有认识上的根源，就是认识的片面性。由于任何一个具体事物是由多方面因素组成的，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这就难免带一点片面性。就是说，人们只能在实践中逐步减少片面性，但不能要求消灭片面性。即使将来阶级根源消失了，人们还存在认识的差异，还存在主观与客观的矛盾，还会有片面性存在，真理和谬误的斗争也还将继续下去。毛泽东同志说过，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有主观主义存在，就总要犯错误。

真理与谬误一方面相互对立，另一方面又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

在我国商周时代的《国语·郑语》中记载着史伯的话："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意思是说，单一的曲调就不好听，一样的颜色就没有文彩，一种味道就没有滋味，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37—1538页。

只有一种东西就无从比较好坏。这是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对于相同和相异的辩证法的生动表述。毛泽东同志充分地利用和发挥了这一思想，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高度论证了真的善的美的东西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互依存的道理。他说过：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他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真理与谬误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思想，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为了使真理性认识更加真切和深刻，为了增强对谬误的东西的识别、抵制和批判能力，人们非但不应禁止和杜绝同反面东西的接触，而且应该了解和掌握一些反面的东西。否则，就会缺乏免疫力和战斗力，就有可能为谬误的东西所欺骗，甚至充当谬误的俘虏。

真理和谬误是相互渗透的，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真理只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才存在，倘若超越了真理适用的范围，真理便不再是真理，会变成谬误。例如，把反映自然发展过程的生物进化说，简单地拿来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会出现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的谬误；把牛顿力学的原理应用于量子力学范围，也会成为谬误；把俄国革命中举行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照搬到中国来，又会成为谬误，如此等等。总之，把真理同它所适用的具体对象割裂开来，把真理抽象化、绝对化，或人为地扩大它的适用范围，都会转化为谬误。

由于客观事物是处在不停的运动、发展和变化过程中，所以反映客观事物的真理也应当是变化发展的。如果脱离了客观对象所存在的时间条件，把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真理机械地搬用到

另一个时期，那末，真理就势必转化为谬误。比如，把十年内战时期的党的某些政策照搬到抗日战争时期，那末，真理就会成为谬误；同样，把适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理论和政策，分毫不差地照搬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真理也可能变成谬误。列宁指出，“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①他还说，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毛泽东同志也说，思想必须随着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变化。

总之，任何一个真理都是具体的，它受一定的历史条件所制约。条件起了变化，这一具体真理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让位给同新条件相适应的另外一个具体真理。事物是不断演化的，真理也是不断发展的。离开具体历史条件来谈真理，就会使真理变成谬误。

谬误是对客观事物本来面目的直接歪曲，它自身是不可能转化为真理的。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和特定的意义上，谬误亦可变成真理。这里，大约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种是：人们能够严肃认真地对待谬误，分析谬误，从中吸取必要的经验教训，便可以成为人们认识真理的必要条件。列宁说：“如果我们也犯错误，那末不应该忘记，每个错误都是有教益的。”②毛泽东同志也说过：“吃一堑，长一智”，“我们走过许多弯路，但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都是说的这个道理。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多变，人们的认识又不可能径情直遂，因此，人们要达到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常常需要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认识由片面到全面，由现象到本

---

① 《列宁全集》第24卷，第2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8卷，第60页。

质，由局部到全局的认识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地发现错误和排除错误的过程。由排除谬误而得到真理，也是谬误向真理的特殊意义上的转化。实现这个转化的主要条件在于正视错误，对错误进行认真的科学分析。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对于错误不要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而应找出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从错误中引出正确的认识，从失败中寻找成功的道路，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我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失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作出了正确的科学的评价，也就为今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另一种是：相对于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本来是谬误的东西，当条件变化以后，可能变成为真理。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从1927年起，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积累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在这段时间，提出城市中心论的观点无疑是一个谬误，然而，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到了1949年3月间，毛泽东同志却说："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① 这时就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由此可见，真理与谬误的相互转化，重要的在于条件。不断地研究客观过程和条件的变化，认真地对待正确与错误，是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必由之路。

二、真理是不可穷尽的

如前所述，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而真理发展的这一过程又是由相对到绝对的过程。恩格斯说：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7页。

"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① 列宁也说："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应当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的。"② 这就是说，人类的思维，按其本性、能力和可能性来说，是能够为我们提供绝对真理的，但绝对真理又是通过一系列相对真理实现的。

毛泽东同志继承了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些思想，进一步阐明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阐明人类的认识是从相对真理不断向绝对真理接近的过程。他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③ 他接着说："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5—126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①毛泽东同志深刻阐明的关于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辩证关系的思想和关于真理不可穷尽的思想，对于指导党的实际工作，对于克服和批判党内出现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倾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认识过程，正是在斗争实践中经历一个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完全认识到比较完全认识的逐步深化的过程。比如，我们党对中国武装革命具体道路的认识，只是在经过多次武装斗争的失败之后，才逐步被全党认识的；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只是到了抗日战争的末期，才有了比较完整的表述；我们党对在社会主义时期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在经历较长时期的正反两方面的斗争实践之后，至今已获得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体道路的探索，现已把握了它的基本点，但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规律。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指出，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也同对其他事物的认识一样，要经历一个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程。在他看来，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重要的是认识论，甚至可以说，哲学就是认识论。因此，他十分强调要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要加强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提高认识，少犯错误，做好工作。

在真理问题上，哲学史上曾经出现过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两种错误思想。与此相类似，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问题上，也曾经出现过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两种错误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

倾向。我党历史上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属于真理问题上的绝对主义，它们都否认真理的相对性。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革命导师的论述和苏联的经验绝对化，把它视为万古不变的僵死教条，否认革命理论需要变化、发展；经验主义者则把自己的经验绝对化，把它夸大为绝对的和普遍的东西。在我国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又出现过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倾向，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主义，否认有什么真正科学的革命理论的存在。这是真理问题上的相对主义和怀疑论倾向。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历来主张应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反对任何把马列主义凝固化和否定与怀疑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①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从而为我们指明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

客观世界在不断地向前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仍将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我们应该牢牢坚持和进一步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真理和谬误是客观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发现和坚持真理，防止和克服谬误，却又离不开人的自觉努力。毛泽东同志不仅明确地揭示了真理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而且为我们指明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正确态度和方法。

---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515页。

真理是不可战胜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必然战胜假的、恶的、丑的东西，新生的进步的力量必然战胜腐朽的反动力量，这是不可移易的规律。然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历史上又有许多新的正确的东西却常常被扼杀，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常常不被多数人所承认，甚至还遭到反对和打击。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的和阶级的根源，也有认识上的根源。

真理是客观的，它本身并没有阶级性。但是在阶级社会中，某些真理的内容又是同一定阶级的利益直接相关的，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和运用也会受到阶级的制约和影响。列宁说过："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自然历史理论触犯了神学的陈腐偏见，引起了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引起最激烈的斗争。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当前的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这就不足为奇了。"①在阶级社会里，当着某些真理的内容触犯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时，他们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扼杀真理。中外历史上为坚持真理而惨遭杀害的革命家、改革家、理论家和科学家，屡见不鲜。

在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正确领导，就为真理的发展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条件。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②这是由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虽然剥削阶级消灭了，但是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和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却仍

---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1页。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26页。

然存在，使得一部分人习惯于从旧的观念和个人利害出发去看待新生事物，以致对新生事物百般挑剔，冷嘲热讽，压抑打击，甚至加以迫害。

压抑真理的发展，除了有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之外，也还有认识上的原因。真理的发展是一个过程。真理往往不是一下子就被人们接受的，它总是经过反复实践，在人们头脑里造成了深刻印象之后，才会被人们所承认。这就是说，从真理被人们掌握的情况来看，真理在开始的时候，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它只能在斗争实践中才能逐步被多数人所掌握。毛泽东同志在分析真理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曾经指出：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思想是十分深刻的，对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坚持真理、为真理而斗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要坚持真理，首先要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坚持真理同坚持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以及坚持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一个革命者要牢固树立为人类解放事业和科学事业的发展而献身的宏伟志愿和斗争精神。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的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以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始终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百折不挠，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不息，正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崇高的理想和宏伟志愿，他们为后人树立了献身真理的光辉榜样。社会主义社会为真理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真理发展的道路同样是不会十分平坦的，打击和迫害坚持真理的人的情况也还时有发生。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革命者要解放思想，敢于和善于斗争，要相信在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真理终究会获得胜利。

当然，也应当说明，坚持真理是坚持符合于客观实际的那种认识，这同固执己见和坚持已有的现成结论是两回事。已有的结

论在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下是真理性认识，然而随着条件的变化，除了若干基本原则仍然有效外，有些结论可能过时，另一些结论则须修改。如果把坚持真理误解为一味拘泥于以往的全部结论，甚至不允许有任何异议，那就不仅不能坚持真理，还会因为认识落后于客观实际的发展而丧失真理。

坚持真理同修正错误是相联系的，要坚持真理就必须修正错误。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①；又说，我们搞革命和建设，总难免要犯一些错误，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问题是要犯得少一些，小一些；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愈迅速愈彻底就愈好。要纠正错误，取决于两方面条件的配合：对犯错误者本人说，要不讳疾忌医，能正视错误，勇于承担犯错误的责任；对帮助改正错误的人来说，要允许别人犯错误，要善于分析错误。尤其是对待犯错误者，既要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地指出错误，又能热情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毛泽东同志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内进行思想斗争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只有坚持这一正确的公式和方针，才能达到弄清是非、团结同志、继续前进的目的。

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②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曾经犯过错误，甚至犯过严重错误。但是，由于我们党坚持了对人民和对革命的严肃负责的正确态度，于是，纠正了自身的错误，我国的革命事业就又继续前进了。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党的成长壮大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25页。

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也正是在同党自身的错误的斗争中实现的。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工作指导上的失误，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一切充分说明，我们党完全能够依靠本身的力量，克服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领导全国人民向着未来宏伟的目标英勇奋进。

第五章　宇宙的根本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是分析矛盾、解决矛盾最锐利的武器。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成功地分析和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许多复杂矛盾。同时，又以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处理各种矛盾的丰富经验，从各方面展开对对立统一规律的论述，系统地论证了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发挥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

第一节　矛盾问题是辩证法的中心问题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为了解决各种尖锐复杂的矛盾，紧紧抓住辩证法这一核心问题，从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量变质变、肯定否定都是对立的统一等方面，进一步论述了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法则。

一、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矛盾问题作为唯物辩证法的中心，最根本的在于它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列宁指出，在发展问题上，一直存在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发展观。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①它把发展看作是对立面的统一，从而揭示了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动因。形而上学的发展观由于否认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因而“是死板的、贫乏的、枯竭的。”②毛泽东同志发挥了列宁的这一思想，提出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进一步揭示了两种发展观的对立。他指出：“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③后来，毛泽东同志又提出哲学上的“两个对子”，进一步论证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的对立。他指出：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这“两个对子”的矛盾和斗争，推动着哲学的发展。毛泽东同志把唯物辩证法作为宇宙观，克服了那种把唯物论当作世界观，把辩证法只当作方法，使唯物论和辩证法分离的片面性，科学地说明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

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承认内部矛盾引起事物的发展。他说：形而上学由于否认矛盾，否认内部矛盾引起事物的发展，简单地从事物外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2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5页。

部去寻找发展的原因，因而不能解释事物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转化为他种质的现象，把发展看作不过是数量的扩大和缩小，一种事物只能反复地产生同样的事物。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则认为研究事物的发展，首先必须研究事物内部的矛盾。毛泽东同志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① 研究事物的发展，必须着眼于研究事物内部的矛盾。比如，从事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要了解中国革命的规律，就必须研究中国社会的矛盾，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相互关系，这样才能找到中国革命发展的动力。

其次，要研究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着。这种相互联系构成事物的外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外因。比如在社会发展中，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影响是时常存在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和互相激励，是极其巨大的。这就决定了要了解中国革命的规律，也必须联系它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条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联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联系十月革命以后的国际环境来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从而正确地认识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道路与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再次，要从事物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地位和作用及其转化上去研究。事物的发展是事物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这两种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同的。毛泽东同志指出，事物发展过程中"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

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①内因即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它决定事物发展的过程和方向，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外因发生作用的基础，因而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据，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是事物的外部矛盾，它不能说明事物千差万别的性质及其相互变化，只能通过对事物内部矛盾的影响而发生作用。外因在一般情况下，对事物发展的过程只能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不会改变事物发展的方向。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当外部影响的力量超过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力量时，外因就会改变事物发展的方向，从而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比如在生物进化过程中，由于环境条件的变化使某些生物绝种，或者改变某些生物的发展方向。但即使是这种情况也是通过生物机体内部起作用的，而且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从总体上讲，外因只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

毛泽东同志关于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的理论，进一步深刻地阐明了内部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揭示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对立的内在根源，从而发挥了列宁关于辩证法是全面深刻的发展学说的思想，从世界观的高度论证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实质和核心地位。

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内因和外因的理论，对于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有巨大的指导意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内外因相互关系的原理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运用于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指导，形成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应采取的基本指导方针。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是国际性的事业，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因此，各国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革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

命和建设事业应当相互支援，应当尽可能多地学习和吸取其他国家所创造的革命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那种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思想是错误的。然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又必须首先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走自己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① 就是说，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那种崇洋媚外、一切依赖外国的思想，也是根本错误的。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教条主义者不相信本国人民的力量和创造性，不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去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只是简单地照搬外国的经验，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意见，遂使中国革命一度陷入绝境。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从而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使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历史的经验深刻地表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同世界革命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但是如果不是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就无法取得并有效地利用国际援助，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②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要坚信事物自己运动的力量，增强革命和建设必胜的信心。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③ 过去，我们依靠自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1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7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7页。

己的力量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也一定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当然，我们既要反对别国干涉我国内政，又要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要坚信各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只能由他们根据本国特点去选择，他们也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二、量变质变是对立的统一

辩证法作为全面的发展学说，它是由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一系列范畴所组成的科学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在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过程中，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发展，创立了唯物辩证法的科学体系。由于他们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改造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赋予辩证法以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形态，因而他们论述的重点是辩证法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他们虽然提出了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辩证法运动的实质"①，是"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②的思想，但是没有详细考察辩证法规律之间的内部联系。列宁在新的条件下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着重阐述了辩证法规律和范畴的内部关系，指出只有对立面的统一"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③列宁逝世以后，苏联三十年代哲学以及中国三十年代哲学都对列宁的这一思想作过一些正确发挥，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研究了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各种矛盾的发展变化，特别是研究了中国革命过程中敌强我弱这一矛盾的发展变化，总结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以及中国革命曲折发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页。

③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展的经验，深刻地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同辩证法其他规律和范畴的内在关系。

毛泽东同志认为，事物量变质变的过程就是事物矛盾双方的同一与斗争及其转化的过程。量变质变的本质内容就是对立统一。首先，他指出，事物的质是由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所规定的。他说："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① 由于事物内部包含着许多特殊的矛盾，所以事物的质是多方面的。各种特殊矛盾的有机统一，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质。自然、社会和思维中各种事物、现象的质的区别，都是由其内部的矛盾所决定的。

其次，量变质变是矛盾运动的不同状态。毛泽东同志指出："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② 这说明量变和质变都是由矛盾斗争所引起的两种运动状态。量变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的运动状态。质变则是矛盾统一体分解达到矛盾解决的运动状态，这种状态是由矛盾斗争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改变，主次地位发生转化，解决旧的矛盾，引起事物性质的变化。一切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这样，由于矛盾双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3—284页。

② 同上，第306—307页。

方的斗争，事物的发展总是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达到矛盾的解决。

第三，事物发展过程中，根本矛盾的逐渐激化和非根本矛盾的变化，决定了事物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不能平均看待，有根本矛盾和非根本矛盾的区别。根本矛盾贯穿过程始终，规定过程的本质，非根本矛盾决定事物的次要的性质。根本矛盾不解决，过程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由于根本矛盾的逐渐激化和非根本矛盾的缓和、激化、解决与产生的变化，决定了事物在根本性质发生变化以前，会产生部分性质的变化。这就揭示了总的量变过程中部分质变的根源。我国的民主革命长期处在白色政权包围之中，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的过程就是总的量变过程中部分质变的一种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论述了总的量变过程中部分质变以及量变和质变的交错关系。他指出，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来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因为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就是“边”的突破，就是部分质变。比如生物机体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的阶段，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的阶段，人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不断进步等等，就是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

第四，矛盾双方的性质决定双方质量变化的基本方向。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分析中日矛盾的发展变化时指出：在中日矛盾中，中国方面是进步的，正义的，日本方面是野蛮

的，退步的，这就决定了中日双方的质和量存在着“向上”和“向下”的两种交错变化。在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中国方面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等的缩减，这是向下的变化。然而必须看到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就是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在第一阶段，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表现在质上。在第一阶段中，日本方面也有两种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变化，即几十万人的伤亡，武器弹药的消耗，士气的颓废和国内人心的不满，贸易的缩短，一百万万日元以上的支出，国际舆论的责备等等方面。然而它也有第二种变化，即向上变化，那就是扩大了土地、人口和资源。毛泽东同志根据中日双方质与量的“向上”与“向下”的交错变化的分析，科学地预言了抗日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和各个阶段上中日双方的态势。他指出，在第一阶段，敌是优势，我是劣势，因此敌处进攻，我处防御。第二阶段；敌我力量将变到平衡、均势，双方将处于相持状态。第三阶段，日本将变到劣势，我将变为优势，敌处退却，我转入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整个抗日战争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科学预见。毛泽东同志从战争中矛盾双方的性质决定双方质与量的向上和向下的两种变化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探讨了矛盾运动同质量变化的关系的一个新的方面，说明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由于矛盾斗争，双方都会出现质与量的向上和向下的两种变化。其中代表事物发展方向的方面向上的变化是新的质和量，向下的变化是旧的质和量。而旧的保守的方面在斗争的一定阶段也会出现向上和向下的两种变化。向上的变化是一时的量的扩大，向下的变化主要是旧的质，这就使这一方面的质与量的对立更加尖锐，必然使它在同新的方面的斗争中逐渐处于不利地位，使它的整个质和量逐渐向下变化，最后被新的方面所战

胜，实现矛盾转化，产生根本的质变。

毛泽东同志关于矛盾运动同量变质变关系的论述，发挥了列宁关于“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转化”是对立面的统一的思想，深刻地说明了量变质变规律同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在联系，说明了量变质变的本质就是对立统一。

三、肯定否定也是对立的统一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它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中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毛泽东同志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曲折发展的经验，用对立统一规律阐明否定之否定规律，明确提出肯定否定是对立统一，说明了否定之否定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是事物的波浪式或螺旋式的发展，强调辩证的否定就是矛盾分析。

毛泽东同志指出，任何事物都是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他说：“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①即都是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这种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存在于事物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事物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事物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阶段，都既包含着自身的肯定因素，又包含着对自身的否定因素。当肯定因素是矛盾主要方面时，事物处于肯定阶段。由于矛盾斗争引起双方力量对比的改变，否定因素上升为主要方面时，事物就处于否定阶段，这时事物的发展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阶段又产生新的否定因素，形成新的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事物的发展就是这样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推移前进。每一阶段的否定和肯定因素，在一定时期都是新生的和革命的。但是随着矛盾斗争的发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页。

展，它们都将走向自己的反面，都将被新的因素所否定。比如在社会发展中，“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①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这样由肯定走向否定，到新的肯定，再到新的否定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决定了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毛泽东同志指出，这一规律的实现是由于事物内部“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②这说明新事物是在旧事物内部产生和成长起来的，新陈代谢的过程是一个新与旧（否定与肯定）不断斗争和转化的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曲折发展的过程。在斗争过程中新与旧的力量对比的改变不是直线进行的，而是一个有进有退、有伸有缩的过程。毛泽东同志在论述人民与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斗争时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而“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③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逻辑”和人民革命的“逻辑”，正是

① 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88页注。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29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5—1376页。

新事物同旧事物斗争的曲折过程的体现。肯定否定是对立的统一也说明，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他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

肯定与否定、立新与破旧是辩证统一的。但是长期以来，在我国的理论宣传中，只强调破，不强调立。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科学地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他在论述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时，曾经明确指出：“不能认为只要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①他强调要有破有立，立新才能破旧。立新破旧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的事物在开始时总是作为一些新的因素在旧事物中产生，只有新的因素成长到一定程度，才能产生根本质变，否定旧事物，产生新事物。根据这一规律，破与立不一定是同步进行的，也不是任何破都能产生立的结果，只有当新的因素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否定旧事物就不能继续发展的时候，才必须强调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如果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强调破，不强调立，必然是：或者旧的破不了，新的立不起来，结果依然如故；或者人为地破了旧的，造成事物发展的中断，不能达到破旧立新的目的。只有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过程，强调立新破旧，才能实现弃旧图新，保持事物发展的连续性。例如，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经济体制的改革，就不能先破后立，必须认真作好调查研究工作，提出切实可行的方针和措施，并经过试点，然后才能逐步加以推广。

事物矛盾运动的发展过程，是事物经过否定之否定而实现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过程。列宁指出，否定之否定就是事物发展“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特性等等，并

---

① 《邓小平文选》，第296页。

且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①的螺旋式或波浪式的曲折前进。毛泽东同志指出，这是矛盾运动的曲折性的表现。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他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围剿”和反“围剿”长期反复的经验，以及革命根据地波浪式向前扩大的经验，指出“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②但是，“左”倾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一道理，他们忽视敌强我弱这一事实，不顾客观条件，总是希望革命的道路笔直又笔直，反对任何迂回和妥协，只准死打硬拼，不许战略退却，结果给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实践证明，中国革命过程，经历了胜利和失败，高潮和低潮，进攻和退却等等极其复杂的过程，最后才取得了胜利。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一次讲话时又指出：“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阳的光射来叫光波，无线电台发出的叫电波，声音的传播叫声波。水有水波，热有热浪。……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这种曲折性是由矛盾斗争和它发展所处的条件所决定的。在矛盾双方斗争的过程中，双方力量的消长变化是不平衡的，条件也是不断变化的。当着条件具备，矛盾双方顺利实现转化，事物就前进，就发展。而当条件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的时候，矛盾双方就不能转化，或只能部分的转化，这时事物就缓慢发展。这就使事物的发展过程呈现出波浪起伏的状态。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消费和积累的矛盾时说：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今年如果丰收，积累要比去年多一点，但是不能太多，还是先让农民吃饱一点。丰收年多积累一点，灾荒年或者半灾荒年就

---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1页。

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就是说，积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这种螺旋式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事物发展的这种曲折性和前进性的统一，决定了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需要经过艰苦的斗争，也必然会有光明的前途。

肯定与否定作为思想方法，就是要对矛盾双方作全面分析，反对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的片面性。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的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也不要肯定一切。只有坚持具体的全面的分析，才能肯定正确的东西，否定错误的东西，才能正确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他说："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①这是一种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或绝对性。

为了对我们的工作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分清矛盾主次的界限。他说："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如果是七分成绩，那末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②对一切事情都要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分清主次，才能正确地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辩证否定的观点应用于对文化遗产的处理，提出对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必须有批判地继承和吸取的思想，并制订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他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应当给以总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4页。

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但是，这种继承“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必须对古代文化加以分析，“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②，对待外国文化的学习借鉴也必须采取这种批判吸取的方针。只有坚持这样的方针，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

毛泽东同志不只是用对立统一规律说明量变质变、肯定否定，在他看来，可能和现实、全局与局部、自由与必然、本质和现象等范畴，也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所以，对立统一规律贯穿在整个辩证法之中，是辩证法的核心。

第二节　矛盾双方又同一又斗争构成事物的矛盾运动

矛盾作为事物发展的原因，在于矛盾双方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毛泽东同志科学地论述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指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矛盾运动，推动事物发展。

一、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

矛盾同一性是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联结和转化。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原理，并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对矛盾同一性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他指出，对立面在一定条件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7—668页、第499页。

② 同上，第668、667页。

下的“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它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①毛泽东同志对这两个方面还进一步作了具体的论证。他指出，不同性质的根本对立着的东西之所以能够同一，是因为矛盾着的各个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条件。自然界和社会中一切对立着的东西之所以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就是因为它们互为存在条件，互相依存。在同一性两方面的含义中，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转化的意义。他说：“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②他联系社会和自然界的许多现象说明矛盾同一性中包含着转化。例如被统治阶级经过革命斗争获得解放；战争以后出现和平；中国革命经过长期的斗争改变敌强我弱的状况取得革命的胜利；私有制过渡到公有制；地球上从无生物产生出生物来；等等，都是因为统一中包含着转化。如果矛盾双方只是相互依存，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那末这种同一只是僵死的同一，事物就不会变化发展。有转化才能有发展，转化体现了辩证法的革命性，说明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一切矛盾斗争只要具备了一定的必要条件，对立的东西就会发生转化。

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对矛盾统一性作出科学的规定，并特别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3、301—302页。

② 同上，第303页。

强调转化的重要性，首先是依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矛盾同一性的原理。关于矛盾同一性的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经说过，生产和消费的直接同一是生产和消费“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媒介；这表现为它们的相互依存”；“互不可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① 恩格斯也指出：“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们是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又说：“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包含着差异和变化”。② 列宁十分重视矛盾的同一性，他甚至把辩证法叫做研究对立面同一的学说。他说：“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做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做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③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这些论述说明了矛盾同一性的基本内容，给毛泽东同志关于矛盾同一性的规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次，是对于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经验的总结。中国革命是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发生的。在革命过程中，经过革命和反革命的长期反复的斗争，才使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反革命力量则由大到小，由强到弱，最后被消灭。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到胜利的曲折发展过程，正是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统一和转化的生动体现。

再次，是对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对立双方的依存和转化思想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5—9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130、538页。

③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1页。

批判继承和科学总结。中国哲学史上有着丰富的对立统一和矛盾转化思想。例如《易传》中就提出过"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思想。老子《道德经》中也提出过"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等对立统一和物极必反的转化思想。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矛盾同一性含义的思想，正是对上述思想的批判继承。他针对中国哲学史上讲对立统一和转化不讲条件的局限性，指出现实的具体的矛盾双方的共居和转化都需要一定的条件。他说："我们所说的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① 矛盾双方之所以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是因为各具一定的条件，"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② 这样就使矛盾统一和转化的思想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成为科学的真理。

毛泽东同志对于矛盾同一性两个方面含义所作的规定，是对于客观事物本身的辩证同一的科学概括。这一概括对于坚持辩证法，指导革命和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告诉我们：在一切工作中，都必须积极创造条件，努力工作，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人们既定的目的。

二、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和斗争形式的相对性

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倾向。列宁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5、307页。

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①毛泽东同志结合我们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着重论述了矛盾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性的绝对性以及斗争形式的相对性。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斗争性无条件地贯串过程始终，同一性则是有条件的，随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他说：“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②为什么呢？因为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相对静止的量变状态，还是显著变动的质变状态，矛盾双方互相排斥、对立的斗争性是不受条件限制的。它能够冲破旧的条件的束缚，创造事物发展的新的条件，使一过程向他过程转化。它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要贯彻下去的趋势。它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阶段，贯串过程始终，所以矛盾斗争性是绝对的。而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和转化都要受一定的条件限制，没有一定条件，就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同一性又是随着条件的改变而变化的。当事物处在相对静止的量变阶段时，矛盾的同一性主要表现为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的统一状态。而当事物处在显著变动的质变阶段时，矛盾双方的同一性则主要表现为双方转化的同一。所以同一性是有条件的、可变的，因而是相对的。

从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相互制约来看，矛盾的同一要依靠斗争来建立、维持和发展；如果没有斗争性，同一只是不变的、僵死的同一。当着这一定的同一建立起来以后，也只有依靠双方互相限制的斗争性才能保持双方力量的一定的对比关系，维持统一状态。当着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不能继续前进的时候，又只有依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7页。

靠斗争性，才能使矛盾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改变，从而打破旧的统一，建立新的统一。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过程。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就经历一个建立、巩固、发展、破裂，又建立，又巩固，又发展，再破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始终存在，但是统一战线的内容却因条件不同而几经变化。我们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经验说明，矛盾双方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而同一性是有条件的，它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同一性依靠斗争性来建立，依靠斗争性来维持，也由斗争所打破。所以，毛泽东同志说："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① 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矛盾的斗争性是普遍的、绝对的，斗争形式却又是多样的、相对的。关于矛盾斗争形式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时，提出敌对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一种对抗形式。列宁进一步地把矛盾同对抗区别开来，指出"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② 毛泽东同志结合我们党处理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不仅论述了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性的绝对性，而且进一步论述了矛盾斗争性同斗争形式的关系，指出矛盾斗争是绝对的，但是斗争形式是相对的，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斗争性原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问题上不分清矛盾性质，不区分矛盾斗争的形式，把矛盾斗争形式绝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8页。

②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版，第13页。

对化。他们一概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过火斗争，伤害了很多同志，给党造成了损失。为了从思想理论上深刻揭示教条主义组织路线的错误根源，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专门研究了矛盾斗争的形式问题。后来，他又根据社会主义时期处理各种矛盾的经验，对这一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他指出，矛盾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而矛盾斗争的具体形式又是特殊的、相对的。在矛盾的斗争形式中，“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①。对抗是矛盾双方采取外部冲突的斗争形式。在人类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发展到最后，都要采取对抗的斗争形式来解决。在自然界中，采取外部冲突形式去解决旧矛盾、产生新事物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毛泽东同志指出，认识对抗这种斗争形式极为重要，“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共产党人必须揭露反动派所谓社会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等等欺骗的宣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使人民懂得，这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和苏联的胜利，都证明了这个科学的真理。”②

但是，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有些矛盾的斗争并不取对抗的形式，而取非对抗的形式。所谓非对抗就是不通过外部冲突，而通过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斗争，调整关系，建立和谐与统一，使矛盾得到解决。如工农之间、城乡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等等矛盾斗争，就是一种非对抗的形式。

矛盾斗争采取何种形式是由矛盾的性质和它所处的历史条件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8页。

② 同上，第308—309页。

决定的。毛泽东同志说：“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①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世界上各种事物的矛盾都带有自己的特殊的性质，但是，从矛盾产生的基础来看，可以区分为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两大类。对抗性的矛盾是在双方根本对立的基础上产生的矛盾，双方之间的冲突、对立支配它们之间的同一。比如社会矛盾中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就是在根本利益对立的基础上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发展到最后必然采取外部冲突的形式来解决。非对抗性的矛盾则是在双方根本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的同一支配着双方的对立。比如工农之间的矛盾就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不采取外部冲突形式来解决。一般说来，对抗性矛盾最终都要采取外部冲突的形式去解决，而非对抗性矛盾则不采取这种形式去解决。

不仅矛盾的性质决定矛盾斗争的形式，而且矛盾所处的历史条件也影响着矛盾斗争的形式。同一性质的矛盾，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斗争形式也会有所区别。这里所说的历史条件，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矛盾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毛泽东同志指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着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阶级社会中，由和平向战争的转化，也是如此。”②这就是说，即使是对抗性的矛盾，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采取对抗的形式，只有到了矛盾双方斗争激烈的阶段，才会取对抗的形式。懂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9页。

② 同上，第308页。

得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地选择时机，解决对抗性矛盾是十分重要的。二是矛盾所处的外部条件不同，斗争形式也不同。例如炸弹在未爆炸的时候，是矛盾因一定条件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待到新的条件（发火）出现，才发生爆炸。又如共产党同国民党顽固派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这个条件，其斗争形式就不同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那种内战的形式，而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在不破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限度内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形式。一切矛盾都是这样，一方面因性质不同，另一方面又因矛盾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不同，于是便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对任何矛盾都应该研究它的性质和所处的历史条件，从而确定采取什么方式去解决矛盾。

矛盾的性质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与此相适应，随着矛盾性质的变化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毛泽东同志指出，矛盾的性质和斗争形式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他说："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①

矛盾斗争的绝对性和斗争形式的相对性原理，要求我们必须把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结合起来，既要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敢于同一切敌人，一切困难，一切错误的东西作斗争，又要有冷静的头脑和科学的态度，具体地分析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它们所处的历史条件，采取恰当的斗争形式加以正确处理。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的统一，才能避免"左"或右的错误。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9页。

三、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推动事物的发展

矛盾推动事物的运动发展，最终是由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决定的。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恩格斯说：“所有的两极对立，总是决定于相互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之中，反过来说，它们的相互联系，只存在于他们的相互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他们的相互对立之中”。①毛泽东同志结合我们党处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进一步论述了矛盾双方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构成矛盾运动，推动事物发展。他指出，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就是“相反相成”的关系。“‘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②矛盾双方因为对立才统一，又因为统一才对立。斗争性是同一性的基础，同一性又包含着斗争性。矛盾的这两种属性是互相联结不可分割的。在矛盾运动过程中不可能丧失某种属性只存在另一种属性。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这种关系，要求我们在观察事物时，要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看到对立。如果把二者割裂开来，只看到斗争或者只看到统一，都会犯片面性错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右倾机会主义在对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就是不能把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联系起来，要么只看到统一，强调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第一次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要么又只看到斗争，主张一切斗争，否认联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1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8页。

（如第二次国民革命战争时期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他们总是把本来互相联结的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割裂开来，因而在实践中屡犯错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用对立统一观点来分析和处理各种矛盾，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在民主革命时期，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出：我们的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① 我们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是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相互关系原理的具体应用，而毛泽东同志关于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论述，又是对我们党各个历史时期在实行统一战线政策过程中正反两个方面历史经验的哲学概括。毛泽东同志把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结合起来，说明事物的运动发展。他说：“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②，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又说：“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③

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贯串在整个矛盾运动过程中，推动着事物从量变到质变。毛泽东同志说，事物的量变状态和质变状态都是由矛盾双方的又统一又斗争引起的。当着事物处在量变阶段时，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为主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这时同一性的力量超过斗争性的力量，它限制着斗争性的发展规模和程度，使它不能超过统一体的限度，因而事物能保持质的相对稳定性，显现出统一、平衡、静止的状态。但是，由于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和矛盾斗争性的作用，事物不断发生量的变化。而当着量的变化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2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7页。
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9—10页。

达到最高点时，事物就突破限度，进入质变阶段。事物的质变阶段，是以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为主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这时事物矛盾的斗争性较之它的同一性表现更为显著，于是，就推动矛盾双方迅速转化，引起统一体分解和平衡状态的破坏，使旧的矛盾得到解决。

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推动事物发展的原理，要求我们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必须把同一性和斗争性联系起来，要根据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具体地分析同一性和斗争性的作用，不能只强调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

第三节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相互联结的

事物的矛盾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要认识事物，就必须分析具体事物的矛盾，分析在具体事物中体现的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联结。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他们之所以犯错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了解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不了解分析矛盾特殊性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为了彻底批判教条主义，解决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着重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分析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关系，提出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是矛盾问题精髓的重要论断，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增添了新的内容。

一、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矛盾是客观地普遍地存在的。恩格斯指出：矛盾“客观地存

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是一种实际的力量”，“运动本身就是矛盾”。①列宁也认为，对立统一“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倾向。”②恩格斯和列宁着重指出了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都包含着矛盾。毛泽东同志不仅肯定了矛盾的普遍性，而且对矛盾普遍性的含义作了明确的概括。他指出矛盾普遍性或绝对性，“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③他具体地分析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的矛盾，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诸种矛盾，以及人的概念的差异，党内的思想斗争等等，进一步明确地指出，不论是简单的运动的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论是客观现象或思维现象，矛盾都是普遍存在着，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毛泽东同志还从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一观点出发，论证了矛盾贯串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并指出，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差异就是矛盾。三十年代，苏联哲学界的德波林学派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而是只存在于过程的一定阶段。毛泽东同志指出，按照德波林的这种观点，在矛盾出现以前的阶段，事物的发展不是由于内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了。这就不能坚持内部矛盾引起事物的发展的观点，因而也就必然会回到形而上学的外因论。针对德波林学派的观点，毛泽东同志论述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差异就是矛盾。他说：“劳资之间，从两阶级发生的时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仅仅还没有激化而已。工农之间，即使在苏联的社会条件下，也有差异，它们的差异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0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0页。

争的形态，不同于劳资间的矛盾”。① 又说：“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② 应该指出，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说的差异，当然不是指任何差异，而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是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的内部差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差异同矛盾，“是矛盾的差别性的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的问题。”③ 只有坚持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差异就是矛盾的观念，才能说明矛盾贯串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从而坚持矛盾的普遍性，避免形而上学的外因论。

毛泽东同志关于矛盾普遍性的概括不仅指矛盾的普遍存在，而且还指矛盾的共同性质，即同类事物的矛盾具有的共同本质。他说：“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所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各国所共有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说来，这是矛盾的普遍性”④、矛盾的共性。只有认识矛盾普遍性的这一方面，才能说明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才能说明矛盾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互相转化。

毛泽东同志关于矛盾普遍性的概括对于坚持辩证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人们懂得在一切工作中矛盾是不能回避的，只有正视矛盾、解决矛盾，才能不断前进。

二、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都各有其特点

矛盾的普遍存在是通过各种具体事物的矛盾表现出来的。要

①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2页。

② 转引自艾思奇：《哲学与生活》，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3页。

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就必须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弄清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矛盾的特殊性，即矛盾的相对性、个性，是具体事物的矛盾及其每一侧面各自的特点。它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是世界上各种事物千差万别的内在根据。对于矛盾特殊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提出过一些很重要的思想。比如恩格斯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时，曾经提出：要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然后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①。列宁也指出："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②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③如前所述，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矛盾特殊性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突出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教条主义者拒绝分析中国矛盾的特殊性，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外国经验，使中国革命遭受巨大损失。毛泽东同志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中，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对矛盾特殊性问题作了全面的和系统的阐述。

首先，一切事物的矛盾都有特殊性。一切都是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一切事物的矛盾在不同的条件下，都带有自己的特殊性。毛泽东同志根据自然科学研究以及中国革命过程中遇到的不同的矛盾，论述了矛盾特殊性的五种情形。他指出，矛盾特殊性包括"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6—187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857页。

③ 《列宁全集》第4卷，第290页。

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①的特殊性。这就是说，各种矛盾在其存在、发展及相互联结上都有着矛盾的特殊性。从矛盾的存在来看，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有特殊性。世界由运动着的物质组成，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一定的形式。各种不同运动形式的矛盾，表现为不同事物之间的矛盾。这种特殊矛盾是各种事物相区别的根据，是各门科学区分的根据。从矛盾的发展来看，每一种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在其发展的不同过程，是由其所包含的特殊的根本矛盾所规定的。例如，在社会这种运动形式中，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之所以有区别，就是因为它们所包含的根本矛盾即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各异的。根本矛盾变化了，社会形态就发生变化。事物发展过程中，根本矛盾规定过程的本质，根本矛盾不消失，过程的本质就不会改变。但是，在过程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上的矛盾也有特殊性，这是因为根本矛盾在其发展过程中或者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或者被根本矛盾所规定和影响的其他许多矛盾发生了变化，矛盾发展过程也就显现出阶段性的差别。毛泽东同志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区别为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阶段，其矛盾是各有其特殊性的。中国民主革命区别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大的历史阶段，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又区别为好几个阶段，这些不同阶段的矛盾都带有特殊性。从矛盾各方面的互相联结来看，事物发展的同一过程或阶段上，矛盾双方所处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也各有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

其次，把握矛盾特殊性是正确认识和解决事物矛盾的基础。针对教条主义不了解分析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强调分析矛盾特殊性是正确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基础。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页。

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毛泽东同志多次引用这一精辟论断来说明分析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意义，并对列宁这一思想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论证。他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互相联结关系说明，只有分析矛盾特殊性才能找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他强调指出，人们认识事物必须认识它和其他各种事物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注意它和其他事物的区别。“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① 他还从人类认识发展过程进一步论证了分析矛盾特殊性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基础，指出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类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这是人类认识过程发展的规律。在这一过程中，基础的东西是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只有从矛盾特殊性出发，才能不断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使人类认识不断地加深和扩大。毛泽东同志根据认识的这一规律，深刻地揭露了教条主义的认识根源。他指出，教条主义不懂得人类认识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这样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他们拒绝对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变成枯槁和僵死的东西，他们完全否认或颠倒了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因此，教条主义者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

分析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还在于只有认识了矛盾的特殊性，才能正确地解决矛盾。矛盾的解决方法是由矛盾的性质决定的。矛盾的性质不同，矛盾双方的地位、相互依存的关系和相互斗争的形式也就各不相同。因此，只有分析矛盾特殊性，弄清矛盾的特殊性质，才能找到解决矛盾的具体方法。

三、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与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

毛泽东同志认为，对于事物矛盾的特殊性不仅要从不同的层次去把握，而且要着重从矛盾的地位和作用来分析。他指出，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由于矛盾斗争和条件的作用，矛盾双方力量对比不断改变，形成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由此产生的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方面是矛盾特殊性的两种特别重要的情形。分析矛盾特殊性时，只有找到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才能确定事物的性质，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平衡与不平衡是反映事物运动状态的一对范畴。恩格斯把平衡与运动联系起来考察，指出：“相对静止即平衡”；“平衡是和运动分不开的”，“是有限制的运动”，①是一种运动形态。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不同领域之间的平衡时，把平衡看作是事物内部各方面的协调关系。②列宁也认为平衡是同适应相一致的，③并认为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他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各帝国主义的矛盾，揭示了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胜利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9、68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604页。

③ 参看《列宁全集》第3卷，第566页。

著名论断。毛泽东同志结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各种矛盾发展的状况，把平衡与不平衡同矛盾运动联系起来，进一步揭示了平衡和不平衡是反映事物发展过程中诸矛盾或矛盾诸方面力量的不同的对比关系。他在论述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时说：“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什么是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呢？就是“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①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在论述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时又指出：“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时也指出：“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③这说明平衡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以及矛盾各方面力量对比关系适当、一致、均势所表现出来的矛盾的相对统一；不平衡则是各种矛盾及矛盾各方面力量对比关系的不适当、不一致、不均势所表现出来的矛盾的差别性、不统一性。

---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2、301页。

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12页。

矛盾发展的平衡与不平衡是相对与绝对的统一。平衡有反映事物相对静止状态的一面，不平衡有反映事物运动（显著变动）状态的一面。而一切事物的常住性是相对的，变动性是绝对的。平衡是有条件的、易变的，不平衡则是基本的。所以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恩格斯说："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①。毛泽东同志也说："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②他在论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国民经济的矛盾时，又多次强调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事物的发展是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平衡与不平衡的统一。这种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要求我们观察和处理问题，既不能离开平衡去讲不平衡，也不能把平衡绝对化。强调一个侧面，否定另一个侧面，都是片面的；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地反映事物的矛盾运动。

平衡与不平衡对于事物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只有平衡才能保持事物的相对稳定，这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也只有在平衡状态下，事物内部矛盾各方面才能很好地发生相互作用，使事物的量变得以充分展开，促进事物整体向前发展。自然界只有在保持生态平衡的条件下，各种生物才可能有相应的发展。人类社会只有在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条件下才能前进。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只有符合一定的比例关系，搞好综合平衡，才能稳步协调发展。相对平衡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重要的，应当充分肯定。但这种作用在不同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301页。

阶段性质是不同的。当事物处在量变阶段，在它自身的范围内还有广阔的发展余地的时候，保持平衡可以促进事物的发展，这时平衡的作用是积极的。但是，当事物的发展具备了一定的条件，要求突破自身的规定，向更高的阶段过渡的时候，保持原有的平衡就会阻碍事物的发展，这种平衡的作用就是消极的。这时只有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才有利于事物的进一步发展。矛盾发展的不平衡对事物的发展也有重要的作用。一般说来，在事物发展的量变过程中，不平衡状态可以加速事物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促进根本质变的到来。革命过程中根据地的不断扩大，战争中积小胜为大胜，国民经济计划中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平衡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形。当事物处在质变阶段时，只有经过不平衡状态才能使矛盾斗争加剧，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改变，破坏旧的统一体，产生新的统一体。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以及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这两种矛盾不平衡性的转化时指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正是表现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力量。"① 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不平衡就没有发展，只有经过不平衡才能把事物推到更新更高的发展阶段。

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方面是矛盾不平衡性的主要表现，是矛盾特殊性的两种重要情形。由于中国社会矛盾的突出的不平衡性，也由于不平衡状态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矛盾发展的平衡与不平衡的理论中着重论述了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他指出，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根本矛盾和非根本矛盾的不平衡；二是在一个由许多矛盾所组成的复杂的事物中存在着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不平衡；三是每一个矛盾存在着主要方面和非主要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页。

方面的不平衡。这样，毛泽东同志通过对矛盾发展不平衡性的分析，揭示了根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客观根据。他指出，根本矛盾是贯串过程的始终，决定过程的基本性质，非根本矛盾是为根本矛盾所规定，不一定贯穿过程始终，不影响过程的基本性质。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中都有它的根本矛盾，同时又包含着一些非根本矛盾。根本矛盾和非根本矛盾的变化也是不平衡的。例如，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的根本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一矛盾贯串整个民主革命过程的始终，规定着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性质。同时，民主革命过程中又包含着其他一系列的矛盾，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的矛盾；封建主义同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封建军阀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都是受根本矛盾规定和影响的。在整个民主革命过程中，由于根本矛盾和非根本矛盾变化发展的不平衡，使民主革命表现出不同的阶段。

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方面，说的是诸矛盾和矛盾诸方面在矛盾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实际问题时，对这一问题也是十分注意的。马克思在分析无产阶级和富有阶级这两个对立面时说：“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① 恩格斯在论述无产阶级的团结和实现远大目标时指出，必须“时刻记住主要的东西”。② 列宁把政治事变比作一根链条，曾多次指出：“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决不能你想抓哪个环节就故意挑哪个环节。”③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这些论述，实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70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649页。

上说明了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重要性。苏联三十年代哲学发展了这些思想，曾经提出过过程中的主导矛盾和矛盾的主导方面的问题。但是，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理论规定，也没有作为矛盾特殊性的特别重要情形明确提出来。毛泽东同志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分析中国革命的各种复杂矛盾问题时，根据不同时期各种矛盾的变化，特别是根据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日矛盾突出，并引起国际国内矛盾变化这一事实，指出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是矛盾特殊性的两种重要情形，都是矛盾力量不平衡性的重要表现。他说："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①这说明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产生的客观基础。

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作为矛盾特殊性，是指它们在矛盾总体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于其他的矛盾及矛盾其他方面。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起着领导的、决定性的作用的矛盾，这就是主要矛盾。其他处于次要和服从地位的矛盾是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要把握矛盾的总体，除了一般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还必须进一步研究在矛盾总体中哪个矛盾是主要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就可以带动全局，其他矛盾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了。不仅在众多的矛盾中有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区分，在每一对矛盾中，矛盾双方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相同的，也有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区别。主要方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页。

面是指在矛盾中处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的方面，次要方面则是处于被支配、被决定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的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因此，要正确地认识事物的性质，仅仅研究矛盾双方各自的特点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

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面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它们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当原来的主要矛盾解决了或者基本上解决了，其他矛盾就会突出起来，上升为主要矛盾。同样，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也是互相转化的。矛盾双方主次地位的转化，事物的根本性质就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同志根据矛盾双方主次地位转化以及主要方面处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的原理，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和实践、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几对矛盾的矛盾双方的作用和转化问题。他指出，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但是，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又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弄清这一原理，对于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使我们能自觉地按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关系，确定工作重点，做好工作，促进矛盾转化。

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理论，揭示了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主要的矛盾方面这种特殊性所决定的。因此，认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这两种情形，对于进一步分析矛盾特殊性，从而为我们正确地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毛泽东同志说："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

矛盾的正确的方法。”① 分析矛盾特殊性只有全力以赴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才能正确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只有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才能确定各个时期的工作重点，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右倾机会主义都不懂得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方面的理论，因而不能随着主要矛盾的转化实行革命策略的正确转变。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运用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理论，正确地确定各个时期的革命任务，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抓主要矛盾问题上，曾经出现过一些片面性，错误地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当作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否认了主要矛盾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完成以后的变化。这种片面性妨碍了我们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导致了“左”的错误。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和邓小平同志科学地总结了以往的历史经验，把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确定为党在新时期的工作重点或中心任务，同时正确地处理了矛盾主次关系，从而保证了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理论。

四、共性个性、相对绝对的关系是矛盾问题的精髓

毛泽东同志在阐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关系来概括整个矛盾学说，指出这“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②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295页。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之所以是矛盾问题的精髓，首先在于任何事物的矛盾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毛泽东同志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之中，并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是无条件的，因而共性也就是绝对性，个性是一切具有自己特点的具体矛盾。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所以是相对的。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既是互相联结的，又是互相转化的。他说："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①，无个性即无共性。共性作为矛盾的普遍存在，作为同类事物的共同性质，它是一般，它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个性也总是和共性相联系而存在。个性作为具体的事物它总是矛盾统一体的存在，作为具体的特性，它是某种共性的一部分，都不能离开共性而存在。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也是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统一。毛泽东同志说："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②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是互相联结的。所以，每一事物不仅包含着矛盾的普遍性，而且包含着特殊性，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这种统一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的。毛泽东同志指出："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3页。

② 同上，第310—311页。

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①因此，共性个性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是随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

其次，把握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是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关键。由于任何事物都是共性个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因此，“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②这就是说，研究任何事物的矛盾都必须联系它的共性来把握个性，联系它的个性来把握共性。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把握普遍性的本质，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也就不能把握事物运动发展的基本方向；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把握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不能认识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规律，也就不能理解矛盾和解决矛盾。只有联系个性去研究共性，才能使共性不致于变得空洞、抽象，使它的内容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也只有在共性指导下去研究个性，才能把握事物的深刻本质，它的规律和它运动发展的基本方向，也才能正确地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辩证法的宇宙观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如果不把握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就无法正确地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辩证法也就失去了它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意义。所以，不懂得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也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再次，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贯串于对立统一规律的全部内容之中，是深刻理解和正确应用对立统一规律的钥匙。对立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3页。

统一规律的每一原理，如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斗争性和斗争形式，都是讲的共性与个性、相对与绝对的关系。这一关系使对立统一规律各方面的原理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因此，理解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每一个原理，都必须联系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离开这种关系去孤立地理解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中的任何一个原理，都会导致片面性的错误。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不能理解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也就不能懂得辩证法。

共性个性、绝对相对辩证关系原理，是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根据这一原理，马列主义的真理是共性，中国革命的实践是个性，它要求我们既不能离开中国的特点去抽象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离开马列主义的指导去孤立地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而必须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就是说，只有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去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才能把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指导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也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共性个性关系的原理决定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搬用别国的模式，而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四节　矛盾分析方法是分析问题的根本方法

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矛盾法则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它既是客观世界的根本法则，也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法则。毛泽东同志把这一法则运用于党的实际工作，形成了系统的关于矛盾分析方法的理论。

一、辩证分析方法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

辩证法作为认识论就是要分析事物的矛盾。列宁曾经指出："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的发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这些过程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① 毛泽东同志发挥了列宁的这一思想，指出："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② 又说："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③ 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人们分析矛盾是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谓认识世界，就是分析矛盾；所谓改造世界，就是按照事物矛盾的不同性质，运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各种不同的矛盾。毛泽东同志借用我国传统的表达方式，把矛盾分析方法概括为"一分为二"、"两分法"。他指出："一分为二"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强调"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④

矛盾分析方法是最普遍最重要的方法。列宁在论述马克思运用矛盾分析方法，从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中，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及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时指出，矛盾分析方法也是"一般辩证法的阐述（以及研究）方法。"⑤ 毛泽东同志指出，

---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9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510页。

④ 毛泽东：《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红旗》杂志1977年第10期。

⑤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

矛盾分析方法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比如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党内存在着一种悲观主义思想，认为革命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这是因为有的同志“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①毛泽东同志具体地分析了当时各种矛盾的发展，从而得出了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很快就会到来，“星星之火”很快会发展成为“燎原”之势。事实上，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党和毛泽东同志始终坚持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正确地分析和处理各个时期的各种矛盾，从而引导革命取得胜利。

矛盾分析方法作为根本方法，它贯串在唯物辩证法的其他方法之中，唯物辩证法的其他方法都是矛盾分析法的展开，是从不同的侧面去分析和解决矛盾。比如对事物质与量的分析，肯定与否定的分析，本质和现象、内容和形式的分析等等，都是从不同的方面来分析和把握事物的矛盾。离开矛盾分析就不能正确把握事物的质与量的关系，不能对事物作出正确的肯定和否定，也就无法把握事物的本质。在工作中也只有坚持矛盾分析，才能正确地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指出，调查研究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通过调查和研究抓住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②，也就不能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所以，毛泽东同志始终把对立统一的观点作为分析和解决一切矛盾的根本出发点。矛盾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6页。

分析方法贯串在他的全部著作和讲话中，他的许多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矛盾分析方法的典范。

二、对一切事物都要具体分析

毛泽东同志把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联结的原理应用于观察问题、分析问题，首先肯定一切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他指出，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即都是正面和反面、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

坚持对一切事物进行分析，首先必须全面地看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①全面的看问题，最本质的就是要看到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不仅要看到它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不仅要看到它肯定的方面，也要看到它否定的方面。只有全面地看问题才能从总体上把握事物的矛盾，采取正确的处理方法，避免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的错误。

其次，必须按事物运动发展的层次进行深入的分析。毛泽东同志指出，分析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必须从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开始，进而分析运动形式的各个过程，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过程的各个阶段以及各个阶段的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分析矛盾的过程是一步步深入，一步步具体化的认识过程。这一过程是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的过程，因而通过这一系统的分析就能客观的、全面的、历史的、深入的把握事物的本质。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种系统的分析方法，其实质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它要求对任何问题都必须根据其所处的具体条件，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55页。

进行合乎客观实际的具体分析。

再次，对于一切事物进行分析还要看到它的转化。毛泽东同志指出，任何事物的两重性在一定条件下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①毛泽东同志从这一思想出发，提出了关于重视反面教员作用的思想。他说，一切坏人坏事都可以作反面教员。反面教员能教育人，使人分清是非，得到锻炼提高，避免再犯错误。他又指出，对一切问题都既要看到它的现状，又要看到它可能转化的具体条件，以此来建立我们的战略策略思想。我们在向阶级敌人和向自然界作斗争中，一方面要从本质上看，从长期看，从战略上看，我们能够胜利，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又要重视它，不能掉以轻心，要作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从这点上来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人对待一切斗争任务，都应该是这样，首先藐视它，“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钻进去，逐步地认识自然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然后就有可能掌握这些法则，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②

毛泽东同志把对立统一规律运用于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提出了领导工作要正视矛盾、揭露矛盾和解决矛盾的重要思想。他说：“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③

---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34页。

② 《关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红旗》杂志1977年第10期。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511页。

三、在两点中把握重点

对事物进行一分为二的具体分析，还必须注意两点和重点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把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原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形成了矛盾分析方法的重点论。重点论要求在对各种事物进行分析时，首先必须抓住它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这样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发展的主流，才能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他说："有重点才有政策，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①

抓重点是人们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最重要的方法。毛泽东同志指出，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是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他把这一方法应用于战争中，提出了"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②在战略战术上，他针对"左"倾教条主义的"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的军事平均主义，制定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正确原则。在对待人和事的看法上，他提出要分清主流和支流只有抓住主流才不致迷失方向。他说，对于我们的工作，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只有区分主次才不会混淆问题的性质，也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其次，必须把重点和非重点结合起来，不能离开两点去孤立地抓重点。重点和非重点是相比较而存在的，离开非重点，就无所谓重点。事物的性质和发展的主流，主要的是由矛盾的主要方

---

① 转引自1967年12月1日《北京日报》。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0页。

面所决定的，但非主要方面也制约和影响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思想方法和工作法时，一直强调要把重点和非重点结合起来，用重点带动非重点，以非重点促进重点。他指出，在工作中，要抓中心工作，同时又必须以其他工作相配合，才能搞好全局工作。他说："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①毛泽东同志把这种工作概括为"弹钢琴"的方法。他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②这就是既要抓住中心，又要搞好主次配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心工作和一般工作的关系的论述，发展了他在《矛盾论》中关于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面的关系的理论，说明了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面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这一思想要求我们在工作中，既要反对没有中心，"眉毛胡子一把抓"，又要反对只顾中心，忽视其他工作的单打一的倾向。

第三，必须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抓重点，搞好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2页。

主次配合，反映了现实存在的各种事物和工作的不同地位和作用的关系。但是事情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毛泽东同志根据重点和非重点转化的趋势，对事物发展可能变化的方向作出预见，提出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同时，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事物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的主要矛盾或矛盾主要方面所形成的主流，是一定时期的主要倾向，这是人们容易注意到的倾向，而被主要倾向所掩盖的非主要倾向，则往往容易被忽视。然而，主要倾向和非主要倾向的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事物的运动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我们在注意一种主要倾向时，不看到事物的发展变化，不注意被掩盖着的倾向，就不能很好地适应形势的变化，顺利地实现工作任务的转变，也不能及时防止不利倾向的出现。在我们党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曾多次出现过在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时忽略了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结果批判了右倾又出现了"左"倾。毛泽东同志总结党的这个历史经验提出，在反对一种主要的错误倾向的同时，必须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他说：在反对右倾时，要注意可能出"左"；反对"左"倾时，又要注意可能出右。就是说，既反对'左'，也反对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革命事业沿着正常的轨道进行。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是一项重要的领导艺术。在一切工作中，都必须注意一种倾向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对事物可能的发展趋势作出预见，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工作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思想原则得到了认真的贯彻。邓小平同志坚持辩证法的全面性，不搞"一刀切"，强调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他说："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又说："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有来自'左'的，有来自右的"，

"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①这样才能防止片面性，正确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顺利进行。

① 《邓小平文选》，第334、335、334页。

第六章　军事辩证法思想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实际斗争中的运用，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运用于军事领域，尤为集中和突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

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事物的共性和个性相互联结的原理，考察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由此而规定研究战争的根本方法。他注重研究战争的客观状况，又特别强调在既定的客观条件基础上，充分发挥根据和符合于客观规律的人的自觉能动性。他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对全局与局部等一系列军事理论中的哲学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他把军事理论与哲学思想融合在一起，水乳交融、相得益彰，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的光辉。

毛泽东同志是一位驰名中外的卓越的军事家和战略家，在他的军事辩证法思想的指引下，我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取得了不朽的军事业迹。

第一节　研究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必须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

毛泽东同志在研究战争问题时，首先提出了研究战争的方法

论。他认为，战争的情况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由此，研究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①

一、战争的情况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

战争规律是战争这一特定客观事物所固有的本质的或必然的联系，是构成战争的最基本的要素，如战争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自然地理等因素的内在联系。它贯穿于战争的始终，决定着战争的发展趋势。战争指导规律则是指导战争的人们对战争规律的认识和运用，是人们依据对战争的规律性认识采用的相应的主观指导原则或准则。

毛泽东同志把唯物辩证法创造性地运用于对战争的考察，提出战争是迅速流动的（或运动的、推移的）这个著名观点。他认为，随着战争的发展，规律也在向前发展，一成不变的规律是没有的。他说：“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② 他还把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原理具体地运用于研究战争和战争规律，科学地阐明了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而且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因为战争和其他事物一样，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结、共性个性的统一。把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

一般战争的规律是古今中外一切战争都固有的普遍地起作用的规律；一般的战争指导规律是适用于一切战争的普遍指导原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7页。

则。这些都是战争这个事物的共性。例如：所有战争的基本原则，都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是指“剥夺敌人的抵抗力”）；所有战争都是一定社会的阶级或集团现行政治（或政策）的继续；所有战争都要采取攻、防两种基本作战形式等等，这些是战争的一般规律。战争指导规律也是如此。如所有战争指导者都须“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所有战争中都通行“兵不厌诈”、“兵贵神速”等准则。当然，这些规律和指导规律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寓于特殊战争规律之中。

革命战争规律，是一切革命战争所固有的普遍起作用的规律。革命战争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正义性和进步性。它推动历史前进，因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要使革命战争取得胜利，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参加和支持，必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等项原则，同时也要采取灵活多变、不拘一格的作战方法。反革命战争也有其规律性，它靠欺骗和屠杀人民来实现。因此，它总是在战争中搞各种政治的和战略的伪装，千方百计把战争的真实目的掩盖起来。列宁深刻地揭露了这一点。他举出十八世纪的一位普鲁士君主的泄露天机的话：“如果我们的士兵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战，那连一次仗也不能打。”① 革命战争一般是后发制人，反革命战争则常常凭借其军事优势先发制人。革命军队是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反革命军队则相反；凡革命战争总是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而反革命战争常常夸大武器的作用。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是区别于一般革命战争而为中国革命战争固有的特殊规律。毛泽东同志说：“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

---

①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29卷，第46页。

质。”①就是说，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它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阶级力量对比等条件的不同，因而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革命战争的许多特点。

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又经过1925至1927年的大革命。由于政治发展不平衡和帝国主义采取了分裂剥削政策，形成了反革命势力的不统一，使反革命力量彼此抵销，革命力量有可趁之隙。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国工业的比重小，农村对城市的依赖性也小，农业经济自给自足；尽管敌人控制着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革命力量仍然有条件在广大山区和农村得到发展。由于中国幅员广大，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革命不愁无回旋余地。又由于经过1925至1927年的大革命，中国人民受到了一次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锻炼和影响，在很多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这些地区，革命容易首先发动，红色政权可以立足。

第二，是敌人的强大。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掌握了全国政权，又有世界反动派的援助，加上装备优越，物资雄厚，军队数量超过了任何一个历史时代，其常备军数量与幼小红军形成了天壤之别。

第三，是红军的弱小。红军是从一些游击队活动开始的，红色根据地分散而孤立。井冈山根据地开始时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全国较大的根据地，在五次反“围剿“之前最多时只有十五块，而中央红军在三次反“围剿”时期只有三四万人。

第四，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由于有党的领导，使中国革命战争能得到正确的指导；而由于土地革命，使红军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援助。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战争所概括的四个特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之后，又综合起来指出，第一、四两个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第二、三两个特点决定了红军不可能很快地发展和不能很快地取胜。“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

在这种特殊的联结中，中国革命战争的持久性发生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方针既不是有退无进的消极防御，又不是有进无退的冒险进攻，而是波浪式地逐步推进。中国革命战争的道路只能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中国革命战争的形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表现为包围与反包围的不断反复。

毛泽东同志在科学地揭示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时，又从方法论高度深刻地阐明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和战争的特殊规律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战争的一般规律不能全部包括和代替战争的特殊规律，因此，研究任何战争，应当着力于研究它的特殊规律，也就是“必须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又一方面，战争的特殊规律也不是凝固不变的，随着研究范围的不同，战争的发展和条件的变化，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又可以相互转化。在此时此地为特殊规律，到了彼时彼地则变为一般的规律，反之亦然。因此，要把战争特殊规律和战争一般规律有机地联系起来。比如，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同一般的革命战争规律相比较，它是特殊的，是产生于中国这个特殊的国度之中的。然而，它对于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以至于整个中国革命战争发展的各个阶段说，又具有普遍性，因而又是一般规律。毛泽东同志在考察战争时，正是以一般规律为指导，来分析特殊规律，又通过特殊规律来把握一般规律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是“在持久中战胜敌人”，而这个根本规律又是通过内战的主要形式——“围剿”与反“围

剿”、进攻与防御的长期反复这个特殊的战争形式表现出来。如果不具体揭示长期反复这个特殊性，就不能指导红军打胜仗。然而，“围剿”与反“围剿”、进攻与防御长期反复这个战争形式的特殊性，对于各次“围剿”与反“围剿”来说，又具有一般性、普遍性。

当然，尽管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因战争的发展变化而相互转化，但认识矛盾特殊性，总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基础。所以，毛泽东同志着重指出：研究任何战争，都应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进而把特殊和一般结合起来，才能正确认识战争，也才能打胜仗。

二、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和指导规律是变化和发展的

中国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特殊的环境里进行的，是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里的革命战争，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里进行的革命战争。然而，随着这个特殊环境和条件所发生的变化，它的规律和指导规律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从辩证法的观点看，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毛泽东同志说：“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①

中国革命战争，经历过四个战争时期，就是北伐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在这些不同的战争时期中，无论就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战争所经历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5页。

过程，战略方针的规定以及所采取的作战形式，等等，都表现了其自身所固有的差别。

以其中后三个时期（即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的时期）来说。从战争发生的条件及发展趋势看，尽管每一个革命战争时期都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都是既有困难条件，又有顺利条件，然而每一个战争时期其困难和顺利的程度都不相同，敌我双方的强弱状况也不相同，由此便决定了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不尽相同。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的结论是：可能战胜敌人，又不能很快战胜敌人。如弄得不好，还可能失败。这是对这次革命战争特点的清醒分析。原因在于：敌我力量的过分悬殊和党还处在幼年时期。为了避免失败，毛泽东同志又强调，除了要有各种客观的有利条件以外，还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到抗日战争时期，敌强我弱的总形势没有改变，但在局部上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由国内战争变成了民族战争，日本帝国主义成为当时的主要敌人。于是革命战争的发展趋势也随着发生某些变化。从日本帝国主义方面说，由于它是异族入侵，本身是孤立的，再加上国小兵少，这个弱点便暴露得更加明显。从抗日阵线方面说，由于中国国家大、人口多，中国抗日武装能够在广阔的土地上自由回旋。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正义战争，得到了世界上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都走向成熟。这样，中国方面的弱点又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弥补。所有这些，都不同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情况。所以毛泽东同志的结论是：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到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整个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变得更加有利于我和不利于敌，人民革命力量也已有了大的增长。在这个时期，他对战争发展前途的估计是：我军必胜，蒋军必败。他说：“蒋介石

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① 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论断的正确。

如果把这三个革命战争时期联系起来考察，敌人方面是循着下降的路线发展；我们这一方是循着上升的路线发展。愈到后来，我军取胜的把握愈益增大，而敌人则相反。

适应着每一次革命战争时期规律的不同，战争的指导规律，作战形式等等也有不同。纵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二十二年革命战争，前二十年基本上是战略防御，后两年则转为战略进攻。即使在战略防御阶段，战略方针也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几经变化。例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是游击战，到了后期，由于红军的力量有较大增长，能够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并且在指挥上和组织上也表现了某种程度的集中性和计划性，所以，由主要进行游击战变为主要是进行正规战。到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个敌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国主义。友军是过去的敌人国民党（它对我们仍然怀着敌意）。战场是在地域广大的华北。为了广泛地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我党又把正规军分散开执行游击任务，于是正规战又变成了游击战。以后又根据具体情况依次发展为运动战和阵地战。可见，一成不变的战略方针是没有的。

同样，战争形式也是变化发展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战争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反复。由于敌人的强大和红军的弱小，使得红军经过一次或几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只能消灭一部分敌人。紧接着，敌人重整旗鼓，又组织另一次“围剿”，仿佛是从终点又回到出发点，而红军又打破敌人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083页。

的第二次“围剿”。红军只有在长期地、反复地打破敌人的“围剿”之后，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当时说：“直到敌人变成弱小者，红军变成强大者那一天为止，这种形式是不会变化的”。当然，他又补充说，形式上的反复不等于内容的简单重复，因为战争和战斗的内容是每次不同的。

应当说，“围剿”与反“围剿”的长期反复，是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的环境和敌我力量过分悬殊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同时又与红军在国民党心脏地区存在这一点直接相关。当着红军远离敌人的心脏地区（转到陕北），形势就趋于缓和了。而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后，此种局面便完全被打破。

在抗日战争时期，战争形式变成敌我之间的几层包围与反包围。毛泽东同志曾经分析它至少有三重包围和反包围。这就是说，从整个抗日战争来看，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来看，以及从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作为一个整体，即把中国作为一个战争单位来看，均是如此。这是在一个幅员较大的国家里，在异民族入侵时，由于双方力量悬殊而产生的攻防运动的具体形式。这种战争形式是敌我力量间的犬牙交错。毛泽东同志称它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①。当然，这种战争形态的产生，又与抗日战争的若干特殊条件有关。例如同中国地区广大，敌人兵力不足这两点关系甚密。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采取运动战形式，由几支大的野战军兵团，实行迅速的分散和集中，大踏步前进与后退，在广阔的战区和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并在短时间内使敌我力量的差大大缩小，很快由战略防御发展为战略进攻。这又是和当时敌我力量发生的具体变化分不开的。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1页。

总之，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战争的历史行程，战略方针，作战形式等等，都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的。它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活生生的，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

三、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机械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论。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是机械论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的特点是：不承认产生战争的条件是历史的和具体的，不重视战争中人的能动因素，不懂得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的变化和发展，而是凭主观想象，企图探求出一种永恒不变的战争规律和适用于一切战争的战争指导规律。

机械论与辩证法是决然对立的。战争中的机械论同军事辩证法也是决然对立的。从古到今，凡机械论都受到辩证法的无情驳斥。孙子说，“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①这是以朴素辩证法批判机械论。历代兵家们所强调过的，“兵有常理，而无常势，水有常性，而无常形。”②“不拘常法，临事适变，从宜而行”，则是对朴素的军事辩证法传统的具体发挥。应当说，这些言论对于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然而，必须看到，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由于缺乏科学的历史观，不懂得生产方式的演变是战争发生变化的客观物质基础，因而对机械论的批判还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没有也不可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才能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作出深刻的批判。恩格斯指出，作战方式的改变，最终的根源在于经济，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技

① 《十一家注孙子》，第154页。

② 同上，第153页。

术的飞跃。列宁也说："随着军事技术的改进，巷战的方式方法也在发生变化"。① 斯大林在谈到战争形式的发展变化时又说："作战方式，战争形式，不是永远一样的。……成吉思汗时代作战的方式不同于拿破仑第三时代，二十世纪作战的方式不同于十九世纪。"② 所有这些论断，都是批判战争问题上机械论的有力武器。毛泽东同志继承了这些科学论断，结合批评在中国革命中产生的教条主义错误，不仅是从历史观上，而且着重从方法论上，批评了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毛泽东同志首先从辩证法宇宙观的高度指出了机械论的错误。在他看来，既然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运动、发展和变化，那末，战争这种现象也不例外。在这里，他具体地捉住了战争的运动、发展和变化的三个重要关节，就是时间、性质和地域。他说过，"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③ 十分明显，既然战争是运动、发展和变化的，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便也都是运动、发展和变化的。机械论者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想用千篇一律的公式来指导战争，就违背了唯物辩证法的起码要求。

其次，毛泽东同志又针对中国革命中的教条主义者所犯的错误，特别是他们照搬苏联内战时期的经验和重复北伐战争时期攻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9卷，第263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3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7页。

打大城市的经验，因而使中国革命战争屡遭挫败的事实，剖析了机械论的错误。

从时间说，苏联的内战发生于1918年到1920年，北伐战争发生在1925至1927年，都是处在革命高潮时期。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处境与这两个时期都不同。从国际上说，帝国主义国家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普遍地得到了恢复，从革命风暴时期转入到了相对和平的稳定时期。从国内说，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夺取了全国政权，成为了执政的党，建立起庞大的反动的国家机器。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整个革命形势急剧低落而不是什么“不断高涨”。从地域说，也发生了变化。俄国和中国虽都是大国，但俄国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却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性质说，也有所不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俄国已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而中国革命还停留在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历史阶段。由此可见，在这样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所发生的革命战争，不能不带有它自己的特殊性。机械论者不承认或不懂得战争的这些差别，因而不能不使自己弄出了许多错误。

最后，毛泽东同志还从总结中国革命战争发展的全过程，并从预见未来战争的特点方面批评了机械论的错误。

毛泽东同志在1952年间指出，中国人民的建军历史，已经走过了二十五年的长期路程，其革命经验之丰富，在国际上除苏联外，无与伦比。但在中国人民尚未获得全国胜利之前，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军事建设又尚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也就是处于装备的简单低劣，编制、制度的非正规性，缺乏严格的军事纪律和指挥的不集中、不统一及带游击性等等，这些在过去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正确的。接着，毛泽东同志运用发展和变化的观点考察了建国以后所面临的客观状况。他说，自从中国人民获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之后，这种客观情况已经起了基本

的变化，就是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阶段。为了实现这个转变，除了有相应的客观条件外，还要有不疲倦的主观努力。在这里，他着重用发展和变化的观点考察了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在1958年，当他讲到在未来战争中将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时，又一次反对了照抄照搬。在他看来，即使是被实践证明为成功的经验，也不能例外。他说过，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运用了十大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对我们探索未来战争的规律，是有益的启示，对批判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也是极锐利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同志对于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的批判，可以推广开来应用于对一切事物的观察。机械思维方法的本质，是否认事物的运动、发展和变化，因而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要克服机械论，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第二节　战争的客观规律和人的自觉能动性

战争是瞬息万变的，但它又是有规律的，是可以为人们所认识的。探索战争规律，实现对战争的正确指导，充分发挥全体将士的自觉能动性，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毛泽东同志科学地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战争的经验，把人的自觉性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紧密结合，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重要思想。

一、战争的客观规律是可以认识的

毛泽东同志在自己的军事著作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论证了战争规律的客观性及其认识的可能性。他断然肯定："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①

战争与其他事物相比，有它自己的特点。

第一，战争带有更大的流动性。毛泽东同志说："战争是迅速地向前流动的（或运动的，推移的）"②；"没有这种流动，就不会有这一方针的废止和另一方针的采用"。③

第二，战争有其不确实性。这不仅由于战争常常受天时、地利诸条件的影响和战略战术计划的经常改变，而且由于战争双方都要求对敌方保密而造成的在战争中特有的不确实性。因此，实现计划性于战争有较多的困难。

第三，战争有更大的偶然性。凡事物的发展趋势均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但不及战争中的偶然性这么明显。战争本身是双方互争优势和主动权的激烈竞赛，双方都竭力剥夺对方驾驭战争的能力，将对方抛入偶然性的深渊，使其举止失措，被动挨打；再则，自己方面的错觉或疏忽大意也往往被对方所利用。这样，就使战争运动有双重的偶然性。

第四，战争指挥员最容易受周围环境或部下情绪的影响，而指挥员自身的弱点又妨碍他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例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里所批评的那种专凭热情办事的鲁莽的军事家，就是常常由于"受敌人的欺骗，被敌人

---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8、463页。

③ 同上，第464页。

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所引诱或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所鼓动，从而以感情代政策，以至于吃了大亏。

战争虽然有上述特点，但这只是规律的特殊性问题，而不是规律之有无。就是说，唯物主义反映论也无例外地适用于战争。首先是流动性。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书里尖锐地批评了那种只见流动，不见固定的战争相对主义者。他以辩证的方法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流动：一种是数的流动，另一种是质的流动。前者流动于执行这一方针的各种不同的战争行动范围中，后者则是这一方针根本性质的流动。他认为，在一个战略阶段，尽管在战役战术上会有若干变化，但总的战略指导方针不会改变。这就构成了事物在一定时间内存在着相对的固定性，也就是“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①因而也就有可能制订出战争计划。其次，战争虽然有不确实性，比如常常发生这样一种情况：一场战争，似乎有四分之三的情况是在迷雾里，使得战争的指挥员难以决断。这种情况并不能否认战争有相对的确实性。毛泽东同志具体分析道：“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②这种相对的确实性，便是战争计划性的客观基础。再有，战争虽然受偶然因素影响较大，但不排除透过战争的偶然现象能把握其必然性。从一方面说，纯粹由偶然因素之影响而成功或失败，必不能长久维持；从另一方面说，正因为战争中充满偶然性，人们又可以充分利用一切机缘来夺取胜利。最后，战争之指挥员是易受周围环境、战情波动以及由此引起的部下和自身情绪的变化所左右，但这是可以通过主观努力尽量避免的。而且，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4页。

② 同上，第462页。

唯其如此，指挥员更需要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不靠一相情愿，不作鲁莽的军事家，而要严格地依照客观情况办事。

总之，尽管战争瞬息万变，时不我待，但战争规律总是可以认识的。重要的是战争指挥员在施用战术之前，如中国兵书所说，必先察情，察情不明，须“疑而叩实，察而后动”。不可放过“微隙所必乘”之时机，更要重视“攻心奇气”之方略。果若如此，便可做到“主不妄动，动必胜人；将不苟功，功必出众。”

生活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离开了对战争的实践经验之研究，一味地冥思苦想，自然不可能发觉战争奥妙之所在。毛泽东同志总是强调深入实际，依据战争所固有的特点，来认识和把握战争的规律。他说：“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①

总之，对于战争的客观规律与人的认识之相符合的问题，不应作机械的理解，而应作灵活的、有条件的、辩证的理解。毛泽东同志历来主张，只能要求人的主观认识与战争的客观实际大体符合，而不能要求做到绝对地、完全地符合。他说：“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少有的，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②

二、战争中人的自觉能动性

前面说过，战争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但究竟怎样去认识，以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5—166页。

② 同上，第163页。

及在认识之后怎样去作战，这就要靠人们发挥自己的自觉能动性。

战争中的人的自觉能动性是战争过程中人们的自觉活动和努力。它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或环节，一是能动地认识战争，二是能动地指导和实行战争。应当说，在战争中较之在日常事件中，人们的能动性表现得更加强烈。

无论是认识战争或实行战争，都要正确解决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同志十分强调从战争学习战争。他说，一切军事理论，是前人或后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研究这些血的教训固然重要，但还有一件事，就是从自己的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他又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①

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认识战争与实行战争，是知与行的统一。知是行的前提，行是知的归宿。两者紧密相关，缺一不可。但是，从认识的全过程来看，认识又始于实践。毛泽东同志说：“经验多的军人，假使他是虚心学习的，他摸熟了自己的部队（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又摸熟了敌人的部队（同样，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这样的军人指导战争或作战，就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这是在长时间内认识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的规律，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结果。”②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5页。

② 同上，第164—165页。

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战争中实践与认识相互关系的辩证说明。他在阐述战争中认识之两阶段的辩证联结时，十分赞赏孙子说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话。他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①

毛泽东同志在强调了战争中自觉能动性的重要之后，接着又对战争中人的认识这一环节作了详尽的分析。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他指出，在战争中，人的认识是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不断深化过程。通过这个分析，深刻地揭示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

他说，战争中的认识是从接触战争的实践开始。“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②这是解决战争中主客观矛盾的根本途径。要熟悉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就要进行实地调查，这种调查要力求全面和客观。要捉住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而不应该是残缺不全的片断；这些要素应是贯彻于战争双方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既敢于承认敌人的长处，又敢于承认自己的短处。既看到临时起作用的因素，又看到长远起作用的因素。总之，明于知己，暗于知彼；或明于知彼，暗于知己都不能获得正确认识。只有知彼知己，方能百战百胜。

对于战争中人的认识的辩证运动，毛泽东同志曾有如下一段表述。他说：“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6页。

② 同上，第162页。

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的情况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①这一论述用极其精炼的语言说明了以实践为基础，认识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发展的能动的飞跃过程。这是一个认识从低级向高级逐步深化的过程。

战争中感性材料的获得借助于侦察。所谓侦察，就是要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毛泽东同志强调说，在搜集和分析这些材料时，不凭主观，不存成见，要把有关战争的全部要素，无论是主要的、次要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统统估计在内。例如，要足够地估计敌人的整个力量，不可夸大敌人过去失败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估计到敌人内部的矛盾，财政困难，过去失败的影响等等。对自己方面，不可夸大过去胜利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足够地估计到过去胜利的影响。这正是唯物辩证法所要求的真理的全面性。粗枝大叶，一厢情愿，鲁莽和蛮干都须坚决反对。因为这是战争中的主观主义和唯心论，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气味。

战争中的认识运动，不仅表现于感性认识必然要上升为理性认识，即在对侦察所得的材料进行分析与综合的基础上，构成判断、决心与计划，而且表现于将这些判断、决心与计划拿到客观战争实践中去检验。这是从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的认识过程的又一次飞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战争的认识是否是真理，必须拿到战争实践中去检验。毛泽东同志说：“认识情况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3—164页。

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①毛泽东同志曾举例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第四次反“围剿”时，原计划攻打南丰，但南丰不克，毅然采取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②这是在战争过程中部分改变计划之适例。在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同志又总是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随时改变自己的战略计划。如在淮海战役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选择歼击目标时，他最初决定歼击邱清泉、李弥兵团，后又考虑歼击李延年兵团，最后他纵观战争全局，采纳了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建议，决定歼击黄维兵团，使战役的决心更加符合战场的实际情况，于是取得了胜利。

总之，从战争的发生，计划的制订，到计划的执行，再到执行过程的修改，一直到战争终止，这是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其第一阶段，即军事计划的形成阶段，是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从事物表面的外部联系上升为事物的本质、全体和内部联系。其第二阶段，即执行军事计划的阶段，是使计划在战争的客观实践中经受检验，或者说是以这种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这仍然是认识过程的继续。这两个阶段的结合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全部内容。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反复地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4页。

② 同上，第205页。

阐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观点是实践的观点。人的一切认识都必须从实际出发。把这个观点应用于战争就是依据战争实际情况制订出符合实际的战略方针，另一方面，又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相应地改变自己的方针，用他的话说是修改那些不适用的，补充那些不完善的，使理论、计划、方针、策略同战争实践保持密切的联系，使人们主观认识能够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这样，人们的认识象源头活水一样，随着实践的向前发展而继续发展，长流不息，奔泻不止。

三、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高度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

在战争中，如同在一切实际工作中一样，只有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然而，这并不是说，人们只是客观规律的奴隶，只能听任客观规律去摆布自己的命运。恰恰相反，人们只要掌握了战争规律，便可以驾驭它和支配它，成为战争的主人。

战争中的任何自觉能动性的发挥都离不开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也不能违反由这些条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而形成的战争发展规律。离开客观条件的幻想和蔑视客观规律的蛮干，对指导战争百害而无一利。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里侧重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他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着顺利条件和困难条件，这两种条件的存在，构筑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舞台。由于顺利条件的存在，红军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又由于困难条件的存在，红军又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敌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陈独秀，只看见困难条件，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一窍不通，把革命推到遥远的未来，甚至要取消革命，于是变成

了托陈取消派；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李立三则又只看见顺利条件，无视中国革命战争的持久性，幻想在一个早上使敌人通通给自己跪倒在地上，结果也碰了壁。这二者都深刻说明了尊重客观规律的重要。

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是建立在战争客观规律基础之上的，但它自身有特定的内容。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在战争实践中通过自觉的努力来运用战争规律；二是人们在战争过程中，在不违背客观规律要求的前提下和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可以改变已有的不利条件和创造新的有利条件。毛泽东同志说："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①

应当指出，尊重战争的客观规律不是抹煞或限制人们的自觉能动性；相反，人们愈是研究战争规律，愈是使自己的行动符合于客观规律，也愈能在战争实践中获得成功。毛泽东同志用了舞台和演员这样形象化的比喻，生动地说明了战争客观规律和人的自觉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要正确地发挥战争中人的自觉能动性，应避免或防止唯心论和机械论两种偏向。在我国十年内战时期，王明等人先后犯过这两种错误。开始时，他把敌人对红军的某一次"围剿"当成了"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这是主观主义和唯心论；而当国民党采取新的军事原则对付红军时，王明路线的推行者仍然沿用老办法去对付敌人，对敌人采用的这些反动的新原则视若无睹，这又是机械论。这两种错误，都违反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破坏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未能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446页。

充分发挥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

四、兵民是胜利之本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变革的决定力量。同样，人民群众对战争的胜败也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战争中，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除了战争的正确指导方针和指挥员的指挥艺术外，归根结底在于充分发挥军队和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毛泽东同志依据人民群众是进行战争的主要力量的观点，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科学论断，这是他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

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战争，是人民群众起来自己解放自己的伟大事业，它必须有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才能实现。马克思说："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①列宁也说，革命战争如果真正是由被压迫劳动群众参加的，是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的，这种革命战争就会唤起创造奇迹的毅力和才能。②毛泽东同志继承和发挥了这些重要思想，进一步从理论上肯定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明确指出：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他说："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说来，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点。"③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又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④在毛泽东同志看来，革命战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3页。

② 参看《列宁选集》第4卷，第9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0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8页。

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这是因为，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已经证明，人民军队依靠了人民，就会如鱼得水；反之，就会一事无成。比如，在解放战争时期，仅就著名的淮海战役来看，广大人民群众不仅积极参军参战，而且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也给予极大的支援。据不完全统计，在华北、华东和中原三大解放区，共动员担架73900付，大小车410900辆，挑子42400付，牲畜6300头，船13630只，汽车250辆，运送粮食5亿7千万斤。这些粮食的运输，如果用小车装载，每车以200斤计，可以从南京到北京排成五行。陈毅同志形象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如果离开了这种人力、物力的支援，要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列宁说："只有武装的人民才是人民自由的真正支柱。"①毛泽东同志继承了这一重要观点。他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对这个观点作出了进一步发挥。他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对于战争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又深刻地阐明了人民军队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因此，"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②他还说，这支军队之所以有力量，在于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是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有一往无前的精神，能打垮任何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征服。当然，要进行人民战争，光有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

---

① 《列宁军事文选》，第1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975页。

人民群众作基础。于是，他又说：“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象一个独臂将军”。①这说明，人民群众是进行人民战争的力量的源泉。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兵民是胜利之本，也包括在人和武器的关系中，确认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对任何战争来说，无论过去或现在，人和武器总是形成战斗力的基本要素。在对人和武器的关系及其作用的看法上，有两种错误的认识：一种是唯武器论，片面夸大武器的作用，认为武器的好坏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另一种是唯意志论，片面地夸大人的精神作用，认为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人的精神和意志。毛泽东同志在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用全面真理的观点反对了片面真理，用唯物辩证法反对了上述的各执一端的形而上学。他明确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②这一论断精辟地阐明了人和物的辩证关系，肯定了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

承认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建立在辩证唯物论观点基础之上的。人首先是一种物质因素。要行军打仗，必须有好的体力。但是，人又不同于一般的物，人有思想、意志、感情等精神因素，人可以驾驭和使用其他的物。所以，人能制造武器，巧妙地使用武器，发挥武器的最大效力，从而能动地夺取战争的胜利。从这点上说，人是决定的因素。当然必须承认，武器也是战争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没有武器固然不行，没有好的武器也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7页。

会大大减杀自己的优势，即使取胜，也必定有大的伤亡。尤其是随着现代科学的成就应用于军事，使武器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日益增大。但无论如何，武器和人相比，人是第一位的决定因素，武器则是第二位的被人使用的因素。不管新式武器怎样进步，威力如何巨大，归根到底，还是由人来发明、制造和使用的。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是战争的决定因素的观点，从根本上坚持和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变革的决定力量的原理。

坚持兵民是胜利之本，还表现在战争中要走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认为，只有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才能打败强大的敌人，夺取战争的胜利。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参加战争和支援战争的热忱，就要使他们认识革命战争的目的和意义。他在《论持久战》里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① 从这一思想出发，他主张，人民军队要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是自己的唯一宗旨，要尊重士兵，尊重人民群众，用进步的政治精神去动员全国军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

毛泽东同志的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也表现在人民军队的建设方面。他强调指出，在军队内部要实行官兵一致，在军队外部要实行军民一致和军政一致。只有这样，才能广泛地调动全体军民的积极性，使他们同仇敌忾、患难与共，充分地发挥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的威力。他还指出，在军队建设上，要实行三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用以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8页。

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这三大目的。为了能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的人民军队，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一整套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原则。由于依靠群众和团结士兵进行人民战争，使人民军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总之，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中心是要依靠群众。这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和群众路线在战争问题上的生动体现，也是在战争中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具体表现。毛泽东同志反复地指出，只要相信和依靠群众，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够战胜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①这是已被历史事实完全证明了的精辟论断。

第三节　战略学和战术学中的唯物辩证法诸范畴

战略学是研究战争之总体规律的科学。

战术学是研究战争之局部规律的科学。

毛泽东同志在研究战略学、战术学及其相互关系时，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特别是其中关于矛盾对立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相互规定、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原理，对于战争中的全局与局部、进攻与防御、主动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5页。

与被动、直线与曲线等等的军事辩证法范畴，作了精湛的论述。在论述这些范畴时，也批判地吸收了中国传统军事哲学中的某些有益内容。毛泽东同志对战略学和战术学中唯物辩证法范畴的研究，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的内容，而且对于指导实际工作也有重要意义。

一、全局与局部

毛泽东同志认为，战争指挥员首先要有战略头脑，掌握战略全局。他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整体与部分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见解，对战略和战役、战术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深刻地阐述了全局与局部的辩证法。

什么是战争的全局，什么又是战争的局部呢？毛泽东同志说：凡研究战争的总体，即研究战争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反之，凡是研究战争的一个方面和一个阶段状况的，则是战争的局部。

战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战争的某一方面和某一阶段是它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全局是战争的总体，局部是构成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全局总是由若干局部构成的。不过这种构成不是机械相加，而是有机结合。犹如一个人的身体是一个整体一样，这个整体是由头部、四肢、体腔、五脏等等部分构成的。身体的每一部分又是由神经、血液、皮肉等等为纽带牢牢地固定在身体这个有机整体上的。其中，任何一部分都不能离开有机整体而独立存在。同样，战争中的局部也不能离开战争的全局而独立存在。

全局和局部的界限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相对的和可变动的，它随着观察和处理问题范围的变化而变化。一个全国范围的战争是战争，相对于一个省或一个地区而言，是战争的局部；

如果把世界范围的战争作为战争的全局，这一国的战争就变成战争的局部了。反过来，一个省或一个地区，也可以是战争的全局，那又是相对于一个县或一个乡而言的；如果相对于全国范围的战争而言，它又是战争的局部了。总之，由于事物范围的极为广大和变动不居，在一定场合为全局性的东西，在另一场合则变为局部的东西。

在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上，首先是全局高于局部，局部隶属于全局。毛泽东同志批判了那种毫无战略头脑，只企求以战役、战斗的胜利来代替战略上正确方针的观点。他强调指出，战略指导者，最要紧的是要有战略头脑，要时刻把注意力的重心摆在照顾战争全局上面。“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① 只有善于通观全局，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局部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使战役战术服从于战略的要求；也只有在服从于总的战略意图的前提下，才会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为争取全局胜利作出贡献。毛泽东同志还指出，一个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某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的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阶段。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缺乏战略眼光的人，在一步棋走出以后尚不知下一步之所措，常使自己处于被动。在红军长征时期，张国焘企图在毫无革命战争影响和缺乏群众基础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而遭到失败，就是丧失了战略头脑的实例。

虽然局部隶属于全局，但局部又可反过来影响全局，对全局起某种积极的或消极的反作用。毛泽东同志认为，这种反作用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在战争中某一局部被破坏了，对全局不起重大影响。其原因是该局部并不是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环节。二是多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9页。

数局部破坏了，往往使整个战局起了变化。这是由于局部积累多了，上升为全局，由量变引起了质变。三是某一局部破坏了，引起整个战局的变化。这是因为这个局部如同列宁所说，是链条上的中心环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凡尔登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我国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对转换全局起了关键性作用。这些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局部。

毛泽东同志指出，所谓抓住对全局有重大影响的局部，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而是依据实际情况，对事物作出具体分析。例如，他说，作战时选择突击方向和突击点，要按照当前的敌情、地形和自己兵力的情况去规定。

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用肉眼是观察不到的，它只有在通晓局部的基础上，将各个局部的位置及相互关系连贯起来加以思索，才能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全局与局部不仅有整体与部分之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有高级与低级之分，本质与现象之分，理性与感性之分。

毛泽东同志为我们树立了从全局出发、重视有决定意义的局部，正确处理战争的全局和局部关系的光辉榜样。在中国革命的每一战争时期和每一次大的战役中，他都胸怀全局，深谋远虑，指挥全体军民与敌人战斗，夺取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比如，毛泽东同志亲自部署和指挥的淮海战役，是一次伟大的战略决战。在制定作战计划时，他把“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作为战役全局的根本方针。在战略部署上，基于全国战场的总形势，确定：一是不使东北敌人入关，二是不使华北敌人西窜或南逃，三是不使华东和中原敌人相互配合，并且力争对这些敌人就地歼灭。同时决定这次战役应由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两支部队参加，并及时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统筹华东、中原及冀鲁豫地区前后方的一切事宜。为了同平津战役相配合，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后，又命令前线部队在两周内不对被包围于永

城东北地区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攻击，借此机会使部队休整了二十天。同样，战役的发展也是一环套一环。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我军首歼黄伯韬兵团，造成关门打狗之势。当战役第二阶段消灭黄维兵团时，总前委采取“吃一个（黄维）”、“挟一个（杜聿明）”、“看一个（李延年、刘汝明）”的方针。总之，在战役进行到某一阶段时，总要为下一个阶段创造有利的战机。在整个淮海战役的部署和实施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是着力于最吃紧的几个问题：照顾兵团和部队的组成；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照顾我方和敌方的全部活动；照顾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由于他全局在胸，又有高超的指挥艺术，因而收到了全歼敌南线主力55万5千余人的辉煌战果。连同辽沈、平津两战役，共歼敌154万余人。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为我军横渡长江，直捣南京，解放全中国，奠定了胜利基础。

毛泽东同志阐述的全局与局部的辩证关系，对做好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具有指导意义。它告诉人们，无论做什么工作，既要树立全局观念，一切从全局出发，又要在胸怀全局的前提下，善于统筹安排，照顾局部。而对局部的这种安排和照顾，不是平均用力，同等对待，而应有轻有重，有主有次。

二、进攻与防御

进攻与防御是战争中的一对重要矛盾。进攻，是战争之一方对另一方采取主动出击的形式，是为消灭敌人和攻占重要地域而实施的战斗行动的一种类型；防御，是一方对另一方采取据守的态势，是为抗击对方优势兵力的进攻，防守某个地段、掩护某个方向以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种战斗形式。

进攻与防御作为基本的战斗形式，贯穿于战争的始终，这是由战争的目的决定的。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古代的兵士，一手持矛、一手拿盾，矛是进攻武器，为了消灭敌人；盾是防御武器，为了保存自己。现代战争中使用的坦克，既能防御、又能进攻，是把防御和进攻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新式武器。毛泽东同志说："进攻，是直接为了消灭敌人的，同时也是为了保存自己，因为如不消灭敌人，则自己将被消灭。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退却，属于防御一类，是防御的继续；而追击，则是进攻的继续。应该指出：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①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断，把"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目的同进攻、防御这两种基本的战斗形式辩证地统一起来了。

毛泽东同志从战争的目的出发，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实际，详尽地考察了进攻和防御的辩证关系。特别是他依据事物矛盾双方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原理，着重论述和发挥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他抛弃了以往那种认为坚持防御就不能有进攻的形而上学陈腐公式，代之以防御中的进攻和进攻中的防御的新公式，使进攻和防御互相结合，互相渗透。他针对中国教条主义者机械搬用马克思关于"武装起义之后，一刻也不应停止进攻"的论述，对本本主义思想方法的本质作了极深刻的剖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的话是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是指起义的群众不要让反动统治者得到喘息和恢复政权的机会，不要满足于已有胜利和放松对敌人的进攻。但这决不是说，在敌我双方已处于军事对抗中，甚至在敌人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去一味地发动进攻。毛泽东同志还详细地介绍了齐鲁长勺之战，把这看作是弱军采取积极防御方针战胜强军的典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0页。

型。

就战争的总体看，进攻是决定战争命运的主要手段。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进攻是主要的和基本的战斗形式。又说："战争实际中，虽有许多时候以防御为主，而在其余时候以进攻为主，然而通战争的全体来看，进攻仍然是主要的。"① 然而，从辩证法的观点看，进攻又是有条件的，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任意发动的。在象中国革命战争这样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采取积极防御方针，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坚持这一方针，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是完全正确的。积极防御不是反对进攻，而是在防御的形式里包含了进攻的内容。就是不但在战役战斗中包含了进攻，而且是尔后总的进攻的前奏。采取这种战法的好处是：第一是有理，弱小一方在强敌进攻面前，首先退让一步，使全国以至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他们打仗是有理的，是敌方首先发动进攻而不是相反。这样，就能广泛地动员人民参加正义战争，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第二是有利。有计划地诱敌深入，并使自己主力相应集中，便于发现敌人之弱点，选择有利时机与战场，迫使敌人就范。同时，也可以扬己之长，避己之短。第三，是能有效地把敌人抛入被动局面。敌人初战而胜，洋洋自得，不可一世，继则兵力分散，背上包袱，由主动变为被动。待其弱点暴露后，士气低落，疲劳沮丧，处处挨打。正是鉴于这几个方面理由，毛泽东同志说："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② 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龙源口战斗，黄安大捷，平型关战斗，陕北保卫战等等，都是以积极防御方针待机破敌，取得胜利的实例。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7页。

从一个发展过程看，进攻与防御，前进和后退，两者相互联结，不可截然分开。它们互为存在前提，又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例如白军对红军“围剿”是进攻，红军对白军反“围剿”是防御。红军打破白军“围剿”是进攻，白军“围剿”被打破是防御。白军重振旗鼓对红军再一次“围剿”，又由攻中之防转化为进攻。红军打破白军的再“围剿”，又是防御中的进攻。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就是这样与敌人反复较量，反复斗争，攻防形式不断交替以至达到攻防矛盾之解决。因此，毛泽东同志说，从军事上看，无论说进攻在防御之后，还是进攻在防御之前都可以，关键在于打破“围剿”。

毛泽东同志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体现了防御与进攻的辩证关系。进攻和防御作为战争中的一对矛盾，两者既互相对立、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系，互相依存。没有进攻的一方，就不会有防御的一方；没有防御的一方，也就没有进攻的一方。在战争实践中，进攻和防御总是交替使用或同时并用的。比如，辽沈战役从整体上看是一次进攻战，但为了保障主力攻克锦州之敌，同时部署的“塔山阻击战”和“黑山阻击战”，就是有名的防御战。而后者也是辽沈战役的有机组成部分。实际的情况是，参战双方为了达到自己的预期目的，总是依据战争的实际情况，不是以进攻克服对方的防御，就是以防御抗击对方的进攻，这种进攻和防御的反复，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之中。毛泽东同志说：“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① 进攻和防御又是互相渗透的。任何进攻中都包含有防御，任何防御中也包含有进攻，这叫做攻中有防，防中有攻，攻防结合。比如，一支军队在进攻时，必定有一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1页。

个主攻方向。在向某一主要方向进攻时，对自己的侧翼方向、交通线和后方基地等要加以防御，免得被敌人趁机来迂回、包剿和消灭。又比如，一支军队在防御时，不是防御到底，而是在有利的时机、有利的地点及时组织进攻，防中有攻，易防为攻。战争实践证明，凡是用辩证的观点把攻和防结合起来指导战争，就可以多打胜仗；反之，就要受挫折，打败仗。

战争中的教条主义者们使用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根本不懂得进攻和防御的辩证法，他们把进攻和防御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要么是消极防御，要么是冒险进攻，前者是军事保守主义，后者是军事冒险主义，都是错误的。例如，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在错误的军事路线的引导下，先是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冒险地向强敌发动攻势，失利后转为保守和逃跑，一味被动挨打，是把进攻和防御割裂的最坏的典型。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指出：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是否认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是包含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并且说，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

三、主动与被动

在战争中，人的自觉活动和努力集中地表现在双方都要争夺军队行动的自由权即主动权。如果丧失了行动的自由权，军队便会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毛泽东同志深刻地阐述了争取主动权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说，在战争中，最要紧的是争取战略的主动权。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也就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和被打败的危险。① 他还

说："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②事实上，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既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以劣势装备的革命军队打败优势装备的反革命军队的历史，也是不断地争取战略主动权，化被动为主动的历史。

争取战争中的主动权，依赖于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指导能力。首先，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强军和弱军打，强军处于优势，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然而，强与弱之分又是相对的。强军不是一切都强，而是强中有弱，实中有虚，优中有劣；弱军也不是一切都弱，而是弱中有强，虚中有实，劣中有优。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指出：日军虽强，但有三个弱点：兵力不足、异国作战、指挥笨拙；我军虽弱，又有三个优点，地广人多，得道多助，指挥灵活。因此，敌是相对的强，我是相对的弱；敌是相对的优势，我是相对的劣势。其次，还要看主观指导能力。优势的一方指导失误，劣势的一方指导得法，常常使战争双方强弱易位。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这篇光辉著作中，曾举出韩信破赵之战和苏联内战等中外历史上的十个战例，生动地说明了居于劣势的一方，只要善于指导，善于用兵，指挥艺术高出对方一筹，就能化劣势为优势，弱变为强，被动变成主动。由此可见，应当把战争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指导能力辩证地联结在一起。不承认前者，会变成拼命主义和冒险主义，是军事学中的唯心论；只承认前者而不承认后者，又会变成逃跑主义和失败主义，是军事学中的机械论。

要取得战争中的主动权，须有一支强大而有活力的军队。要

---

① 参看：《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7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7—458页。

做到这一点，一是要采取积极防御方针，不使自己的兵力作无谓的消耗；二是要善于集中兵力，在局部范围先取得胜利。毛泽东同志说："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① 他还说，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能改变进退形势，二能改变攻守形势，三能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所以，这种敌我双方在力量对比方面矛盾的转化，基本上靠集中兵力这一招。最后，他还深刻地阐明了打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之间的关系。他说："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② 红军打好歼灭战主要靠集中兵力。他说："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③

除了要集结大量而有活力的军队外，毛泽东同志也指出，还要处理好全局与局部以及与之有关的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进攻与防御，人与地等军事辩证法诸范畴关系。例如，当我们在全局上处于被动时，要力争局部主动；在内线作战处于不利地位时，打到外线去；在战略上持久时，在战术上要速决；在总体上防御时，在部分上要取进攻之势；在存人与存地发生矛盾时，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以歼灭敌人。这一切都体现了辩证法中所说的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原理，发挥人的主动性，可以改变战争中不利的形势，达到"化敌为弱、变我为强"的目的。

毛泽东同志还详尽地阐述了战争中计划性与灵活性，认为它们在争取战略主动权中有特殊作用。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4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0页。

③ 同上，第221页。

他对战争中的计划性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认为，在战争行动之先，需权衡各方面的条件，经过周密考虑，制订出详尽的计划，并做好战前准备工作。还要依据对战争全局的了解而预先规定展开战争的具体步骤。毛泽东同志说："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①。至于"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则已成为军事指挥员们所牢记的至理名言。毛泽东同志还更加重视战争中的灵活性，并把战争中的灵活性归结一个"妙"字。他说："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②他还说："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做这件事需要极大的主观能力"，③这也是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的要正确地"审时度势"。所谓审时，就是能当其时，不失时机；所谓度势，就是正确地掌握力量对比，看清形势（包括敌势、我势与地势）。红军在长征前期和中期的情况变化，能充分说明灵活处置的重要性。长征开始时，红军本应利用主观能力的活跃去摆脱被动局面，争取主动局面。但占据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者却采取仓促起程、大规模搬家的错误做法，由拼命主义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其结果是腹背受敌，处处挨打。待至遵义会议上撤换了错误的军事领导者之后，毛泽东同志便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尽管这时红军力量比长征开始时少得多，但经过回师遵义、四渡赤水等战役，很快变被动为主动，屡战屡胜，保证了长征的胜利。

战争中计划性与灵活性是相互关联的。战争中的计划性，应包括灵活机动的因素在内。反过来，灵活性也是执行战争计划中

---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2页。

③ 同上，第461页。

的灵活性，而不是毫无计划的蛮干。计划性与灵活性正象一般事物中绝对和相对的辩证统一那样，也是固定性和非固定性的统一。例如，当毛泽东同志讲到要有计划地消灭敌人时，同时又指出，战争的计划很难完全和固定，因为战争是迅速运动或流动的①。当他强调要灵活地用兵时又说，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②。

为了夺取战争中的主动权，毛泽东同志还强调要利用“错觉和不意”这一因素。毛泽东同志说：“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③在抗日战争中，他指出，必须依靠优越的民众条件，封锁消息，采取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以便有效地使敌陷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毛泽东同志亲自部署的“莱芜战役”，以及“青化砭战役”、“羊马河战役”和“蟠龙战役”，都是制造假象和出其不意的极好例证。

比如，在1947年1至2月间的“莱芜战役”中，蒋介石判断我华东野战军经过苏北、鲁南战役连续作战，又“伤亡重大，不堪再战”，对我轻敌。但当侦悉到我华东野战军集结于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地区时，又误以为我必全力固守。于是制订了一个以歼灭我华东野战军主力为目标的“鲁西南会战计划”。他调集陇海、胶济、津浦三线上的兵力，共集中了23个整编师（相当于军）53个旅，共计31万余人。而我华东野战军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下，采取了孙子所说“示形”方法，先把重兵集中于临沂，摆出决战架势，诱敌上钩。当蒋军南线向我密集靠拢之

① 参看《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3页。

② 同上，第46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9页。

际，我军主力在有利群众条件下，来一个金蝉脱壳，远离敌南线主力，转兵北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在北面的李仙洲兵团。结果对南线敌人是明实暗虚，对北线敌人是以实击虚。最后在莱芜城下，经三昼夜激战，彻底干净地消灭了敌正规军一个指挥部，两个军，7个师，共7万余人。

主动性、计划性、灵活性，以及利用错觉与不意，都是战争中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具体表现。这一切都说明，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人的自觉能动性有着广阔的活动余地。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每个红军指挥员都要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驶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

四、直线与曲线

直线和曲线，或称一字形和之字形，是反映战争发展过程或轨道的一对范畴。

事物的发展过程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辩证统一，它的表现形式是波浪式发展或螺旋式上升。列宁在《哲学笔记》里讲到辩证法的要素时，曾举出“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的某些特征”和“彷彿是向旧东西的复归”（即否定之否定），把这些作为事物发展的重要规律。他把这一规律应用于广泛的方面。他说：革命道路不会象彼得堡的涅瓦大街那样平坦而笔直。还说：如果有那么一个革命者，指望一帆风顺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那我可以说，这样的革命者，这样的社会主义者是一个破钱也不值的。①毛泽东同志继承了这一科学论点，并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发挥。他历来强调，波浪式前进是事物自身固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他说过：我们做工作都是由点到面，由小到大，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第406页。

是波浪式前进，不是直线上升。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过程中，他特别注重把这条规律运用于军事，科学地揭示出战争运动中的一字形和之字形相统一，是战争发展的规律。他又应用这一规律成功地指导了中国革命战争。

毛泽东同志科学地阐明了战争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辩证关系问题。

就一般意义而言，战争的运动同其他事物的运动一样，是沿着曲线前进的，是曲折性与前进性的辩证统一。毛泽东同志在批判直线论时说："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①

就其特殊意义而言，战争运动的曲折性还有其独特原因：一则，战争的发展是一种合力。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二则，战争双方都强烈地表现着自己的自觉能动性。毛泽东同志说：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就要发挥其能动性。因此，战争中常常有这种情况，奋战双方为了贯彻各自的政治目的，其战略方针就各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如一方要持久，另一方则要速决；一方要打阵地战，另一方偏打运动战和游击战，等等。可是，战争历程不可能由其中任何一方的意志所决定，而是组成一股合力，违背双方意志而向第三个方向运动，这就注定了军事运动特有的曲折性。而且，双方之中任何一方每增加一些新的力量，或每采取一项新的部署，都会使战争发展的方向重新发生某种变化。这样，在战争行程中，力量的消长起伏，彼此交错，是常有的事。特别是在广阔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更是如此。

---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0页。

应当说，在弱者抵抗强者时，承认军事运动的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逼迫敌人走“之”字形，意义十分重大。它告诉人们：要有战胜强敌的信念，要敢于斗争，但又不要一味追求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

按照辩证法的肯定否定规律，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即表现为它的不可逆性。由于革命力量是新生的事物，而新生事物总是不可战胜的。新生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尽管会有某些曲折，但就其根本的趋势而言，它是不会倒退的，它总是由低级向高级，沿着上升的道路前进。革命战争也是如此，例如，在十年内战时期，尽管敌军对红军“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甚至包括了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中央根据地全部丧失那样的曲折，然而这也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失败，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任何敌人都改变不了的。

事物发展的曲折性即螺旋式上升，往往表现为它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性”。毛泽东同志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中的这种状况。他说，敌人把红军看作异物，一出现就想把它捕获，组织一次次的“围剿”；但是，由于红军所进行的是革命战争，是正义战争，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拥护，所以能不断地粉碎敌人的“围剿”，发展壮大自己。“围剿”与反“围剿”的长期反复，正是事物发展中的螺旋式的表现。

事物发展的螺旋式作为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内容，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红军打破敌人的第一次“围剿”是肯定，白军卷土重来，对红军实行再包围是第一个否定。由于红军英勇作战，和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白军的包围又被打破，于是便出现了再一次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

但是，形式上的反复不等于内容上的简单重复。“围剿”和

反"围剿"的形式不断反复，无论从敌我力量的对比，战斗持续时间的长短来说，还是从敌我对策的变换等方面来说，都不象"循环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简单的、机械的重复。恰恰相反，在事物发展的每一个螺旋形中，总是依照具体情况，保留着过去阶段的某些残迹，又增加了新阶段的一些因素和内容，绝对的否定和简单的重复都是反辩证法的。

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方针的演变来看，也可以充分表明事物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分析了我们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问题。他说，在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战争过程中，共存在着三个战略转变：第一个转变，是从十年内战初期的游击战转变为十年内战后期的正规战；第二个转变，是从十年内战后期的正规战转变为抗日战争初期的游击战；第三个转变，是从抗日战争初期的游击战再转变为抗日战争后期的正规战。表面看来，第一个转变和第三个转变似乎是一样的，即都是由游击战转变为正规战，但是在正规化的程度上却有所不同。在第一次战略转变中，所谓正规战争是中国型的，只表现在战略战术上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和指挥、组织上的某种程度的集中性和计划性方面，其它则仍是游击性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提高了的游击战。但到第二个时期，毛泽东同志当时预见，军队将装备新式武器，作战将起一个大的变革，军队将获得高度的集中性和组织性，作战将获得高度的正规性。就是说，"低级的将变到高级的，中国型的将变到世界型的"①可见，第三个转变比起第一个转变来，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在重复中体现出新的发展和包含了新的内容。

其实，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每一个战略部署，都体现着战争的发展是直线与曲线相统一这一客观规律。早在土地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5页。

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认为，红军的发展必须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①他不同意把红军以营和连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而主张兵力集中，建立一块或几块根据地，借以巩固和发展革命力量，耸动远近视听，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到抗日战争时期，他又精辟地论证了抗日战争的行程是艰难和曲折的，任何速胜的论调只是空谈和假道理，事实上决不存在。后来，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当着国民党反动军队其势汹汹地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时，毛泽东同志则部署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力量“向南防御，向北发展”，并提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这都是对事物的波浪式前进或螺旋式上升规律的具体运用。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持形而上学观点的人不懂得战争发展的过程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辩证统一，他们或者是一味前进，忘记了曲折；或者是只看到曲折，不敢前进。他们各执一端，割裂了两者的有机联系。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只承认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否认曲折性。他们命令幼小的红军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幻想全国革命的总爆发，企求一战而夺取全胜。在第五次反“围剿”前，是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挫败以后，又变作有退无进的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结果都碰了壁。究其原因，都是由于他们违反了中国内战的发展规律，不懂得事物发展的辩证法。而分裂主义和逃跑主义者张国焘，畏惧强敌的表面气势，过分地夸大了事物发展的曲折性，否认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对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他在长征途中带领一部分红军向青藏与新疆地区逃跑，幻想依靠外援并试图打通所谓“国际路线”，结果也碰了壁。这同样违反了中国内战的发展规律，也是根本不懂得事物发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1页。

展的辩证法。毛泽东同志所分析的中国内战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的辩证统一，揭示出了中国内战的形式是“围剿”与反“围剿”的长期反复，这正是他在同历次错误的军事路线作斗争中产生的重要的理论成果。

毛泽东同志关于战略学和战术学中的唯物辩证法范畴，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除上述几对范畴外，还有持久与速决、内线与外线、兵力的集中和分散等等。毛泽东同志军事辩证法中的范畴理论，同他的整个军事辩证法理论一样，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完善。

第七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始终的基本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根本动力。毛泽东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这一原理，提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全面性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

社会主义社会同其他任何社会一样，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也正是在社会基本矛盾的推动下不断向前发展的。然而，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其社会基本矛盾必定有它自身的特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领导人民群众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但需要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尤其需要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毛泽东同志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和主要表现，指明了解决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途径和方法。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创立的，它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石。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推广运用于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推动下，不断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他们具体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及其运动发展的一般过程，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钥匙，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基础。

无产阶级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一般原理进一步具体地分析和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所存在的各种矛盾，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及其运动发展的特殊规律，这是取得全国政权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亟待解决的一个关系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这一历史课题，不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斯大林，都未能从思想理论上加以全面解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时，虽然以深刻的洞察力预见到“**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①，提出了许多重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243页。

要的思想，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①，而不可能具体地揭示未来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发展的特殊规律。十月革命后，列宁曾经根据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问题有过某些重要的论述，比如他曾经提出"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消失，矛盾仍然存在"②的论断，这对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列宁逝世过早，未能直接经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斗争实践，因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不可能作出全面的和明确的回答。在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斯大林曾经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是完全适应的，是不存在任何矛盾的。斯大林在后来所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虽然承认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矛盾，说如果实行错误的政策，有可能弄到冲突的地步。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入了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3页。

② 列宁：《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语》，人民出版社版，第5页。

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新的历史时期里，在党内和一部分干部队伍中，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上也存在着某些形而上学倾向。他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①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些矛盾，使我们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复杂矛盾，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他着重指出，无论在什么社会里矛盾总是普遍存在的，因而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社会主义社会同任何其他社会一样，“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②，“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③他还进一步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整个人类社会都是在社会基本矛盾的推动下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而在消灭了阶级和消灭了帝国主义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也仍然还会存在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基本矛盾的推动下，共产主义社会也要经历一个它自身发展的历史过程。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的论点，是指引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发展的理论指南，因而也是批判在对社会主义社会认识上的各种形而上学唯心论的强有

---

①②③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10页。

力的思想武器。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

如上所述，社会主义社会同以往任何社会一样，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然而，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是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较之以往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特点。认清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发展的根本理论前提。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其相适应的方面则是基本的，而不适应的方面则是非基本的。因此，这种矛盾的性质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根本区别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①

当然，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客观存在着的矛盾，如果长期不认识，或处理不当，也会有对抗的现象发生。但是如果没有外力的干预，这种对抗一般说来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合作关系，以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10页。

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和由此决定的交换和消费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两种基本的经济形式，城乡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则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建立起来的，是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了以往阶级社会所存在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脱离的社会弊病，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起来，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由此所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而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危机，使生产符合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目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消费品是按照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的，这就从根本上消灭了以往剥削制度下“劳而不获”和“获而不劳”的不合理现象，把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同劳动成果即对社会的劳动贡献直接联系起来，把国家、集体（企业）和个人利益统一起来。总之，社会主义社会的这种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尖锐对抗的性质，有利于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是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的政治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由于各个国家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以及由此决定的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解放的具体道路不同，因而这些国家在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具

体形式也就会不尽相同。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普遍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我国的具体实际，提出了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科学概念，把“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①，更加确切地表达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性质和内容。建国三十多年来的历史经验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采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适合的，它科学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人民内部各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对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科学的思想理论为指导的，它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也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争取彻底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武器。无产阶级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摆脱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影响，觉悟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和历史使命，成为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革命阶级，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同样，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也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理指导下，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表明，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革命才有了正确方向，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也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才结束了三大敌人在中国的统治，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4页。

度。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被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已为我国宪法所确立。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的思想理论的指导，就可以保证我国的革命事业始终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就可以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去教育人民，战胜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就可以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战胜各种困难，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胜利不断走向新的胜利。

应该指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除了有相适应的一面，也还有相矛盾的即不相适应的一面。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完美无缺的，其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必然会存在着某些环节上的缺陷或弊病。就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比如在生产关系方面，在我国基本上实现了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具体形式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两种公有制之间以及公有制与个体经济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在积累与分配的关系上，以及在分配的具体形式上，也都有大量的矛盾存在，这是同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在上层建筑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还不够健全，在党和国家的机构设置、干部结构、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等方面，都还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这是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与发展不相适应的。此外，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领域，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也依然存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贪图享受，以及封建特权、官僚主义等剥削阶级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对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起着毒化、腐蚀和瓦解作用。

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

初级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①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某些矛盾，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里的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而是非对抗性矛盾，是基本适应情况下的局部不适应。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虽然在人民群众之间、在人民群众与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之间以及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经常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但是，这些矛盾毕竟是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在人民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虽然还存在着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存在着官僚主义、少数人特殊化、家长制作风、个人崇拜、独断专行，甚至欺压群众的不良现象，但是，这些现象从根本上说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产物，而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同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东西。无产阶级政党在率领人民群众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可能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甚至是很严重的错误，使许多事情办得不能尽如人意，不过，这种错误毕竟是前进过程中的错误。我们应当善于对社会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某些弊端或消极现象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把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同社会主义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的缺陷或弊病区别开来，而不能因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某些消极现象就怀疑或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

三、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毛泽东同志指出，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同。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里，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并掌握国家政权，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则处于受剥削、受奴役的地位，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少数统治阶级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乃是一种对抗性矛盾。这种对抗性矛盾，不可能在私有制范围内求得解决，只有通过社会革命的方法，即通过夺取政权和消灭私有制的方法，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则与此不同。如前所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基本上相适应条件下的矛盾，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因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充分地利用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去逐步克服障碍社会主义新制度巩固和发展的一切旧制度和旧思想，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在前进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或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①。

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不同。“对于从封建制度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还在旧制度内部，新的经济组织就逐渐形成起来，它逐渐改变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方面。资产阶级革

---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10页。

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扫除、摈弃并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级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完成了它所应做的一切”。“社会主义革命却处在完全另外一种情况中。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这里除破坏任务以外，还加上一些空前困难的新任务，即组织任务。”① 因此，资产阶级革命通常以夺取政权而宣告结束；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夺取政权只是它的开始，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往后的任务则更艰巨、更伟大。无产阶级在取得全国政权，并基本上实现了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还需要坚决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还需要逐步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变革。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任务，包括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进行这样的革命不仅在内容上同过去的政治革命有根本的区别，而且所采取的方法也根本不同，它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采取和平的或渐进的方式进行的。这是社会主义时期进行各方面革命斗争的新特点，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方法和根本途径。只有认清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的方法，才能正确开展各方面的革命斗争，才能促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454页。

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否则，无产阶级在夺取全国政权，并从总体上消灭了剥削阶级之后，再发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那就势必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起破坏作用。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的论点，不仅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且也为我国的社会实践所证实。比如，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一个很长时期内在工作指导上所出现的“左”的错误，是在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得到纠正和克服的。我们党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从而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大胆地冲破“左”的思想束缚，首先在农村试验和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调动和发挥了八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我国的农业在短时期内蓬勃地发展起来。上述情况深刻地表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完全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加以解决。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只是说社会主义制度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而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就需要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把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是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旧的矛盾解决了，还会产生新的矛盾，还需要不断地加以解决。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者要树立长期艰苦斗争的思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也要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部分质变到整体质变的过程。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的理想，现在就要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斗争。

第二节　正确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新生事物，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和解决需要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地实现。

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即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还在进行的时候，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就开始探索符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认真地总结了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同时也参考和对照了其他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从而逐步提高了对正确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探索到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方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它包括大幅度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多方面地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全民族思想文化水平，努力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

一、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一项长期的根本任务

从革命事业发展的进程和规律来说，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应该包括破坏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这样两个历史任务。无产阶级取得全国政权以后，一般说来，社会主义事业就应该由破坏旧世界进到建设新世界。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既然能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新民主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那末它也必然会继续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得更加美好。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事业，有许多复杂的矛盾需要解决。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历史进程中，经济建设归根到底起着决定的作用。大家知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社会生活，其中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和制约的，从根本上说，是由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决定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发展和最终胜利，都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如前所述，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对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只有经过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正因如此，在我国基本完成私有制改造以后，党和毛泽东同志即主张把全党的工作重点集中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1956年党的八大正确地肯定了我国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结束，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其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还明确地提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思想，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成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并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的伟大号召。1958年，毛泽东同志又提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的重要思想。应该说，在私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

也是全党和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强烈愿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和指导思想上的拔乱反正，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八大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思想，领导全党胜利地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并进一步探索到了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基本点。在这一问题上，邓小平同志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邓小平同志进一步科学地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主要矛盾，把同心同德实现四个现代化确立为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他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①；"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②。邓小平同志发挥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红与专是辩证统一的观点，明确地提出了对四化是否有利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的最根本的标准。他指出，"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③，因而积极钻研业务、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本身就是一种红的表现。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进一步具体地阐明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发展必须以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为依据，必须尊重群众意愿和要求的重要思想。他指出，目前我国农村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一种低水平的集体所有制形式。这种低水平的集体化要想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只有在生产发展、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才有可能，群众才乐于接受。"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④。邓小平同志具体地分析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168、240页。

③④ 同上，第181、89、275页。

设的正确原则和方针。他指出，中国的国情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底子薄即比较贫穷落后，二是人口多、耕地少。由这两个特点所决定，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必然是长期的和艰巨的，因而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中，就必须长期艰苦奋斗、量力而行，必须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必须实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必须注意发展农业，必须广开门路，扩大就业，必须注重科学技术，培养科技人才，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等等。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些重要的思想，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进一步运用和发展，对于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要大力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迅速改变我国生产力的落后状况，必须充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家知道，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科学技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社会生产力、至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其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①他从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的提高中，看到了资本主义将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客观必然性；他把自己的关于共产主义的学说奠定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但需要有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需要有科学技术、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教育事业的充分发展。现在，我们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业已把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重要的内容。近些年来，世界上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一场以电子技术为中心、涉及面广而各个学科又相互联系的新的技术革命正在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2页。

起。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尽快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缩短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使中国更快进入世界科学技术强国之林，这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可靠保证。

我们党在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实践之后，对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比过去丰富得多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比过去深刻得多了。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已经出现了一个继往开来的大好局面。可以相信，在党的十二大路线指引下，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必将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三十多年前就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①

二、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剥削和剥削阶级，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有巨大的优越性。但是，社会主义的各项具体制度还有不完善、不健全的地方，需要不断地加以改革和完善。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在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上都比较落后的国家，其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具体形式才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生产力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更需要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地加以探索和解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的基础上，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中进行了大胆的和卓有成效的改革，从而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4页。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然而，长期以来在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认识上，却存在着严重的形而上学固定观念。比如，在对所有制结构和所有制关系的认识上，排斥多种经济形式，离开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去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认为公有制水平愈大愈公就愈好；把所有制关系仅仅归结为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因而认为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就意味着所有制关系、乃至整个生产关系的完全解决，等等。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经济特征的认识上，把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把竞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适应现代化生产的先进管理方法视为资本主义的毒素，等等。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和消费的认识上，忽视劳动者在劳动能力和对社会贡献上的差别，提倡劳动者分配上的差距愈小愈好；把社会主义劳动者在发展方向上的共同富裕，机械地理解为无先后和无差别的同步富裕；把生产同消费对立起来，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等等。应该指出，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上述种种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解和歪曲。这些错误观点的危害作用，早已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证实。正因如此，就应该彻底摈弃那些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形而上学观念，革除那些阻碍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上的种种弊端，代之以新的思想、新的体制、新的管理方法与活动形式。

生产关系是一个多层次的经济结构，是内部诸环节或诸方面相互联结、相互制约的有机统一整体。在生产关系的复杂体系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最基本的和决定的方面，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因此，在整个生产关系的变革中，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所有制关系本身又

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它不仅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问题，而且还包括生产资料的经营权即占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等几个方面的复杂关系问题。正因如此，在基本上解决了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和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后，也还有必要去进一步解决生产资料的占有、使用和支配等问题。同样，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也还需要进一步解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诸环节上的问题。我国现在所进行的经济体制的改革，正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大胆探索和尝试；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是这一探索成果的思想理论表现。《决定》提出和阐明的关于应当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加以适当区分的论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论点，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某些适应现代化生产的先进管理方法的论点，等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改革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一是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这些改革既涉及到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也涉及到上层建筑的若干环节，需要依据实际情况慎重地进行。我们党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有水平总的说来还比较低、还很不平衡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在坚持国营经济为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这对于繁荣城乡经济、方便人民生活起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党在农村普遍实行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是从生产力现有状况出发，对我国农村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具体形式进行的巨大变革。这对于正确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增加劳动者的主人翁责任感和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收到了十分明显的效果。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具体形式也发生了多种多样的

变化，出现了承包、租赁等形式；在城市中，各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正在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全民所有制企业与集体所有制企业间的联合经营，集体所有制企业与集体所有制企业间的联合经营等其他所有制具体形式也已经并正在出现，从而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多种多样的所有制结构。当前我国进行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深入发展的表现，是我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生产关系方面的又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革，它将极大地增强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的活力。我国在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方面所进行的改革，总的说来，还处在探索阶段，已经收到明显效果的生产责任制也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必将得到迅速发展；同样，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我国目前的多层次所有制结构也必将发展到新的高一级的程度。

我国政治制度的改革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关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则是政治制度改革的中心课题。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既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显著标志和基本内容，同时又是胜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化和现代化，必然要求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没有高度的政治民主是不可想象的。鉴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鉴于我国建国以来导致工作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健全的民主与法制，鉴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需要相应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因此，我国政治制度的改革，必然要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为其中心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为完善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党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确立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奋斗的一个重

要的战略目标；五届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根本原则。为了保证这一战略目标和根本原则得到充分体现，在党的领导下，对我国政治制度的某些不完善方面已经着手作了重大改革。比如，实行“党政分家”，对执政党同宪法和法律的关系作出明确规定，克服以往那种党政不分或以党代政的现象；扩大人大常委会职权，加强立法工作和对国家机关的监督工作；对国家领导人因年龄和健康状况原因而离休退休的制度作出了规定，废除实际存在过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逐步发展人民的直接民主，把各级权力机关的代表制民主同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的直接民主结合起来；等等。为了从根本上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办事效率，我们党已着手精简国家机构，并对干部制度实行重要改革，用行政立法规定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和工作人员的职责范围，严格干部的考核制度、奖惩制度、退休和轮换制度，努力实现领导人员的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和年轻化，等等。我国政治制度的改革，正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和有秩序地健康地进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日益完善和发展，我国将会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政治局面，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将会得到进一步发挥，从而必将更加有力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发展。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按其性质和目的来说，也是一种革命。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的改革时曾经说过，精简机构就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① 这种革命不是要动摇和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自身基础上的自我改进和自我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在党和

---

① 《邓小平文选》，第352页。

国家的领导下，依靠亿万人民群众，有步骤、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它是一个过程，需要长期地进行。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它要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成熟到成熟的逐步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旧的矛盾解决之后也将会出现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正是要经过许许多多的改革而开辟前进道路的。社会主义制度为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遇到种种干扰和阻力。革命者应该站在改革的最前列。改革的前途是光辉灿烂的。

三、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不但需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而且还需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一样，既是人类改造世界的重要成果，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条件。离开了精神文明的发展，离开了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的进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正因如此，我们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最终向共产主义过渡，就必须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

毛泽东同志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两方面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①所谓人们的主观世界的改造，不能仅仅理解为只是思想意识的改造，还应当包括人们的认识及其能力的发展和改造，人们的感情、意志、美感等方面的发展和改造。这种改造主观世界的成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

果，就是我们所说的精神文明，它既包括知识文化和思想道德两大方面，又包括个人和社会两个范围，总之，包括人类整个精神世界的发展和改造。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大家知道，人类社会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已经经历了奴隶制、封建制和雇佣奴隶制三个文明发展的阶段，每一阶段都创造了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社会发展都起了推动作用。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以往"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①这种文明是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野蛮统治与剥削基础上的，是供少数人享受的文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虽然有些国家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很进步，但仍然是劳动者受剥削，许多人处于贫困状态，同时也存在着精神的野蛮、精神的堕落和精神的空虚这样一些普遍的社会现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却不同，它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是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相联系的，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这样，社会成员间就有了共同的利益，就可以形成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以及共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就可以为实现共同的目标，意气风发地团结奋斗。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建设即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展，二是思想建设即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者是统一的，是相互渗透和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文化建设是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条件，就社会发展的总体来说，人们的思想水平的提高会受到文化知识的直接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思想建设又对文化的发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3页。

起着主导作用，它制约着文化的发展和左右着文化服务的方向。正因如此，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对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都必须予以重视，两者必须兼顾。

在我国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大家知道，文化建设不仅是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条件，而且也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乃至重要的组成部分。物质文明建设所需要的科学技术和大量的人才须由文化教育的发展来提供，文化教育通过各种过渡阶段或环节可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同时，更由于中国是一个科学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亟需大批具有较高科学文化水平的建设人才。因此，我们党在胜利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之后，便把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思想建设决定着我们的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保证。它的主要内容，是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科学理论，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是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主人翁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是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权利义务观念和组织纪律观念，是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和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是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等等。概括起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共产主义的高尚的理想、信念、情操和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与组织纪律，不是自发形成的，它需要人们自觉地学习和修养，需要社会的大力提倡，需要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和灌输。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应该正确认识和处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同社会主义现行政策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教育同社会主义的现行政策并不是一回事，因此必须加以区别。我们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当然不是反对正当的个人利益；我们提倡“不计报酬”的共产主

义劳动态度，当然也不是主张劳动可以不给报酬；我们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风格，也决不意味着赞成搞什么“共产风”，可以放弃按劳动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另一方面，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教育同社会主义的现行政策又是一致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一样，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劳动者都是社会的主人，因而不论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是在其低级阶段，都必须坚持共产主义思想，都必须提倡主人翁的劳动态度，提倡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互相关心和顾全大局的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原则，是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和在公有制基础上所实行的分配原则，它同资本主义的等价交换原则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那种把社会主义的现行政策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教育对立起来，认为只要实行社会主义的现行政策就不能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观点，是片面的和错误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辩证的统一。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和整个社会文明发展的基础，而精神文明又对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精神文明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特别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情操和道德对革命事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已为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实。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面临着极其强大的敌人和难以想象的困难，然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国革命人民，正是依靠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不屈不挠的英勇献身精神，才结束了三大敌人在中国的统治，使我们伟大的祖国象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正是这种革命精神激励着我国亿万人民进行了坚毅、顽强、英勇的斗争，使我国初步地改变了以往那种贫穷落后的面貌，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开拓了胜利发展的前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党的十二大提出的一项具

有战略意义的历史任务，它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在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通过亿万人民的艰苦奋斗，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必将以物质上和精神上都高度文明的强国姿态而跻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八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

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提出了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并着重阐明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第一节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在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以后，还存在着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新课题。毛泽东同志科学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两类矛盾作了深刻地分析和阐发，明确地指出了民主和专政的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根本方法。

一、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新课题

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两类矛盾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不可能找到现成答案。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并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的实践。他们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即列宁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出发的，没有料到一些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会首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没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更不存在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阶级斗争。因此，在他们的著作中也就不可能有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敌我矛盾问题的论述。当然，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们是有过许多重要论述的。比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就曾经科学地预见到，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在经济、政治、精神等各个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必然会存在着旧式分工，存在着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存在着分配问题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而要消除这些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光靠剥夺资本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不行的，还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出来。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特征，并揭示出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处理方法，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发展问题，仍有其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实践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不可能作出深入的和具体的科学说明。

列宁在领导俄国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遇到了许

多极其尖锐复杂的矛盾。他在从理论上分析这些矛盾问题时也涉及未来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矛盾问题。他论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这一分配制度的合理性和局限性问题；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斗争的多种形式问题，特别强调要同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作斗争。他针对布哈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到处分裂为两个基本对抗阶级的观点，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消失、矛盾仍将存在的重要论点。在这个时期，他已经注意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将要发生变化，阶级斗争的胜利"会使斗争的重心逐渐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① 他在许多著述中还具体地谈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和官僚主义的矛盾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等等。列宁的这些思想为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指出了方向。当然也应该指出，列宁并没有亲身经历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实践，他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两类矛盾问题，其中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出全面研究和深入论述。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人民内部矛盾开始大量地表现出来，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对此，斯大林也曾经试图从理论上作出概括和说明。在苏联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前，斯大林对当时苏联社会所存在的矛盾作过一些分析。他曾经指出，当时苏联"有两种矛盾。一种矛盾是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另一种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一种矛盾是完全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努力来克服的，第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70页。

二种矛盾却需要几个国家无产者的努力才能解决”。①他又把苏联国内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叫做“结合内部的矛盾”，而把工农劳动群众同国内资产阶级分子的矛盾称作“结合外部的矛盾”。他还对这两种矛盾的区别、联系以及处理方针问题作过一些分析。他指出，这两种矛盾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不能混为一谈；工农之间的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对这种矛盾应以协议和相互让步的方式来进行调节，不能将其弄到尖锐化和冲突的地步。又指出，领导机关如果采取某种不正确的政策，那末，这种“结合内部的矛盾”就势必发生对抗或冲突。斯大林的这些观点，就其基本内容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他这些观点既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科学理论，也没有将其贯彻到底，其中有些观点也是错误的。比如他有时也在国内矛盾和国际矛盾的意义上来使用“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概念，而对“内部矛盾”也并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他往往把矛盾和对抗混同起来，把引起“内部矛盾”的根源常常归结为“外部矛盾”挑唆的结果；他在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之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一直认为在苏联内部只有团结统一而无矛盾，因而对苏联国内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也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分析。结果在实践上势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导致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斯大林逝世以后，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国际上造成了严重的恶果。西方资产阶级企图利用斯大林的晚年错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并出现了象波兰和匈牙利那样的一部分群众反对自己政府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吸取斯大林的教训，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课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91、101页。

题和实践课题。

1956年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革，社会矛盾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的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我们国家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党和政府正在领导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另一方面，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又出现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系统地论述了两类矛盾的表现、性质、区分标准、相互转化，以及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根本方法和指导方针，并且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科学论点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增添了新的内容，给人们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现象提供了指导性的线索。

当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两类社会矛盾学说也将不断丰富发展。从毛泽东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到现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又经历了二十多个年头。在这期间，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问题上，又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系统地和科学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从而使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学说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和发展。

二、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

级已经不存在了。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存在着矛盾了。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①

为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人民和什么是敌人。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和“敌人”是一对历史范畴，在不同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人民”和“敌人”的区分，是由不同历史时期革命的主要任务以及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人们对这一主要任务所采取的政治态度决定的。就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而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则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而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则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而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则都是人民的敌人。

我国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后，人民概念的范围也相应地扩大了。在我国现阶段，为了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进行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香港问题的和平解决，使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更加扩大。我国现阶段的统一战线，已成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

---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1页。

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政治联盟。从统一战线的主体和根本的政治基础说，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工、农、知识分子是它的基础和依靠力量，但它也包括了一部分只赞成祖国统一、并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我们党之所以组织如此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是由我国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和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决定的。在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国新时期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的确立，人民概念范围的扩大，是对毛泽东同志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毛泽东同志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①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基础是不相同的。敌我矛盾是人民同各种敌对分子之间在根本利益对立基础上的矛盾。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各种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罪恶活动，因此，人民群众同他们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双方对立的因素占着主导的地位，发展到最后往往要通过外部冲突的形式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范围内的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内部以及它们相互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比如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的矛盾，领导同群众的矛盾，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以及各民主党派内部的矛盾等等，都"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

---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2页。

上的矛盾。”①人民内部矛盾双方的一致性是主要的或基本的。正如斯大林指出的，这种矛盾中，“利益的一致性比利益的矛盾更有力和更深刻。”②这种矛盾的发展一般不会打破统一体，而是通过矛盾斗争，调整关系，建立和谐与统一，使旧的矛盾得到解决，使统一体日渐巩固和发展。但是，当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剥削阶级和剥削与被剥削的情况下，人民内部矛盾还包含着对抗性的一面。比如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人民中还包括着民族资产阶级，它同工人阶级之间就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一矛盾就是对抗性的。但是，这种矛盾如果加以正确的处理，也可以转化成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去解决。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们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采取和平赎买的方式，在政治上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和平地解决了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改造。

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产生和存在是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相联系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情况所决定，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劳动分工的差别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结构将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尚须经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与此相联系，社会主义社会在道德和精神等方面也必然会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剥削阶级和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也不会很快地消除。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际资本主义还会不断地对社会主义进行侵蚀和渗透。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产生和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2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48页。

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一般说来，随着社会矛盾的历史条件的变化，两类矛盾的性质也就发生转化。比如城乡之间的矛盾在阶级对抗的条件下是对抗性的，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就变成为非对抗性的了。又如，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但在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就可转化为非对抗性的。一切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在其生产资料被剥夺以后，只要他们不破坏，不捣乱，人民政府也给他们工作，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在这种情况下，反动阶级分子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就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应当指出，人们对两类社会矛盾的认识及处理方法是否妥当，对于两类矛盾的变化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同志说："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①这种情形，不论在我国还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曾经发生过。当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这种情形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现象，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因而不可能发生长期的、全局性的和根本性的对抗。

三、民主与专政的方法是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基本方法

正确认识和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是为了采用正确的方法去解决这两类矛盾。毛泽东同志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在处理两类矛盾问题上的历史经验，也借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

---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8页。

史经验，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积累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系统地阐明了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正确原则和方法。

事物矛盾的性质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因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方法也有区别。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①所谓用专政的办法解决敌我矛盾，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按照法律的程序，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压迫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将他们判罪。在一定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改造。当然，专政的办法是解决敌我矛盾的总的方法，至于对各种敌我性质的矛盾作出正确处理，又必须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根据敌人罪恶大小、情节轻重、态度好坏，按照不同情况对敌人采取"杀、关、管、放"的不同措施，例如"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以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以利用矛盾，争取改造多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最顽固的敌对分子。为了更好地解决敌我矛盾，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专政与改造相结合的方法，对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杀的，都加以改造，给生活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

民主的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各种矛盾的最基本的方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人民内部矛盾是根本

---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8页。

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因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即说服的方法和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加以解决。这就是说，只能根据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去建立人与人之间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正确关系，去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复杂的矛盾，而不允许诉诸暴力。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①当然，人民也必须遵守法律和纪律。法律和纪律无疑是具有强制性的，然而这些法律和纪律是由人民（通过自己的政府和所选举出来的代表）制定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人民所取得的民主权利，为了有效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和有秩序地进行劳动、学习和生活，而不是为了对人民施行暴力；同时，人民政府和各个团体、组织在执行法律和纪律的时候，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这样，在人民内部实施法制和执行纪律，本质上还是人民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的一种自我约束，是一种辅助形式，仍然属于民主的范围，这同对敌人的专政性质上完全不同。

毛泽东同志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这就是“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②在这一公式里，团结既是出发点又是目的。首先要有团结的愿望，这是能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前提。如果缺乏团结的愿望，就势必会把事情弄得很糟，非但不能解决矛盾，还会使矛盾越发扩大或尖锐起来。当然，讲团结不是不要批评和斗争，不是主张一团和气和息事宁人。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③不过开展批评要实

①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4、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30页。

事求是，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只有正确地开展批评或斗争，才能解决矛盾，达到新的团结。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这一公式，正是长期革命斗争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也是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成功经验的高度概括。大家知道，早在1927年我们党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时，在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矛盾关系问题上，就采用了这个方法。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上。延安整风中，我们党就自觉地运用这一方法去处理广大党员同党内教条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处理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教条主义思想的矛盾，达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了同志的目的，从而取得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建国初期，对民主党派和工商业者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加强了党同民主党派的合作。实践证明，我们党运用这一公式来处理人民内部的许多复杂矛盾，都获得了伟大的成功。因此，在我国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提出，应当“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一切部门和单位“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又提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发展。

民主的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总的方法，由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多种多样的，因而在运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还必须根据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具体形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是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般公式或基本指导方针提出来的，但它主要适

---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8页。

用于处理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对于这一公式不能加以绝对化，不能到处乱套。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坚持用民主的方法，提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并且还根据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原则和方法。比如，解决人民内部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应根据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实行按劳分配；对于人民群众同政府机关的矛盾，要采取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去解决；对于科学文化领域中的矛盾，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艺术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和科学、艺术的实践去解决；对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矛盾，则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党的十二大又提出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等等。总之，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复杂的，解决的方法就应该是多种多样的。

解决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都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只有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才有共同的政治基础，便于分清是非，统一认识。正因如此，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对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从而保证革命和建设胜利发展的重要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又提出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强调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去疏通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他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① 因而，我们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复杂矛盾，都应该从有利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根本的政治目标出发。

---

① 《邓小平文选》，第149页。

第二节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两类社会矛盾的政治比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民内部矛盾处于突出的地位，它大量地、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

一、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内部矛盾处于突出的地位

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表现出来的。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以及在消灭了剥削阶级但还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的社会里，社会基本矛盾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上都表现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然而，这两类矛盾在不同社会的矛盾总体中所处的地位却各不相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不但需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且还需要科学估量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生活和革命进程中各自所处的地位，以便确定党的工作的战略重点，把革命的主要力量集中到主要的斗争任务上。

无产阶级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反动剥削阶级的矛盾，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治统治。这一时期，在革命队伍或革命阵线内部虽然也存在着许多复杂的矛盾，

需要经常地和及时地加以协调和妥善处理。然而，就整个社会矛盾的总体来说，在这一时期所存在的两类社会矛盾中，敌我矛盾却始终处于突出的或主导的地位，要集中全力去解决，而人民内部矛盾即革命队伍和革命阵线内部的矛盾则处于次要的或服从的地位。如若主次颠倒，处置不当，将会贻误整个革命工作。

无产阶级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特别是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以后，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整个社会矛盾中政治比重也相应地发生了深刻变化。1956年党的八大曾经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说，人民内部的矛盾处在了突出地位。

人民内部矛盾之所以处于突出地位，是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相联系的。在这个阶段里，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尽快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地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里，又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把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进一步科学地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对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的继续和发展。邓小平同志在阐述这条正确路线时说：“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①，我们一定要“横下心来”，“抓住不放”，“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

① 《邓小平文选》，第148—149页。

心一意地干下去。许多问题，不搞四个现代化解决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人民生活的逐步提高，国防相应地得到巩固和加强，都要靠搞四个现代化。”①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内部矛盾是多种多样的，其产生的根源也是多方面的，但是引起人民内部矛盾的最主要和最深刻的根源则在经济方面。如工农矛盾、城乡矛盾、国家和集体与个人间的矛盾、生产和消费的矛盾等等，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决定的；人民内部的许多实际问题，如升学问题、就业问题、住房问题等等，也只有在生产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这就是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最深刻的根源。而人民内部矛盾的大量存在，又是这个主要矛盾的具体体现。正因为如此，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尽快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解决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同样，只有正确处理好各种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促进主要矛盾的解决，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如同毛泽东同志所说，在不断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

二、人民内部矛盾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前所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大量地和突出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极其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240页。

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就我国现阶段的情况说，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内部的矛盾。比如，工农两个劳动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矛盾，等等；第二，不同民族、地域、部门和行业之间及其内部的矛盾。比如，汉族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经济发达的地区同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地区之间的矛盾，工业与农业间的矛盾，工业内部轻重工业间的矛盾，工业、交通和能源间的矛盾，生产、建设和流通相互间的矛盾，生产建设同科学文化教育间的矛盾，以及文化科学领域中的矛盾，等等；第三，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即领导同群众间的矛盾。其中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相互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自由同纪律的矛盾，党和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人民群众的矛盾，等等。总之，在我国目前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有多种类型，多种层次，相互交错，相互影响。有的属于人民内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代表不同具体利益各方之间的矛盾，有的属于在总目标一致基础上的认识的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有的属于科学上不同学派、艺术上不同流派之间的矛盾，有的属于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也有的属于带有一定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这些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一般都是属于非对抗性矛盾。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矛盾之所以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从根本上说，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文化发展的水平相联系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还不很高，不可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也不可能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劳动分工的差别，这就必然会在各方面存在着矛盾。就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由于生产力不发达，

还将长期存在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结构，因而纳入国家计划的程度就有所不同，劳动产品的分配办法也就不会相同，这就决定了将会长期存在着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矛盾，存在着积累与消费、生产与生活的矛盾。也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以及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将长期存在着工业劳动与农业劳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矛盾，存在着城乡之间、各地区之间的矛盾。同时，也由于科学文化不发达，人们的科学文化教育水平、认识条件和认识能力不同，将会长期广泛地存在着认识上的矛盾。社会主义是一个新生事物，人们对社会主义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需要经历一个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的过程，需要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地加以探索和解决。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们所处的地位不同，人们的劳动和工作条件不同，以及人们各自的生活阅历、文化素养、认识条件、实践经验等等的不同，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思想方法和思想水平就各不相同，这样，就难免产生人民内部的种种矛盾。比如，有的群众由于对全局的情况缺乏了解，因而往往忽视全局的和长远的利益；有的青年同志由于缺乏新旧社会鲜明对比的感性知识，对祖国的历史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知之甚少，因而有时不能正确地对待历史和现实中的问题，反而常常离开当前的具体条件提出过高要求，有的甚至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的领导干部则由于自身缺少文化，因而轻视知识的价值和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等等。

其次，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剥削阶级和旧社会的影响的长期存在，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广泛产生和存在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基本上是适应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在旧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必然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存在着旧社会的影响。比如在政治思想上，就存在着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资产阶级和其他非

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存在着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得以产生的重要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同时，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还存在着许多方面的缺陷和不完善的地方，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人民内部矛盾和各种社会弊端的重要条件或根源。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党和国家在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等方面都有不够健全的地方，但主要是民主集中制不健全，因而产生官僚主义、家长制作风等问题。

再次，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决定了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生活中的比重将越来越扩大，表现也越来越广泛。列宁指出，建成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基础。”① 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文化的高度发展，随着对于各种敌对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剥削阶级和旧社会影响的范围将日益缩小，敌我矛盾产生的条件逐渐消失，这就必然使敌我矛盾向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使人民内部矛盾越来越扩大。当然，人民内部矛盾由于处理不当等原因，也可能向敌我矛盾转化，但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就决定了这种转化在社会主义国家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现象。所以，就两类矛盾发展的总的趋势来说，不是人民内部矛盾愈益向敌我矛盾转化，而是敌我矛盾愈益向人民内部矛盾转化。

三、健全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和主要矛盾的变化，使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出来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它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能

---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第351页。

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系着党和国家能否保持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正确领导，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关系着能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方针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说，要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农业。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民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它作为手段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政治保证，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同时，社会主义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又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根本的政治制度。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我们的目的。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就是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以便"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①。这种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同时也从制度上保证我们能够运用民主的方法去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运用社会主义民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

① 《邓小平文选》第282、296、282页。

制建设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法制从根本上说来是为了建立、保护、巩固和发展对人民群众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社会主义法制的这一作用是通过对敌人的专政和对人民的民主来实现的。这就是说，它一方面是对敌人进行专政的锐利武器，另一方面它又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保证，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辅助手段。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①。所谓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就是要使我们国家的民主生活、民主结构、民主程序、民主形式和人民的民主权利有一套系统的严密的具体制度和法律制度来体现和保障，具有制度上、法律上的完备形态。"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②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人民内部的一些关系如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不少也要通过法律来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二大以来，我国加强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立法方面，我国根据社会主义民主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在进一步完善国家宪法的同时，加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行政各方面的立法工作，系统地制定出各种法律，逐步建立起完备的法律体系。在司法方面，强调保持司法机关应有的独立性，切实保障检察院和法院的检察和审判不受任何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强调一切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要忠于法律和制度，严于执法，并在人民中反复进行广泛的民主和法制的宣传教育，使人民懂得遵纪守法。同时我们的党章规定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并使这些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

---

①② 《邓小平文选》，第136页。

性。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调整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既有民主的方法，又有确定的准则，使我们能够正确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

同时，有了健全的民主和法制，就能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一方面运用健全的法制武器同一切反动势力作斗争，同时又对一切敌对分子进行改造，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促进他们转变，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健全社会主义民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平。在我国有许多人民内部矛盾是同目前我国文化水平比较低，同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认识能力的不同相联系的，也有的是同人民群众的组织纪律、道德修养状况相联系的。要解决这些矛盾，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共产主义道德水平。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问题认识不足。由于"左"倾思想和小生产观念的束缚，在我们党内相当普遍相当长期地存在着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它严重地妨碍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总结这一经验教训，在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我们党决定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的报告中深刻地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论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的内容和相互关系。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一是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和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一是培养人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道德、组织纪律观念和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抓好精神文明的这两个方面的建设，就可以提高人民群众的认识能力、认识水平，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道德修养和组织纪律性。这

样在一些问题上就容易统一认识，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人们就能够以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和组织纪律来约束自己，从而自觉地处理好个人和集体、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使一些矛盾得到很好的解决。

坚持社会主义民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是共产党人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是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原则和方法。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总题目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又说，什么叫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一是要求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中，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情况，根据事实确定矛盾的性质，作出正确的区分和处理。二是要求在处理矛盾发生错误的情况下，要敢于实事求是地纠正错误，落实政策。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同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是互相联系的。一方面，社会主义民主是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组织保证。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和坚持群众路线，也就不可能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另一方面，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不相信和依靠群众，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两者缺一，都不可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过去由于党和国家民主制度不够健全，也由于两类社会矛盾的复杂性，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一些时候，一些问题上，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对一些社会矛盾作了错误的处理。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坚持实事求是，纠正错误，就不可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

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改过来。由于坚持群众路线，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复查和平反了大批的冤假错案，落实了各项政策，妥善地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就有效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牢牢记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样一个基本的指导方针。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处理任何矛盾“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历来认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是人民的事业，因此，只有充分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调动人民群众的一切积极因素，才能把革命和建设搞好。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也正是依靠群众的结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项伟大艰巨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就需要更广泛调动党内外和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争取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三节　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怎样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科学地总结了以往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在剥削阶级消灭以后，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大多数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阶级斗争

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因此，既要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阶级斗争熄灭的观点。

一、私有制改造完成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一种历史的范畴和广泛的社会范畴。阶级和阶级斗争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它同一切在历史上产生、发展和灭亡的社会现象一样，必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而趋于灭亡。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是要从历史上消灭阶级斗争和一切阶级差别，建立人类最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

阶级斗争的消灭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历史阶段的更迭和革命任务的转变，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的内容、形式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比如，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的矛盾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我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三大敌人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与此相适应，阶级斗争就采取了武装斗争这样一种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同时也采取了经济的和思想文化的斗争形式）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的具体形式。在我国无产阶级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的最初一些年代里，阶级斗争是围绕着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逐步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一内容进行的，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在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同时，对私有制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于无产阶级已成为国家政权的领导力量，也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因而废除资本主义剥削制

度和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斗争就采取了和平改造的形式。实践证明，我们党依据阶级斗争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是正确的，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发展。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已被消灭，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已不复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基本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虽然还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但它已不再是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过去那种敌对阶级之间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不可能再发生了。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我国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基本完成之后不久就正确地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① 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又离开他的正确思想，重新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视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党的十二大总结了历史的教训，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大多数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出和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发动和开展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所谓"政治大革命"，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基本原则的，其结果势必混淆两类矛盾，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

为了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必须正确处理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斗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民内部矛盾是相对于敌我矛盾而言的，

---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13、16页。

而阶级斗争则是相对于不属于阶级斗争的社会矛盾而言的，两者不能混淆。当然，人民内部矛盾并不是与阶级斗争完全无关的，从历史上看，比如在我国五十年代中期，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就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但是，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以后，人民内部的这种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就不存在了，只存在着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某些表现或反映。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同阶级斗争的关系，必须划清两种界限：一是不能把人民内部一些有阶级斗争反映的矛盾当做阶级斗争。人民内部一些人由于剥削阶级思想影响，或其他原因作出损害社会和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这只是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反映。人民群众同这些人的矛盾一般地属于非对抗性的矛盾，对于这种矛盾，一般应采取民主的方法去处理。二是必须区分对抗性和敌我矛盾。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但对抗性不完全等于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理得不好，有可能发展为对抗。但这种人民内部的对抗同敌我矛盾的对抗其性质是不相同的。敌我矛盾是在根本利益对立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根本性质是对抗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对抗只是由于处理不当引起的暂时的和局部的一种对抗形式，只要处理得当，这种对抗形式就会消失。对这种对抗不能采用阶级斗争去解决，而必须做耐心细致的工作，消除激化，使矛盾得到妥善解决。

二、剥削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社会主义社会里，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

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这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以往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所得出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一个基本的科学结论。

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以后，阶级斗争之所以会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是由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着产生和引起阶级斗争的深刻的国内和国际的根源与条件。第一，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从整体上被消灭以后，仍然存在着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和其他敌视与破坏社会主义的分子。他们在短期内不可能被完全消灭，他们必然会进行着各种破坏和捣乱。第二，剥削阶级消灭以后，其影响和遗毒仍然存在，特别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仍然在毒化社会空气，腐蚀着人们的灵魂，致使其中的一部分人蜕化为新剥削分子或新反革命分子。第三，由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些国家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国家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资本主义势力和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必然会对它进行侵蚀和破坏。第四，社会主义制度还很年轻，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不可能防止某些社会成员蜕化变质，不可能杜绝极少数剥削分子和各种敌对分子的产生。就我国来说，除上述诸点外，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尚未最后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台湾等地还存在着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就是将来统一以后，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都将长期存在腐蚀和反腐蚀的斗争。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里，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必然会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阶级斗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就人类历史的全过程和阶级斗争的总趋势来说，它的发展不可能是越来越尖锐的，而必然要经历逐步缓和、缩小以至消灭这样的历史过程。但是，阶级斗争发展的这一历史过程又不会是直线的，而是曲线的或波浪式的，有

时甚至是十分尖锐激烈的。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外敌入侵的可能性，在外敌大规模入侵的情况下，阶级斗争不但由此会激化起来，而且在一定时期内甚至可能成为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可能激化的原因，应该从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而不能笼统地把激化原因归结为主观因素。一方面，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某些激化状态的出现，是由敌对力量方面的客观原因引起的，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决定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某些激化状态的出现，又是同我们自身的工作直接相关的。邓小平同志在谈到近几年来我国出现的严重经济犯罪问题时指出："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①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缺乏清醒的认识，放松了对阶级斗争的警惕性，听凭各种敌对势力胡作非为，抑或在工作中发生严重失误，缺少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和严明的法纪，抑或不能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混淆政策界限，等等，这就必然会给一些反社会主义分子留下可乘之机，使阶级斗争激化起来。

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除了外敌大规模入侵，一般说来，阶级斗争的激化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现象。就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说，我们并不希望出现阶级斗争的激化状态，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有安定的社会条件。所以，我们应该提高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规律性的认识，提高警惕，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努力防止可能出现的阶级斗争的激化状态。

---

① 《邓小平文选》，第357—358页。

三、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阶级斗争

在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但是，同以往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相比，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具有新的特点。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①只有从总体上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基本特点，才能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不同于阶级社会那种完整形态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而是人民群众同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的斗争。从我国现阶段来说，敌对分子包括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各种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犯罪分子，进行贪污盗窃、投机诈骗、走私贩私的新剥削分子，极少数进行破坏的旧剥削分子以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余分子，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并不能形成完整的剥削阶级，但仍然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文化上和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着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同这些敌对分子的斗争。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必须服从经济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要获得自身的解放，必须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舍此没有别的道路。但是，在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

① 《邓小平文选》，第155页。

已经基本解决，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虽然也起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加强安定团结和保护社会生产力的作用，但它已不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的或基本的动力，它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从规模、范围和形式来看，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一般不再表现为全社会范围内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里，敌对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以大规模的尖锐的形式在全社会范围内展开的，主要表现为武装斗争。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尽管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采取和平赎买的方式，但由于这一斗争旨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因而限制与反限制、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仍然表现为全社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在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一般说来，阶级斗争不再采用群众运动、政治运动的方法，而是根据法制原则，在国家法律范围内，按照法律的程序来进行，正确有效地使用法律武器，给予各种敌对分子以有力的打击。

总之，社会主义时期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下去。这种斗争虽然不是以国内一个阶级同另一个阶级的斗争的完整的形态表现出来，但就其内容和实质而言，它直接是国内过去阶级斗争的延续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反映。只要产生阶级斗争的各种条件还存在，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就不可能消灭。对于这种斗争，既不应夸大，也不应缩小。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种阶级斗争，才能更好地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九章 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体系中的极其重要的内容。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特色。群众路线包括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概括地说，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的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对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指导，不仅提出和坚持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而且在党的实际工作中形成了一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理论。

第一节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树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是形成和实施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首要前提和基础。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但在实践上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始终紧紧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而且在理论上系统地概括和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所包含的基本内容，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人物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从而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

一、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是两种历史观斗争的焦点，是区分历史唯心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根本理论原则问题。在人类认识史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指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把这一原理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乃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始终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把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才能夺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把党的全部活动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基础上，从而不但在实践上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而且在理论上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观点。

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进一步深刻地论述了人民群众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伟大历史作用，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动力的原理。毛泽东同志阐明了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在谈到我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时曾经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①他在谈到文艺的源泉问题时还指出："人民生活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9页。

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①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还反复论述了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的思想。他在谈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问题时指出：“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②。他强调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是人民的事业，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争年代里，他深刻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③，“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④，因为广泛深入地动员了群众，就造成了抵御敌人的铜墙铁壁和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赢得战争胜利的前提。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进一步指出，尽管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中还有很多困难，但是，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只要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首创精神，中国的兴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些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社会发展决定力量这一根本原理的具体体现，它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必胜信念。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2页。

我们党深刻地总结了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系统地概括了党的群众观点的基本内容，使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更加丰富和完善。我们党在建党之后就明确提出，党的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进行革命活动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群众运动。1922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指出："党的一切运动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1925年10月中央扩大执委会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指导下，我们党发动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我们党在斗争实践中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到了延安整风时期，通过对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和具有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特色的群众观点。刘少奇同志在七大《论党》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党的群众观点的四项基本内容，正是对我们党的群众观点的高度概括和系统总结。刘少奇同志指出，党的群众观点就是：第一，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第二，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第三，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第四，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党的群众观点的系统提出并被纳入七大党章，使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运用更加普遍和更加自觉。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使党的群众观点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深刻指出，我们党之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短短几年内能够迅速扭转十年内乱给党和国家造成的严重危难的局面，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归根到底，是由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科学原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创造历史的科学原理"，是由

于我们党“坚决相信人民，依靠人民，顺应了人民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的结果，而“人民对党的信任和支持，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

党和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科学原理的重要贡献还在于，把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的观点运用于对党的全部工作的指导，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和方针政策，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发展。比如，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运用于对武装斗争问题的指导，科学地解决了人民与军队、人民与战争、人与武器、士兵与指挥员的关系，制定了一整套关于人民军队建设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从而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把群众观点运用于党的建设，培养了党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统作风，从而使我们党始终保持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使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把群众观点运用于党领导的政治斗争和政治建设，根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具有的敌人力量十分强大，无产阶级人数甚少，在无产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之间存在着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等特点，提出了建立包括有两个联盟（一是作为主体或依靠力量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的联盟，二是全体劳动者同一切可以合作的非劳动者的联盟）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我们党提出和领导的这一广泛的统一战线，无论在民主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我们党领导的整个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还把群众观点运用于对文化艺术工作的指导，提出了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关于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革命作家必须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反映群众斗争生活，等等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在我们党领导

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得到了更加广泛的运用。

二、为群众谋利益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

正确认识和处理无产阶级政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重要内容。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活动，都是围绕着群众利益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目的、活动方式和行动准则，以及它的作风和风格，都是由它同人民群众的本质关系决定的。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始终把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坚持一切为了群众和一切依靠群众，从而取得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这是我们党领导的事业能够不断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

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领导核心。当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之后，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这是时代的要求，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中国革命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时指出："整个中国革命是包含着两重任务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① 他还指出，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3—614页。

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①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主要“法宝”，也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因此，维护和加强党的领导是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崇高职责。

无产阶级政党是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领导核心，同时又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的解放理应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情。人民群众的解放，只有通过群众自己起来斗争才能获得；人民群众所获得的斗争成果，也只有人民群众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才能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政党是适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需要而产生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无产阶级政党同其他任何阶级的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②当然，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水平有高低之分，群众的觉悟程度也有先进与后进的区别，而群众觉悟程度的提高只有靠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政策的宣传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只有靠党的宣传教育和学习马列主义才能建立。然而，就革命事业的发展来说，归根到底，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是第一位的和决定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正在于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在于最大限度地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精神，组织和支持人民群众去实现其自身的解放。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我们共产党人——人民群众的先锋队，不论去进行任何工作，当着群众还没有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8—999页。

② 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人民出版社版，第36页。

自觉时，我们的责任，就是用一切有效的适当的方法去启发群众的自觉”，“当着群众已经有了某种必要的自觉以后，我们的责任，就是去指导群众的行动，指导群众组织起来，斗争起来；在群众组织起来，斗争起来以后，我们再从群众的行动中去启发群众的再自觉。这样，一步一步地引导群众去为党提出的人民群众的基本口号而斗争。我们共产党人，以及一切任何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和伟大人物，在一切人民群众事业中所起的全部作用，就只有这些。”①这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本阶级和人民群众先锋队的作用，只能是人民群众历史活动的向导，而不能超越引导、教育和组织群众的范围去取代群众，包办群众的事情。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人民群众的领导者，它能否把群众的革命事业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取决于它能否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同群众的关系，它所制定的方针和政策能否体现群众的利益、意愿和要求，能否把自己的全部活动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能否同人民群众始终保持最紧密的联系。毛泽东同志指出，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我们党在率领人民群众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始终把正确认识和处理同群众的关系问题放在全党工作的首位，把尊重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首创精神同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结合起来，反对任何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的倾向，从而使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如何看待群众利益，这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全部活动的一个根本性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而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实际利益直接相关，离开实际利益的超功利主义是不存在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

---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2页。

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①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是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也是最后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只有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使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从剥削制度及其影响下解放出来，才能最终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因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它既然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而自己不过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那末，人民群众的利益就应高于一切，捍卫人民群众的利益也就成了无产阶级政党全部活动的根本内容。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除了谋求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它本身并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毛泽东同志1943年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他还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② 这也就是说，人民群众的利益同党的利益是一致的，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也就损害了党的利益。正因为如此，每个共产党人都应把自觉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言论和行动的最高准则。

人民群众的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又包括政治利益，既包括长远的根本利益，又包括暂时的和当前的利益，既包括全局的和整体的利益，又包括局部的和个人的利益。对于这些有关群众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1页。

② 同上，第997页。

利益问题上的矛盾关系，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是对立的统一，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利益是政治利益的基础，是引起其他各种社会矛盾和斗争的最深刻的根源，而政治利益则是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可以凭借强大的国家政权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因此，人民群众的基本的经济利益只能用政治改造即政治革命的办法来满足。从根本的意义上说，这种政治斗争不过是实现人民群众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在经济上的解放。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政党要善于把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当着群众的当前的、局部的和个人的利益同长远的、全局的和根本的利益发生矛盾时，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教育群众以当前的利益服从长远的利益，局部的利益服从全局的利益，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另一方面，党在领导群众为实现自己的长远利益而奋斗的同时，又必须使人民群众的眼前切身利益不断地得到改善，使他们享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从而感受到党是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历史的经验表明，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人民群众为实现其长远利益而斗争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从事夺取政权的革命活动，还是在取得政权以后进行建设，都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使群众的当前利益逐步地得到满足，在不妨碍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的条件下，也有可能对群众的某些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给以必要的照顾。这样，将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使他们甘心情愿地为自己的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而奋斗。

我们党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党，是一个具有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党。我

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正确处理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把维护群众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反对任何脱离群众和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错误倾向。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反复阐述了关心群众利益、改善群众生活对革命工作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注意解决诸如土地问题、生产问题、穿衣问题、吃饭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问题和婚姻问题等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党“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才能“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才能“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①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我们党培养和造就了千万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党员、好干部；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些优秀人物的由衷爱戴，是他们热爱党和对党的事业充满信心的表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科学地总结了以往的历史经验，使党的全部工作更加自觉地建立在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从而使党群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三、领袖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

正确认识和处理无产阶级领袖人物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坚持和贯彻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原理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和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的原理，同样适用于认识和处理无产阶级领袖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在我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在认识和处理领袖同群众的关系上既有好的传统，也出现过一些严重偏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科学地总结了以往的历史经验，进一步解决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4、123页。

领袖和群众的关系，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

马克思主义在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同时，又承认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上的重大作用。一定时代的杰出人物的思想和活动，是该时代先进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和要求的体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群众的某些利益或要求。由于各方面的条件，杰出人物比一般人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斗争经验比较丰富，具有卓越的组织才能，能够提出革命的纲领和口号，制定革命的计划和策略，组织和领导本阶级群众同敌对阶级进行斗争，使人民群众的作用得以有效地发挥出来。因此，杰出人物对于历史事件的面貌、或历史事件的某些方面能够发生重大的影响，对于历史的发展能够起重大的促进作用，以至在历史上留下个人的痕迹。不过，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要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同时代和不同阶级的杰出人物，由于主客观历史条件不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的历史地位和阶级本质不同，因而他们的历史作用也就有很大不同。无产阶级的领袖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先进的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仅具有卓越的才能和丰富的知识，而且是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和革命风格的集中表现。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① 因此，无产阶级领袖的伟大历史作用是其他任何阶级的领袖无法比拟的。无产阶级领袖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要求的集中代表，是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辉旗帜，是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和可靠保证。列宁说，“只要千百万劳动者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跟随本阶级的优秀人物前进，胜利也就有了保证。”② 正因如此，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热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illegible]页。

② 《列宁全集》第30卷，第402页。

爱自己的领袖，自觉维护领袖的声望，并紧密地团结在领袖的周围进行战斗，这是党性的重要表现，是人民群众对自己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充满胜利信心的表现，是革命的需要和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

无产阶级领袖人物在推动革命事业和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无疑是极其巨大的。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也深刻地表明，如果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的指引，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就不可能出现现今胜利发展的崭新局面。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革命毕竟是人民的事业，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领袖在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一点也离不开人民群众。

领袖是适应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袖领只有始终忠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大家知道，无产阶级的领袖，同历史上的一切杰出人物一样，既不是自封的，也不是什么“大树特树”的结果，而是适应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斗争需要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① 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为了推翻腐朽的反动统治，谋求自己的彻底解放，就需要有革命领袖来领导，因而在斗争实践中也就必然会涌现出这样的领袖。无产阶级领袖是适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其领导地位是由人民群众在斗争实践中逐步确立的，领袖的权力是由人民赋予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0页。

就拥护我们。”①这就是说，领袖的历史使命是代表人民的意志，为争取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而斗争；领袖的本质乃是人民的公仆或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正因为如此，领袖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忠于人民，一切向群众负责。领袖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就要以符合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就要悉心听取群众的呼声，善于提出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奋斗目标和方针政策，同时，也要以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的身份出现，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成为执行纪律和民主集中制的模范。领袖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一旦有了错误，就应作自我批评、改正错误，而且改正得愈坚决、愈彻底、愈迅速，对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则愈有利。

领袖的品格、智慧和力量来源于群众，领袖只有始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发挥其伟大的历史作用。领袖作为人民群众推举出来率领他们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领导者，无疑具有优秀的品质、丰富的知识、卓越的才能和高度的组织能力，由此对人民群众产生巨大的号召力和鼓舞作用，从而促进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然而，领袖人物的优秀品格、卓越的才能和伟大的号召力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在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中获得的。革命领袖是先进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优秀代表，他们的思想品质、精神境界和道德面貌是由其所代表的阶级的特性和面貌决定的。无产阶级领袖人物所具备的心胸宽广、襟怀坦白、大公无私、恪守纪律、坚毅顽强等品质，就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特性所决定的。无产阶级领袖所具有的远见灼识和卓越才能是在斗争实践中通过学习得来的，其中主要是求教于马克思主义和向人民群众学习而来的。与此相关，领袖人物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力量的源泉也来自群众。领袖的力量在于有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领袖作用的大小、好

① 转引自1968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坏，归根到底取决于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领袖的思想和活动，只有成为人民群众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时，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毛泽东同志195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反对否认领袖作用和夸大领袖作用两种偏向。领袖的伟大历史作用是必须充分肯定的，否认领袖的作用和宣传无政府主义与自发论的观点，是错误的和有害的；同样，夸大领袖的作用，对领袖个人加以崇拜，否定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错误的和有害的，是历史唯心论的表现。

我们党诞生以来，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以后的一个很长时期内，在认识与处理领袖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总的来说，主流是好的。在全国解放前夕和建国初期的一些年代里，鉴于我们党的执政党地位，为了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在毛泽东同志的倡导下，我们党曾经作出了诸如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反对向党的领导人拍发致敬电和祝捷电，反对在文艺作品中夸大领导者的作用等一系列明确的规定。党的八大还规定："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彻底地执行。"但是，在此之后，由于毛泽东同志在我国革命的伟大成绩面前逐渐滋长了骄傲情绪，由于我们党和国家某些制度还不够健全，特别是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使个人崇拜在全国范围内严重泛滥起来，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

从哲学上讲，个人崇拜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颠倒了领袖同集体、同党和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宣扬个人崇

拜，实际上是把领袖说成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集体或一批人，把党的领导作用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归结为个人的作用，把人民群众对领袖的爱戴变成对领袖个人的无限颂扬。这样，就把无产阶级的领袖说成是凌驾于集体、党和人民群众之上的绝对权威和历史创造者了，而党和人民群众反倒成了领袖创造历史的工具；二是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认为领袖人物的智慧和才能并非来源于党和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而是先天就有的；领袖是不会犯错误的，是一贯正确和完美无缺的圣哲；领袖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可以明察秋毫、洞察一切。这样，实际上就把无产阶级领袖说成是可以脱离实践、脱离群众的全智全能的神了。不难看出，这种夸大领袖作用的个人崇拜思潮乃是历史唯心论的表现，它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必然会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

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个人崇拜的根源，要作全面的和具体的分析。如同马克思指出的，我们不应该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应该“用历史来说明迷信”。① 个人崇拜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是剥削阶级的意识。无产阶级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即使剥削阶级消灭了，诸如封建专制主义等旧的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也还会在人们头脑中保存下来，因而也就可能影响到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以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领袖人物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党的领导作用和人民群众的意志与力量要通过他们表现出来，因此，很容易使人们把党的领导作用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业绩记在领袖人物的个人名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缺乏清醒的认识，默许甚至提倡对自己的无限颂扬，如果无产阶级政党对这一情况未能及时察觉，党和国家又缺乏严格制度加以必要的监督和防范，如果人民群众对领袖人物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5页。

纯朴感情为阴谋家、野心家所利用，那末，个人崇拜就可能作为一种潮流在社会上普遍地盛行起来。应当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并不产生个人崇拜，社会主义条件下虽然存在着产生个人崇拜的社会历史的和认识上的根源，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个人崇拜就一定变成现实，更不一定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问题的关键在于，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否把反对个人崇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而予以充分地重视，能否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运用于指导党的工作，使党内民主和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深刻地总结了以往的历史经验，为从理论与实践上清除个人专断、个人崇拜造成的严重恶果，为恢复和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作风，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为正确认识和解决领袖同党和群众的关系创造了良好的开端。几年来，我们还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的终身制；成立中央书记处，加强党中央的集体领导；着手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并准备再建立适当机构，健全党内包括对政治局、书记处成员的监督制度；实行“少宣传个人”的方针，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等等。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进一步把“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列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之一，指出在“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的同时，“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不允许任何领导人实行个人专断和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这些原则和制度的规定，对于加强党的领导和党自身的建设，对于正确理解党的领袖人物同党和群众的关系，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毛泽东同志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党的实际工作，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形成，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坚持和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乃是实现革命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重要保证。

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无产阶级政党实行正确领导的基本方法

无产阶级政党作为革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要把革命引导到胜利，不但需要树立正确的群众观点，而且需要走群众路线，需要有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毛泽东同志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在1943年撰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系统地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他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

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在这里，毛泽东同志科学地阐明了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基本内容和形成与实施的全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致性，从而把党的群众路线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认识论、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化为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自觉地把它们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指导，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无产阶级政党实行正确领导的基本方法。

“从群众中来”，就是通过调查研究，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摸清群众的愿望和需要，以形成和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计划和办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的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而社会实践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的实践。人民群众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革命斗争中的一切正确的决策和办法，归根到底，只能来源于从事社会实践的广大人民群众。毛泽东同志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领导者的头脑，只起一个加工工厂的作用，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从群众中来”，包括两个相互联结的环节：其一，是领导者必须深入群众，倾听各方面的意见，掌握足够的和真实的材料；其二，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已经取得的材料进行加工制作，形成统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4页。

的意见，制定出方针、政策、计划和办法。

这里应该指出，亲身实践着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从总体上说，是丰富的、全面的和接近于客观实际的；但就群众中每个成员的意见来说，由于人们在实践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社会经历、文化水平、认识能力和思想方法不同，因而他们的意见或认识也就不尽相同。其中，既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既有感性的也有理性的，既有分散的、无系统的也有较为集中的和有系统的，等等。领导者的任务，就是要在深入群众进行实际调查的基础上，对群众的意见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提炼和深化，使之形成正确的、深刻的和系统的意见，并以此为依据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计划和办法。领导者的正确认识只能从群众中来；离开“从群众中来”，领导者的认识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断然不会实现正确领导的。与此同时，领导者要对来自群众的意见进行科学的加工和正确的集中，其自身还必须具有相当的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具有足够的科学文化知识。如果缺乏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即使人民群众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真实材料，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和办法，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正因为如此，作为领导者要实现正确的领导，形成和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计划和办法，不但需要树立群众观点，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深入群众、掌握情况，而且还需要学习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足够的科学文化知识。

“到群众中去”，就是把已经形成的方针、政策、计划和办法拿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变为群众的行动，并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这就是说，“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也包括两个相互联结的环节：一是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让群众掌握，并付诸实行；二是收集群众实行政策的经验，检验政策和修改政策。制定方针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改造客观世界，为人民群众谋

利益。只有广大群众接受了党的方针政策，并自觉地行动起来，才能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①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只要党的方针政策集中了群众的正确意见，体现了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而党又善于把正确的方针政策向群众作深入细致的宣传解释，人民群众必然会衷心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并付诸实践的。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农村实行的各种形式的责任制政策，正是由于集中了群众的正确意见，符合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既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又是检验和进一步完善政策的过程。由于实践条件的限制或领导者自身的能力和水平的限制，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意见和办法可能存在着某些缺陷或不完善的地方，甚至可能是错误的。只有把领导者的意见、党的方针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通过群众的实践，才能检验这些方针、政策、意见和办法的正确性。在"到群众中去"实行和检验政策的过程中，一般说来，如果政策确有成效，就要坚持下去；如果在执行中发现偏差，就应及时纠正；如果证明政策本身确有错误，则应修正政策，以免在实践中继续造成损失。总之，在实行政策、使政策见之于群众行动的过程中，要从群众的实际出发，要对人民群众负责。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民主与集中是辩证的统一，离开民主的集中和离开集中的民主都是错误的。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历来认为，革命事业是人民的事业，党的集中领导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4页。

上。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离开了充分发扬民主的集中，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就不可能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计划和办法，因而也就不可能实现正确的领导。同样，对群众的各种意见缺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那就失去了领导者的作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总结群众经验、集中群众智慧的过程。因此，必须在整个过程中贯彻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方法。只有坚持民主与集中的统一，才能真正坚持群众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发展的过程。任何一项正确的方针、政策、计划、办法的制定，都不可能只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次具体过程来完成。客观事物和群众的斗争实践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因而领导者的认识和领导机关的方针政策亦应不断地提高和完善。"实践——认识——再实践"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和认识论公式，同"群众——领导——群众"这一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完全一致的。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这是我们党实现正确领导的基本方针，是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①这两个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基本方法的组成部分。

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关于认识个别和认识一般相联结的原理在党的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和体现，是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大家知道，任何事物都是个别和一般的统一。人类认识运动的基本秩序，是一个由个别到一般，再由一般到个别的无限发展过程。毛泽东同志根据客观事物个别和一般的辩证法，并在同教条主义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深入地阐明了人类认识发展的基本秩序。他指出：人们在实践中总是首先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然后经过抽象概括，进一步认识一般的事物，认识各种事物的共同本质。人们一旦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便可以以它为指导，继续在实践中去认识那些尚未研究过或尚未深入研究过的各种具体事物，找出其特殊的本质，以补充、丰富和发展原来那种一般本质的认识，从而使人们的认识不断地深化。而教条主义者则完全否认和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把一般和个别割裂开来，既不知道一般是从个别和特殊中概括出来的，也不懂得一般还必须回到特殊和个别中去，把一般理论当作凭空出现的纯抽象的公式到处乱套，因而势必把革命事业弄得很坏。毛泽东同志科学地总结了我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个别和认识一般相联结的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党的实际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2页。

工作中去，制定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详细地分析了党的正确的领导意见的形成和实施过程，阐明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同人类认识发展正常秩序的一致性。他指出：“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①他还指出：“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②这就是说，实施“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这一基本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始终贯串着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是领导者从对群众实践的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或一般号召的过程；“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是领导者把一般号召付诸实施，到群众实践中作具体指导、并检验和丰富一般号召的过程。正确的领导意见只有在“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过程中才能形成和实施，而要在集中和坚持的过程中形成和贯彻正确的领导意见，就必须采用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

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是一个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指出，在我们党领导的一切实际工作中，都应该坚持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

---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5、852页。

相结合。在没有取得具体经验以前，不要一下子把工作全面铺开，以免造成被动局面，而应该选择强有力的干部在若干点上先搞试验，以便取得经验，逐步推广，使工作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工作做好。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后来提出的"解剖麻雀"、"蹲点"、"种试验田"、"点面结合"等具体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正是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这一方法的生动体现。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就是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基本方法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领导和群众两个方面的积极性。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任何工作中，"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① 只有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才能把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都充分地调动起来，才能集思广义、同心协力地搞好工作，同时，也才能有效地防止领导者犯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错误。建国以来，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倡导的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到了广泛运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我们党在工业企业中推行的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等制度，就是扩大企业民主，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的良好形式，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效方法。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同党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把党进行实际工作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提高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从而既丰富了马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页。

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又使我们党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理论化、科学化。正是由于我们党掌握和自觉地运用了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才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还应看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一项十分伟大而艰巨的事业，需要有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指导。邓小平同志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归根到底，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才能够得到解决。”①认真学习和掌握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

① 《邓小平文选》，第202页。